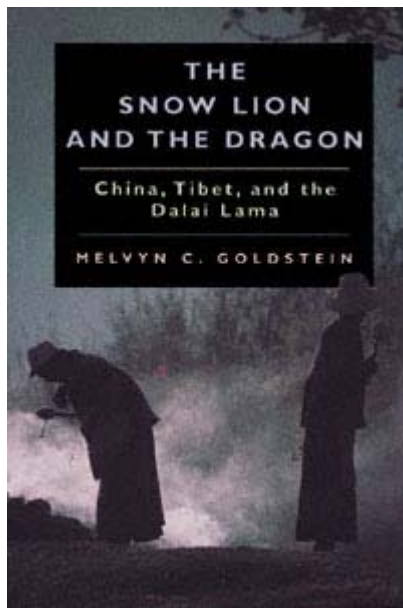


雪狮与龙

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

Melvyn C. Goldstein 著

David Peng 译



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1997.

<http://ark.cdlib.org/ark:/13030/ft2199n7f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Scholarship Editions are published by [eScholarship](#),
the [California Digital Library](#)

© 2003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初稿译者序

2005年秋天，我来到云南省德钦县，寻访一所民办藏文学校——德钦普利藏文学校。这所学校是一名一字不识的藏人阿牛，为了发扬本民族的语言、文化，自费创建。作为德钦唯一一所民办的以藏文教育为主的学校，学校实行全免费教育，并承担贫困学生的生活费。8年以来，学校经历了各种坎坷，也受到的社会各界的大力资助，包括当地政府的关心。

在此之前，我对藏族了解很少。觉得和中国其他的少数民族差不多，生活在自然环境很艰苦的地方。当然，我对疆独和藏独也有所闻，但是了解不深。关注这个学校的原因，一是一直以来对贫困地区教育的关心；另外，藏族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多少也有些神秘的色彩。正好年假时间合适，我就来到了学校。

德钦是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一个县。据学校的志愿老师告诉我，德钦是一个被汉化的得很厉害的地方。当地很少能看见穿传统藏服的藏人。德钦县城的房屋都是汉化/西化的水泥房子。郊区和农村则可以看到藏式的房屋。当地的藏语和拉萨话不一样，我不清楚当地公办的学校里面还教不教藏文，感觉上不教；因为阿牛很难找到藏文老师，甚至要从拉萨去找。德钦因为近年来的旅游开发，外来人更多了。从另一方面，学校的主要志愿者团体为汉人，他们主要从中国富裕地区中的中产阶级中募捐。我还看到一张照片，阿牛被授予迪庆州民族关系先进个人。

在这个假期，我也到雨崩村旅游。整个过程中，和藏人的接触比较少。因为语言不通，包括文化、社会环境相差很大，基本上我们和普通的藏人生活在两个圈子里面。网上的那么多的到西藏的游记也差不多。很少看到某个人和藏人、藏族文化的深度接触。

回来之后，我对藏族和藏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买了不少书看，也在网上找书。这个时候，我发现西藏的历史很复杂。我从小到大受的教育是中国官方的版本：这个版本中，西藏是毛主席带领的解放军1950年解放的，解放之前，西藏是很落后的农奴制度。农奴主对农奴非常狠毒，稍不如意就会受到象挖眼

睛这样的酷刑。我在网上又能够看到达赖喇嘛一方的西藏历史版本：自古以来，藏族人员和谐地生活在雪域高原，与世无争；这种生活到 1950 年结束，当时中国共产党残酷地入侵西藏，西藏几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人口、宗教、文化受到毁灭性打击。这两种差别如此之大的历史，哪一种是真的呢？很偶然的，我在 California Digital Library 看到这本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我很快地把这本书浏览了一遍。正如作者 Dr. Goldstein 所说，

本书将在现实政治 (realpolitik) 框架内，用平衡的方式对西藏问题进行剖析，重点放在参与各方的策略。

在我看来，本书的一大特点就是科学治史，不偏不倚。将历史事实从纷杂的史料中解剖出来，并加上合乎理性的推断和解释。在描述八思巴和忽必烈的关系时，Goldstein 引用了这样的史料：

然而，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关系很复杂。在这种“供施”体系中，八思巴远非王座的被征服者。西藏和蒙古档案中记录了两入之间一个令人惊奇的争执，显示出西藏喇嘛在蒙古人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忽必烈请求八思巴为上师，八思巴同意了，但坚持忽必烈要尊崇他无上的宗教地位。忽必烈开始拒绝，但最终缓和，同意当他私人听法时，上师处上座；而在其他场合汗王处上座。

这段记录为我们了解藏人常说的“供施”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治史者一般是世俗中人（非佛教信奉者），对藏人常说的“供施”关系理解不深，通常倾向于忽略在这一关系中“供”者的作用。而西藏流亡政府或流亡藏人一方，特别是僧人，倾向于夸大“供”者一方的上师地位。而这种关系，需要在现实政治的框架内进行理解。Goldstein 是这样记录五世达赖喇嘛和清朝顺治皇帝的会面的：

清朝皇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他同意了，于 1656 年抵达北京。清朝皇帝以崇高的礼仪款待达赖喇嘛。这次会见不表明西藏喇嘛一边政治上的任何从属地位。达赖喇嘛有和硕特部的军队做后盾，他在其他蒙古部落中也有广泛的追随者，其中一些正威胁着清朝，他可不是等闲视之的人物。

当然，在中国一方的史家看来，因为传统的八方来仪的天朝心态，清朝史料必定可以中找出五世达赖喇嘛臣服于清朝皇帝的证据。但是，从现实政治的框架中理解，此时的五世达赖喇嘛是令藏传佛教威震一方的强者；在此次见面中，清朝有求他的方面多，可能还是达赖喇嘛占上风。然而，清朝和达赖喇嘛的关

系到 1792 年制定《二十九条》的时候，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福康安给达赖喇嘛的这封信，看起来殊为无礼：

惟藏中事务向来毫无制度，达赖喇嘛惟知坐静安禅，不能深知外事，噶伦等平时任意舞弊，有事又不能抵御，必当更定一切章程，俾知遵守。今蒙大皇帝训谕周详，逐加指示，交本大将军等详细筹议，以期经久无弊，藏番永资乐利。达赖喇嘛既知感戴圣恩，将来定议时，自当敬谨遵依办理。倘或徇于积习，则撤兵后，大皇帝即将驻藏大臣及官兵等概行撤回，以后纵遇事故，天朝亦不复管理，祸福利害，孰重孰轻，惟听自择。

如果读者真的相信，只要达赖喇嘛不遵章行事，驻藏大臣官兵就会全数撤离，那可真是太天真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福康安这封信完全是赤裸裸的威胁。此时的福康安大兵压境，予取予求。但是，达赖喇嘛也并非全处守势，西藏恶劣的自然环境是他最大的战友。乾隆皇帝给驻藏大臣的信中如此写到：

通常，有能力的官员派到首都的职位任职；派到西藏的多是中庸之辈，他们实际上啥事也不干，等着任期结束返回北京。因此，达赖喇嘛和噶伦可以在西藏事务上为所欲为，视此无能官员如无物。如此，驻藏大臣变得有名无实。从今以后，驻藏大臣须有效监控西藏的管理……达赖喇嘛和噶伦不应垄断权力。

这就象县官手下的绍兴师爷。虽然名义上统治者是清皇和驻藏大臣，但实际上处理具体事务方面，只能全盘依靠达赖喇嘛和噶伦。有时甚至相反，处理具体事务的人才是真正管事的人。英明如乾隆皇帝，面对这种局面恐怕也只能说说而已。在大的框架下面，影响具体权力划分的因素很多，包括：驻藏大臣的能力、清朝对藏事务的关注度和支持度、达赖喇嘛本人的能力以及噶伦的情况。而从清朝在此期间多次对西藏的政治结构进行的改革看来，清朝虽然进行了多番更改，最后还是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个人认为，清朝改革的最大缺点是，使达赖喇嘛成为政教合一的领袖。看来，权力分离和权力制衡的理念对他们来说，太超前了。时至今日，达赖喇嘛仍然大权在握。瑞士 SF1 电视台最近对流亡藏人政府国会副主席的访问，显示情况依然如此：

Thubten Lungrig 担任国会的副主席，他说‘所有重要的决定须要四分之三的多数通过。’

（问题）：‘这里曾有一个决定是违反达赖喇嘛的意见的吗？’

（回答）：‘没有过。’

（问题）：‘那是可以想像的吗，也就是有任何通过的政策是与达赖喇嘛的意见相反的吗？’

（回答）：‘不可能’。

本书的另外一个优点，是对近代西藏历史的把握和描述；以及对参与冲突各方的策略的恰如其分的分析。1911年~1949年是酿成当代西藏问题的重要时期。在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相信很多藏人的感受是扼腕痛惜，达赖喇嘛和噶厦错过了改变自己民族命运的最好时机。二十年代，西藏放弃了最近一次现代化的努力，Dr. Goldstein 敏锐地指出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

西藏并未为此立即付出代价，因为此时中国完全陷入其内部事务和冲突，太虚弱而无力挑战达赖喇嘛。……西藏事实上没有官员理解西方政治，也不会说英语，无忧无虑地忽略了这个不祥的发展，和先前一样，闭上眼睛不理睬现实，原封不动的退回英国政府的来信。

考虑到目前流亡藏人对西方社会及其政治运作的熟悉程度，这一点真是一个讽刺。陈毅有句名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到1949~1950期间，西藏政府面临灭顶之灾，不顾一切地向外求救，然而为时已晚。

此间西方国家的反应也令人作厌。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一方面高举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则是汉斯·摩根索的信徒，秉承冷酷无情的现实政治主义。这种内建的矛盾是书中多次提到的西方“坏朋友综合症”的症结。下面这个例子堪称笑谈：

1948年，西藏政府用自己的护照派一个商贸代表团到美国和英国。香港的英国官员签发了3个月有效的入境签证。当西藏人在美国时，英国签证过期了；当西藏人例行公事般申请新签证时，他们的请求被拒绝了。过渡期中的中国政府对英国政府提出抗议，根据英国官方观点，英国不接受西藏独立，但是接受西藏护照却隐含此意。英国外交部于是纠正此错误，向中国人保证犯了个错，承诺以后不会在西藏护照上签发签证。他们向西藏人建议，在另外一张写有“身份宣誓”的纸上签发签证。代表团感到既震惊又愤慨，他们拒绝这种做法，说如果这样，他们宁可访问英国。他们的举动令在英国的西藏的朋友们惊慌失措，于是伦敦想出了一个机灵的解决方案，真实地表现出此时盛行的双重标准。他们小心地在过期签证章上划掉了“三个月”几个字，用笔在上面清楚地写上“九个月”。这种做法，使得他们信守了对中国政府的承诺，没有在西藏护照上签发新签证因为这还是老签证。同时他们也欢迎西藏代表团使用西藏政府签发的护照访问英国。

相比较四十年代的历史，刚刚过去的历史则更加难以描述。一方面是双方政治立场对立，力图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诠释（歪曲）历史事件；另一方面，历史中的人物还在世，考虑到对生者的影响，也难以对事实真相解密。尽管如此，Dr. Goldstein 笔下的 80 后历史还是栩栩如生。

胡耀邦在国内、党内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在西藏推行怀柔政策，但是结果却是共和国第一次西藏戒严。党内很多人士批评胡耀邦搞乱了西藏，Dr. Goldstein 不这么认为，

1987 和 1988 年的骚乱本质上是被压抑的不满和愤怒的自然而然的爆发。这不是拒绝 1980 年的改革政策，而是对 1959 年以来，藏人被强权异族消灭国家，毁坏文化的计划外的反应。

这种细腻的分析反映了 Goldstein 的历史功底和深邃的大历史观。现在藏人怀念胡耀邦，认为他是对藏人最好的汉人。可是事去人非，胡耀邦已经作古，而西藏问题依然如旧，甚至更加恶劣。如今，共产党官方已经抛弃了胡耀邦的治藏政策，只是在宣传上，还总是把胡耀邦搬出来，证明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王力雄的《天葬》中对此的分析则更让人信服，胡的政策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在硬的政治框架没有建立之前，一味的缓和政策只能让人觉得懦弱。藏人对西藏的要求不仅仅是能唱经、喝酥油茶，也不仅仅是恢复藏语、让藏族人做官，西藏问题的核心问题是谁主导和统治西藏。不能低估他们的民族感情，而民族感情是不能被赎买的。当然，现在藏人怀念胡耀邦，是和当前的强硬路线相比；失去了，才觉得宝贵。综观整个藏族历史，我的一大感受就是藏人的政治感觉非常幼稚。他们的政治决策基本停留在十分原始和直觉的境地，缺乏政治智慧。

80 后历史中最让人唏嘘的莫过于十一世班禅喇嘛的挑选。Dr. Goldstein 对此也着力很多。在这个堪称精彩的双方对局中，彼此你来我往，一招接一招。双方有一万个理由通过合作达到双赢的局面；然而结局却是双输的政治大崩盘。继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两个十世班禅之后，西藏再次出现了两个十一世班禅，双方的互信降到历史最低点。围绕这一对局过程，还有很多未解之迷，希望能够在将来揭晓：1. 恰扎活佛选择灵童根敦确吉尼玛之后，中国是否已决策仍采用金瓶掣签？中方如何考虑恰扎避免掣签的建议？为何放弃这一建议？2. 达赖喇嘛

开始愿意和中国一方合作吗？为什么他不自己在印度或尼泊尔流亡社区中选择灵童？3. 在关键时刻，恰扎活佛给达赖喇嘛何种信息？为何达赖喇嘛在此时先发制人？他的逻辑为何？

十一世班禅喇嘛的挑选过程，让人不由得对将来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挑选充满担心。目前，中国官方执行的是强硬的同化路线，这一路线随着青藏铁路的修通达到一个高峰。在目前国内的藏人中，爱国（拥护西藏为中国一部分）爱藏的十世班禅喇嘛已经过世，新选的十一世班禅喇嘛还谈不上有什么政治影响；与他同一阵营的阿沛阿旺晋美年事已高，并因为其子阿沛晋美的情况在北京的信任度降低。国内高层已经听不到以藏人利益为依归的声音。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步提高，这两个对手的实力相比越来越悬殊。西藏问题的合理解决，变得越来越缥缈。

可能这其中唯一的亮点，是西藏自然景观宗教文化对国内日益增加的中产阶级的吸引。我本人也是在这一潮流中开始关注西藏和西藏文化的。和西方的中产阶级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西藏这个符号面前，不由自主地顶礼膜拜起来。相对于被烟囱废气臭水笼罩的东部城市，西藏有透明的蓝天白云和纯净的雪山草地；相对于烦杂的办公室和电脑和拥挤的街道，西藏人烟稀少，每个人似乎都与人为善，路上看到的每一个藏人都在向你点头微笑；相对于做不完的事，赚不完的钱，藏人那虽然清苦的生活好像乐土一样，他们虔诚信佛，心中没有烦恼。这么一个被先驱的旅游者异化的西藏和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产生了无比的吸引力，击打着每个人的心灵。一个小资，可能对离家不远的路不认识，却可能对“然乌湖”、“纳木错”甚至“墨脱”这样的地方如数家珍。

当我第一次读完整本英文书的时候，我有一种发现历史，真理在握的感觉；然而，当我翻译完整本书的时候，我的心却从未象这样沉重过。西藏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 80 后的历史，让我理不出个头绪来。在我所接触的汉族人中，大多接受了中国官方对于西藏问题的诠释。他们对于藏族的情感和对于一般贫困的少数民族没有什么两样；而相对而言，我在藏族论坛上看到的那些藏族知识分子，对其历史的了解更接近事实，他们对政府和汉族一般抱着一种仇恨的心态。在那些论坛上，我常能看到歌唱“藏汉一家”，“兄弟同源”的汉族网友，被藏族网友突如其来的谩骂搞得莫名其妙。在一般藏人知识分

子看来，倡导“藏汉一家”无疑是强硬同化路线的同路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否应该把本书中的历史介绍给中文读者呢？站在藏人/汉人的角度上，如果当前的同化政策继续，是应该支持这种同化还是应该反对这种同化呢？面对一个这样的问题，答案似乎很简单；但是仔细考虑，似乎又不是这样。这种同化在很大程度上同时也是一种现代化和西化。当然，目前的现代化最为人所诟病的是没有民意支持。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这种民族的融合是一种大的潮流，是被同化幸福呢？还是做一个原始的土人更幸福？从某一个藏人的角度看，我个人觉得很难回答。西藏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此。

Dr. Goldstein 对未来的分析可谓丝丝入扣：他希望中方和藏人一方能够各退一步，达成某种中间妥协方案。在《未来》一章中，他分析了双方目前的优势、困境，也讨论了双方想达成妥协的种种难点。但是在我看来，他的牵强的解决方案只是再一次证明：西藏问题目前无解！

我本人是一名汉族人，如前所述，我是在中国政府的官方教育体系中成长。所以，尽管我极力与原著保持一致、忠于原著，恐怕我的翻译还是会轻微地倾向于中国一方。作者一般把“Tibet”和“China”并列，我一般也并列地翻译成为“西藏”和“中国”，而不做任何修改或者修饰。由于“Chinese”这个词的多义性，作者在很多时候用这个词是为了表示非藏族中国人或非西藏的中国人，我一般简单的翻译成“中国人”或者“汉人”。毕竟这是一份学术著作而不是官方文件，作者这么遣词只是为了表述方便，不代表作者个人，以及译者对西藏和中国关系的看法。

在著述过程中，Dr. Goldstein 很多引文的原文是中文，但是他个人不懂中文，只能从英文材料中转引。对于这种情况，我一般尽力寻找原文，直接引用原文。找不到原文的地方再从英文转译。在翻译这本书之前，我个人对藏传佛教和藏族了解都很少，所以书中的很多地名、人名以及其他专有名词，我都尽量遵循已有的汉语翻译，一般不用音译。另外，因为目前没有出版的考虑，作为网页形式，我没有翻译索引一章，请读者见谅。现在还仅仅是初稿，我个人会抽时间校对这本书，也打算尽量找这方面的专家帮我校订，以飨读者。

据我了解，Dr. Goldstein的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以前曾经以*The Dragon and The Snow Lion: The Tibet Ques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的名称发表，并由张值

荣、肖容翻译成中文。西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杨和晋教授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并于 2005 年 10 月由明镜出版社出版。我没有参考他们的译文。

因为我个人的知识背景，翻译这么一本书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然而我竟然完成了，我自己感到很高兴；虽然我不信神佛，冥冥中却似乎有神佛在激励着我完成这么一本书。在整个翻译过程了，我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藏族的历史和文化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对我个人而言，这些知识就是对我最大的奖励吧。对于藏族文化和历史，我又增加了很多新的兴趣点，希望今后能够了解。

我想对于这个译本而言，最应该感谢的是 Dr. Goldstein。他多年从事藏族历史、文化、社会的研究，写出了不少好的作品。这本书则是对藏族历史的一个概述，希望这本中文译本能够介绍给广大的中文读者。我也衷心希望这本书能够有藏文译本。我同时也感谢 California Digital Library，他们无私地将这本书的英文版放在网络上免费共享。此外，我还想特别感谢云南德钦普利藏文学校的师生，特别是藏族校长阿牛、汉族志愿者乔阳和蝓蝓。我是因为他们才开始认识藏族这个民族的，我由衷地为他们那种无私弘扬藏族文化的精神而感动。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夫人 Pearl，她对我的翻译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并帮助我完成个别困难词句的翻译。我的翻译工作离不开她的支持。

目录

[前言](#)

[帝国时代](#)

- [西藏与蒙古](#)
- [格鲁\(Geluk\)派在西藏的兴起](#)
- [英国的介入](#)
- [中国的反应](#)

[间隔期：事实独立](#)

- [西姆拉\(Simla\)条约](#)
- [西藏现代化的尝试](#)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毛时代](#)

- [十七条协定](#)
- [依据十七条协定共存](#)

[后毛时代](#)

- [达兰萨拉\(Dharamsala\)的新建议](#)
- [第一次骚乱——1987年10月1日](#)
- [骚乱之因](#)
- [北京的强硬策略](#)

[未来](#)

- [中国](#)
- [达赖喇嘛和达兰萨拉](#)
- [美国和西藏问题](#)

[注](#)

- [前言](#)
- [帝国时代](#)
- [间隔期：事实独立](#)
-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毛时代](#)
- [后毛时代](#)
- [未来](#)

[参考书目](#)

[索引（略）](#)

前言 [\[回目录\]](#)

西藏问题，即与中国相关的西藏政治地位的长期冲突，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冲突——这是个富含感情色彩的争论，政治单元是否应直接与民族单元相吻合？西藏问题是一个矛盾的两面：一面是民族（西藏）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另一面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其认为的历史领土完整的权利。

类似的民族冲突没有简单的答案。国际社会在此问题上也没有达成一致：一个民族什么时候可以正当地要求自决，或一个多民族国家什么时候有权阻止分离。目前的联合国宪章对此含糊不清。第一条第二款说，联合国的目的是保证“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但第二条第七款说，“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1]武力是最后的仲裁，例如美国用战争解决邦联政府脱离的威胁。^[2]

尽管西藏地处世界边陲，西藏问题引起了许多美国人和西方人的联想和同情，并在美国政坛得到共鸣。它也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分歧点。但是对该冲突并没有很好的理解。在这个典型的民族冲突中，对领土控制的争斗，伴随着争相控制对历史和当代事件的表述。双方（包括他们的外国支持者们）定期用带着高度感情色彩，通常也是没有诚意的词汇来描述历史事件，影响国际认知并为他们的事业赢得同情。历史是主战场，双方用政治辞藻不透明地修饰冲突的事实，以至事实含糊不清。有兴趣的观察者们被相互矛盾的控诉和反诉淹没，即使是专家也极难不偏不倚、客观地评价该冲突。

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剥去这层修饰。接下来，本书将在现实政治（realpolitik）框架内，用平衡的方式对西藏问题进行剖析，重点放在参与各方的策略。

尽管本书将讨论文化生存和人口转移等话题，本书并不特别讨论西藏的个人人权侵害问题，例如虐待犯人或逮捕和平政治示威的僧侣。这些人权问题存在，而且应受到严厉谴责，但他们不是问题的中心。西藏问题的存在远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也先于当代西方对普世人权的兴趣。事实上，如果西藏没有人权侵害，如果西藏人能够和平地发表不同政见，西藏问题仍然象现在一样充

满争议。西藏问题是一个领土控制问题——关系到谁统治它，谁住在那儿，谁决定西藏事务。

我们必须先澄清“西藏”的含义。西藏人种分布的区域和西欧一样大。他们不止分布在中国，也在印度（拉达克[Ladakh]，锡金[Sikkim]，奈尼塔尔邦[Uttar Pradesh]北部和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尼泊尔和不丹。在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报告四百六十万西藏人分布在两个主要区域——46%在西藏自治区(TAR)，54%在中国西部的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3]前者——通常指“政治西藏”——等同于近代达赖喇嘛政府统治区域。后者——民族的西藏——对应历史上不同西藏土著国家占领的边陲区域。休·理查德森(Hugh Richardson)，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拉萨(Lhasa)担任殖民地印度政府官员的英国外交官，这样解释这种区别：

直到1951年，西藏政府连续统治着“政治”西藏。这片区域以外，往北和东〔民族——译注〕西藏的安多(Amdo)和康(Kham)]……是它的“民族”扩展，藏人一度占据那儿，现在也仍然占多数。在这片更大的区域，“政治”西藏仅在一些地方间断行使管辖权；在大多数地区，当地世俗或僧侣长官控制这些大小不断变更的区域。18世纪，汉人开始零星渗透这些区域。^[4]

历史上民族西藏和政治西藏的这种区别成为西藏问题的各自表述的战场的一部分。例如，因为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个主要政治目标就是重新统一中国的所有藏区为一个“大西藏”，他们通常使用“西藏”这个词来表述民族西藏区域和政治西藏区域发生的事件，试图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近代史上存在着“大西藏”。如此，尽管政治西藏1950年10月被入侵，西藏流亡政府宣布西藏早在1949年即被入侵，当时，中国军队“解放”了民族西藏的青海，四川和甘肃省藏区。^[5]类似的，为了制造一种印象，即20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西藏已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宣称，西藏代表参加了中国政府的会议，暗示他们来自拉萨，但实际上他们来自民族西藏。为了避免这种混淆，除非另外注明，本书中“西藏”一词指的是政治西藏。

很难以现代西藏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主题著书，因为很多关键信息来自要求匿名的个人。尽管如此，让我广泛地描述本书中所用到的原始资料。

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是中国媒体，例如，美国国外广播信息服务(FBIS)译本包含的内部广播。另一个消息来源包括西藏流亡政府（或他的支持者们）发布的材料，例如，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西藏新闻观察(Tibet Press Watch)》，或者《世界西藏新闻(World Tibet News)》。伦敦的西藏信息服务(Tibet Information Service)发表的报告和档案提供了另外一个有用的数据和分析的信息来源。

除此之外，我自己在中国的大量的实地调查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库。过去 12 年来，我在西藏进行了广泛课题的研究，包括语言、游牧民、僧侣、现代历史和农业发展。我在那居住了整整两年。这些研究使得我能得到城市和农村生活的第一手观察；而且，因为我能说、读藏文，我能在无需向导和翻译的情况下容易地和各行各业的藏人打成一片。很多藏人乐于和我分享他们的看法和观点，因此，尽管他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本书中，我愿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同样，我感谢中国，西方和西藏流亡社区的许多官员，学者和知识分子，他们也和我讨论一些重要的问题和事件。不幸的是，他们也必须保持无名。尽管有这种帮助，我为本书中的观点负最后责任。

另一方面，如果我不感谢我的研究的赞助方，那会是一种失职。他们是，美国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the United States' s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国家地理协会研究和探险委员会(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s Committee on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美国国家人文研究捐赠基金(the U.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the 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我也非常感谢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他们慷慨资助我在西藏的研究工作，促进我和拉萨的西藏社会科学学院的长期关系。

最后，我想感谢本书的编辑，加州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的 Sheila Levine 和 Laura Driussi。他们对这个项目的支持和他们加速本书出版的能力堪称奇迹。

帝国时期 [\[回目录\]](#)

西藏和中国的政治接触始于公元 7 世纪，当时松赞干布王(King Songtsen Gampo) 统一西藏。他创建的王朝持续了两个世纪，扩张了西藏的领土：向北，今天新疆大部；向西，拉达克/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向东，安多和康——今天甘肃、青海、四川和云南省的一部分。因为西藏向东和向北征服的一些地域是中国唐朝(618-907)的附属小国，中国人对这个强大王朝的崛起充满戒备。松赞干布迎娶了一个中国公主作为新娘。公元八世纪，当中国停止向西藏缴纳贡品时，西藏军队抢劫了唐朝首都长安（西安）。^[1]九世纪前期，西藏和中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约定双方边界，中藏关系得以正规化。^[2]很明显，在此帝国时期，西藏不附属于中国。两者都是清晰的独立政体。

在这些国王的年代，西藏在一种北印度文字的基础上创建了书写文字，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西藏逐渐成为更成熟的文明。大约公元 779 年，在离拉萨不远的桑耶(Samye)建造了第一座寺庙。然而，佛教的传入制造了西藏内部的冲突，传统萨满苯教(Bon)的信徒强烈反对佛教成长壮大。最后，这种冲突导致王朝的瓦解，九世纪中期，支持苯教的国王因其灭佛政策，被愤怒的佛教僧人暗杀。

接下来两百年西藏衰落了。一度强盛的帝国成为一些破碎的，分裂的地方自治政权。佛教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驱逐出西藏中部。后来，公元十一世纪，印度的佛教上师们例如阿底峡尊者(Atisha)访问西藏，激起了佛教复兴的火花。西藏喇嘛和他们的信徒建造新的庙宇，逐渐发展成为西藏佛教的不同教派。因为没有中央政府，最重要的一些教派，萨迦派(Sakya)，噶玛噶举派(Karma Kargyu)和止贡噶举派(Drigung Kargyu)参与政治事务，支持势力强大的世俗官员，同时也得到他们的支持。

这个时期在中国，公元 905 年，强大的唐王朝崩溃了；和西藏一样，中国经历了一段分裂时期（史上称为五代，907-960）。这一时期，一系列缓冲国占据了中国和西藏之间的疆土。没有证据显示此时西藏和中国之间存在政治关系。类似的，在宋朝(960-1279)的三个世纪，不存在藏中政治关系。这个时期的中国历史也很少提到西藏。^[3]

所有这些在十三世纪发生了变化，一个新兴势力在亚洲腹地的中心地带崛起。

西藏和蒙古 [\[回目录\]](#)

公元十二世纪后期，成吉思汗(Genghis Khan)统一蒙古各部，发动了世界史上空前猛烈的大征服。蒙古军队横扫蒙古高原和山脉，征服了广阔的领域，包括西藏。1207年，西藏不流血地归服蒙古。西藏向成吉思汗纳贡，蒙古军队没有入侵西藏，也不介入西藏各政府的行政管理。

1227年的成吉思汗之死引发了重要的变化。西藏人停止向蒙古纳贡，新的大汗，窝阔台(Ogedai)，命令他的儿子阔端(Godan)率领一支骑兵进攻西藏。他们到达离拉萨很近的地方，劫掠了一些重要的寺庙，杀死数百名僧侣。在这次进攻中，阔端的大将收集了一些关于重要的宗教和政治领袖的资料。1244年，基于这些报告，阔端派人请萨迦派的一个著名的喇嘛——萨迦班智达(Sakya Pandita)——到他的宫廷，现在的甘肃省。1247年，萨迦班智达抵达，宣布西藏全面归顺于蒙古的统治。他同时给阔端和他的官员授法，被任命为代理摄政负责西藏事务。萨迦班智达送回一封长信回西藏，告诉他的同胞，抵抗蒙古人是徒劳的，指示他们必须纳贡。根据藏文资料，信中还说：

王子告诉我，如果我们西藏人在宗教事务上帮助蒙古人，作为回报他们会在世俗事务上支持我们。如此，我们的宗教能够传播得更远。王子刚刚开始学习理解我们的宗教。如果我呆更长时间，我确信我能把佛教信仰在西藏以外传播，以此帮助我们的国家。王子已供我所需，让我安心地讲经说法。他告诉我，他会善待西藏，我须为他行善。^[4]

于是开始了这段奇怪的关系——西藏人称之为供施（藏语为 mchod yon）关系。西藏喇嘛提供宗教指导；举行宗教仪式，做出预言，进行占星活动；授予可汗一些奉承的封号例如“宗教保护者”或者“宗教法王”。作为回报，可汗保护和提升“受供者”（“喇嘛”）的利益。喇嘛们也成为蒙古人统治西藏的有效代理。

阔端的后继者是最伟大的蒙古统治者之一，忽必烈汗(Kublai Khan)。1260年，他成为全蒙古的大汗；1279年，忽必烈征服中国，建立元王朝。此时萨迦班智达已死，他的后继者是他的侄子八思巴(Phagpa)。八思巴和这位超级强大的可汗

建立了特权关系。忽必烈成为佛教的大施主，同时特别眷顾萨迦派。八思巴做为他的帝师，同时也是他治下的西藏统治者。然而，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关系很复杂。在这种“供施”体系中，八思巴远非王座的被征服者。西藏和蒙古档案中记录了两人之间一个令人惊奇的争执，显示出西藏喇嘛在蒙古人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忽必烈请求八思巴为上师，八思巴同意了，但坚持忽必烈要尊崇他无上的宗教地位。忽必烈开始拒绝，但最终缓和，同意当他私人听法时，上师处上座；而在其他场合汗王处上座。^[5]

当代中国学者和官员认为此时期西藏第一次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相反，西藏民族主义者，只接受西藏象中国一样被蒙古征服，被蒙古帝国合并，只不过帝国以中国为中心。

萨迦政权统治西藏约一个世纪，直到 1358 年，被一个地方长官推翻。元朝当时很虚弱，只能默默接受此事实。实际上，十年后，元王朝自己被推翻，被一个汉人的明王朝替代。明朝期间，西藏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持续发展。但是不象元朝，明朝皇帝(1368-1644)无力在这一区域行使管理权。明朝皇帝给西藏人很多封号，但并不象蒙古人那样授予统治权。通过授予在位的西藏人一些封号，明朝皇帝只不过是承认政治现实。^[6]

到十七世纪，西藏和中国的政治事件中可以看到两个新势力的崛起。

西藏格鲁派的崛起 [\[回目录\]](#)

当十三世纪西藏臣服于蒙古时，格鲁派，或黄帽派，也就是达赖喇嘛的教派还不存在。西藏几个“红帽”佛教教派占优势，例如萨迦派和噶举派。十四世纪后期，格鲁派，这个后来西藏最大的教派才出现在历史舞台。1372 年，一位名叫宗喀巴(Tsongkapa)的杰出安多僧人到西藏中部向当时的所有大喇嘛求学。魅力超凡的宗喀巴发现，西藏中部佛教的道德沦丧已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尤其是关于单身的誓约。他开始宣扬革新教律，强调严格单身誓约的戒律，提倡通过经院式学习达致悟境。这标志着格鲁派的诞生，格鲁的藏文意为“善规”。

1408 年，宗喀巴在拉萨中心召集了一个月的祈祷大法会，此后成为传统佛事。1409 年，他在拉萨东 43 公里的山脊上建造了自己的庙宇——甘丹寺(Ganden)。

他开始著书传教，吸引了一些虔诚的信徒，他们传播他的教义，创建了一个有活力的佛教新教派。为了与以前的教派区别开来，宗喀巴的追随者们戴黄帽而不是红帽，因此也被称为黄帽派。在短时间内，宗喀巴的弟子们建造了格鲁派两个最大的庙宇——哲蚌寺(Drepung, 于 1416 年)和色拉寺(Sera, 于 1419 年)。这两座寺庙座落在拉萨城外，到 1950 年，这两座寺庙发展成为小的僧尼城市，容纳多达 15,000 名僧侣。另一位宗喀巴的著名弟子，根敦珠巴(Gendundrup)将格鲁派的影响扩展到西藏东南部(后藏，Tsang)，1445 年，他在日喀则(Shigatse)附近建造了著名的札什伦布寺(Tashihunpo)。

随着宗喀巴的追随者在贵族中赢得支持，格鲁派成长壮大。这造成了其他教派的怀疑和敌意，这些有势力的老教派如噶玛噶举和政治西藏的统治者仁蚌(Rimpung)国王们（以及后来的藏巴[Tsangpa]国王）结盟。实际上，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早期，西藏历史充满了内战和宗教冲突。黄帽派僧侣不断和噶玛噶举以及他们政治上的支持者们发生冲突。例如，1498 年，仁蚌国王竟然禁止色拉寺和哲蚌寺的黄帽派僧人参加宗喀巴创建的祈祷大法会，只允许噶举派和萨迦派僧人参加。到十七世纪早期，这种教派冲突恶化了。1618 年，格鲁派和支持噶玛派的藏巴国王发生纠纷，国王的军队杀死了大量格鲁派僧人，占据了色拉寺和哲蚌寺，禁止寻访刚刚死去的四世达赖的转世。格鲁派以牙还牙，1633 年在几千名蒙古支持者的帮助下，还击并打败了藏巴国王在拉萨的卫戍部队。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了和平协议，蒙古人再次在西藏的内部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次是作为达赖喇嘛——格鲁派主要的转世活佛——的武装军队。

将转世作为宗教传承的方法在黄帽派出现之前数百年前即已出现，1193 年，噶玛噶举发展了这种方法。这个主意来自佛教教义，所有人都陷入生、死、再生的轮回中，直至达到涅槃（悟境）。在大乘佛教学派（藏传佛教属于其中一个分支）中，一些得悟者（菩萨，bodhisattvas）推迟他们从生与再生轮回中的最后解脱——涅槃——返回人间普度众生。

十二世纪后期，伟大的噶玛喇嘛都松钦巴(Düsum Khyempa)用这一概念预言他自己的再生；他死之后，他的门徒发现了他们认为的化身儿童。那个儿童被认为是都松钦巴在一个新的肉身内，因此老喇嘛的神授权威和地位现在由他继承。在一个不同宗教教派为世俗供奉竞争的世界里，这种再生形式的宗教和政

治优势十分显著，因此很快为西藏宗教界普遍接受。再生喇嘛发展出世系，某种意义上其功能和公司类似，开始拥有财产和农民，在代际之间保留合法身份。最初的大喇嘛的新的化身构成了不间断的继承世系。只要所有人认可寻访过程的正当性，神圣喇嘛的强大的神力成为惯例，供奉的中心得以延续。因此，1474年，当最重要的宗教领袖根敦珠巴（扎什伦布寺的创建人）逝世的时候，毫不奇怪，黄帽派也接受了这一传统。他的信徒们寻找并在根敦嘉措（Gendun Gyatso）身上找到了他的转世，这个小男孩就成为新的转世世系的二世。1543年，根敦嘉措逝世，他的灵魂投射到另一个男孩的肉身上，索南嘉措（Sonam Gyatso）成为这一喇嘛世系的三世。

索南嘉措使命感强烈，积极弘扬黄帽派教义。他的声名为强大的蒙古可汗俺答汗（Altyn Khan）所闻，可汗邀请索南嘉措去拜访。1578年他们在今天的青海省（安多）会面。可汗为索南嘉措的精神和宗教力量所感动，这次他们互赠尊号。喇嘛提升可汗相对于其他蒙古首领的地位，赐封为“睿智贤明的转轮王”；可汗赐封索南嘉措蒙古封号达赖，蒙古语，意为“海洋”：暗示他的智识或灵力象海洋一样宽广。这就是达赖喇嘛这个封号的由来。索南嘉措是拥有这一封号的第一人。但因为他是黄帽派这个活佛世系的三世，他被称为三世达赖喇嘛，并追认他的两个前生为一世和二世达赖喇嘛。

索南嘉措生命的最后十年在蒙古和临近的康和安多地区度过，传扬教义，为黄帽派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他和蒙古的关系。这种成功很大程度上以牺牲老的噶玛噶举派和佛教之前的苯教为代价。1588年，索南嘉措逝世，格鲁派—蒙古的联系在他的转世过程中得以强化，四世达赖喇嘛在蒙古被发现，他的肉身正是俺答汗的曾孙。1601年，在一些黄帽喇嘛随从和专程前来的贵族陪同下，四世达赖喇嘛到达拉萨。一个武装的蒙古代表团担任他们的护卫。从此，新的黄帽派和蒙古紧密相联。十七十八世纪，这种密切的宗教/政治关系成为中藏关系的关键一环。

蒙古四世达赖喇嘛死于1616年，在拉萨不远的西藏中部发现了他的继承者五世达赖喇嘛。他的青年时期，教派斗争激化，藏巴国王的助手开始迫害康区的格鲁派僧人和学院，并谈及进入西藏中部攻击格鲁派的主要中心。格鲁派害怕这

是扫除他们教派的联合行动之始，转而求助于他们的蒙古拥护者固始汗(Gushri Khan)。

固始汗是和硕特部的首领，和硕特部位于准噶尔，今天新疆东北部，是西蒙古的一支。作为达赖喇嘛的追随者，他响应喇嘛的求助。1637年和1640年之间，他打败了安多和康区反对格鲁派的军队，把他的整个部落搬迁到安多。然后，应五世达赖喇嘛的总管索南饶丹(Sonam Chöpel)之请，固始汗发兵西藏，进攻藏巴国王的老巢日喀则。格鲁派派遣支持者的军队和僧人帮助他，1642年，他们攻下日喀则。西藏国王（藏巴国王）被处死。

固始汗将整个西藏的最高权力奉呈给五世达赖喇嘛，任命达赖喇嘛的总管索南饶丹为摄政，进行日常事务的管理。黄帽派的主要竞争对手，噶玛噶举派咽下了失败的苦果，受到格鲁派政府的迫害。他们的财富和财产被没收，许多僧侣被迫改信格鲁派。由此，黄帽派在规模，势力和财富方面迅速超越了其他教派。

在一个国家使用外国军队夺权是危险的；请神容易送神难。西藏就是如此。固始汗为他的喇嘛赢得西藏之后没有收拾军队回到安多。他和其子孙自封为西藏之王，继续留在卫藏，夏天在拉萨北面的牧场度过，冬季则在拉萨。新的黄帽派政府的军权还在他手上。达赖喇嘛和摄政管理国家，但很明显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要尊重国王的意见。

格鲁派统一西藏之时，中亚血统的另一个部落，满族(Manchu)正处在征服中国的最后阶段。1644年他们创建了新的王朝——清朝——一直持续到1911年。二者掌权之前，格鲁派和满族仅有粗略的接触，但是后来，清朝皇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他同意了，于1656年抵达北京。清朝皇帝以崇高的礼仪款待达赖喇嘛。这次会见不表明西藏喇嘛一边政治上的任何从属地位。达赖喇嘛有和硕特部的军队做后盾，他在其他蒙古部落中也有广泛的追随者，其中一些正威胁着清朝，他可不是等闲视之的人物。

西藏的稳定一直持续到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逝世。此时转世继承的弱点导致了一段衰落期。已故喇嘛到他死后才转世出生。这样当新的转世喇嘛年幼时，不可避免的总有15到20年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其他人试图以他的名义进行统

治。五世达赖喇嘛逝世后，当时西藏的摄政桑结嘉措(Sangye Gyatso)密不发丧。他的动机或者是贪恋权位，或者是害怕会引起大动乱；他假称达赖喇嘛入定修行，不能被打扰。就这样，他愚弄大众，以五世达赖喇嘛之名统治西藏 14 年，直到 1696 年秘密被公开为止。

这段时期，摄政暗中勾结强大的准噶尔蒙古部落，他们的首领噶尔丹(Ganden)曾在拉萨主要的格鲁派寺庙做过僧人。看起来西藏摄政鼓励准噶尔人（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统一全蒙古。1682 年，准噶尔人攻打东蒙古（喀尔喀 [Khalkha]），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一个新的统一的蒙古似乎成为可能。

我们可以猜测，摄政想用准噶尔人的力量来平衡西藏和硕特蒙古部落的军事势力，甚至可能想把他们赶出西藏，回到安多。他也可能觉得如果准噶尔人统一蒙古，达赖喇嘛在蒙古的势力和威望能得到加强，因为准噶尔人把达赖看成是他们的大喇嘛。但是这位摄政在玩一个高危险的游戏：准噶尔人是有能力挑战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个部落，和他们为伍就意味着反对清朝的利益。

无论如何，准噶尔统一全蒙古的企图失败了。战败的东蒙古部落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皇帝接受了他们的归顺，以为准噶尔的精神领袖五世达赖喇嘛还活着，于是请求他运用他的宗教权力劝说准噶尔人停止入侵。摄政没有告诉清朝皇帝达赖喇嘛已死，表面上他派了一名喇嘛的使者去劝准噶尔人停止入侵，但他又公开举行宗教仪式祈祷胜利。准噶尔人继续向南，兵发内蒙古。此时清朝皇帝派大军抵抗，1696 年大胜于蒙古克鲁伦河(Kalulun River)。噶尔丹自杀。准噶尔对清朝的威胁结束了，但是对清朝皇帝而言，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皇帝意识到西藏喇嘛的重要性和西藏摄政在政治上不值得信赖。

很快，清朝得到了一个干预西藏事务的绝好机会。1697 年，当固始汗的孙子拉藏汗(Lhabsang Khan)继位藏王的时候，他开始着手恢复他的祖父固始汗行使的政治权力。这样他就和西藏摄政直接发生冲突，后者希望在他治下排除蒙古人的影响。

拉藏汗争论的焦点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行为举止。五世达赖喇嘛死后，这个男孩很快被确定位新的达赖喇嘛。但是因为摄政匿不发丧，他只能宣布这

个男孩是另一位喇嘛的转世。于是，直到 1697 年，五世之死公之于众，仓央嘉措才举行六世达赖喇嘛的坐床仪式。

然而，六世达赖喇嘛在态度和价值观上行为异常，拒绝做一个独身的宗教僧人。他宣布放弃沙弥戒，成为一个著名的放荡不堪的人物，写情诗，晚上在拉萨与女人寻欢作乐。拉藏汗和其他一些人认为，摄政玩忽职守，没有坚持达赖喇嘛的行为应该象一个真正的喇嘛。这个指责是真实的指控，还是攻击摄政的一个借口，现在还不清楚。总之，摄政和拉藏汗的关系持续恶化，1705 年，拉藏汗在清朝皇帝的支持下，和一些西藏贵族家族结盟，进攻拉萨，打败了摄政的军队。摄政被处死，拉藏汗成为名至实归的西藏之王。

中国皇帝派特使去拉萨，承认可汗为皇帝保护之下的西藏统治者。可汗，作为这种支持的回报，同意定期向清朝缴纳贡赋。拉藏汗从而将自己和西藏置于清朝的附属地位。拉藏汗还正式宣布仓央嘉措不是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经清帝同意，将他押送北京；声称另一个适龄的僧人才是真的六世达赖。拉藏汗对西藏的军事控制使他得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但是他的安排激怒了僧俗大众，他们继续认为仓央嘉措才是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当仓央嘉措死在去北京的路上，谣言迅速在西藏传播开来，根据他在死前写下的一首优美的诗歌，他已在理塘(Litang, 在康区)投胎转世。

洁白的仙鹤啊，
请把双翅借给我。
不飞遥远的地方，
只到理塘就回。^[1]

当拉萨的不满进一步升级，拉萨附近的三大格鲁派寺庙的僧人转而向格鲁派的蒙古追随者——准噶尔——寻求帮助，希望他们能帮助推翻拉藏汗和他的假达赖喇嘛，认定理塘的男孩为七世达赖喇嘛。

1717 年，七千准噶尔骑兵进入西藏，在众多西藏僧俗民众的帮助下，很快打败了拉藏汗，拉藏汗战死。准噶尔人任命了新的西藏摄政，废除了拉藏汗指定的“假”六世达赖喇嘛，逮捕并处死了一些拉藏汗的亲信贵族和喇嘛，成为新的西藏统治者。但是，蒙古人大肆劫掠，杀害一些红帽喇嘛，很快激怒了西藏

人。关键的是，他们承诺将新的七世达赖喇嘛从安多带到西藏，却失败了。清朝皇帝和他的同盟者理解达赖喇嘛的政治重要性，抢先一步将理塘灵童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反对准噶尔人的情绪在拉萨迅速增长。

这时，两个重要的西藏贵族——颇罗鼐(Pholhanas)和康济鼐(Khangchennas)——开始在西藏西部和西南部组织军队反抗准噶尔人；清朝皇帝，康熙，应拉藏汗战败前的请求派遣一支军队进入西藏。清朝军队被准噶尔部歼灭，北京的大多数朝廷官员都反对在西藏的进一步军事行动，但是皇帝认为西藏是中国西部（四川、甘肃和云南）的一个重要缓冲区，不愿意让它被他的敌人，准噶尔人控制。^[8]因此，他派第二支更强大的军队去西藏，带上年幼的七世达赖喇嘛。当清军从安多和康区进入西藏，颇罗鼐和康济鼐的藏军也从西南进军拉萨。这次准噶尔人被击败，1720年10月，清军和新的七世达赖喇嘛进入拉萨。清军现在控制了拉萨和西藏。

清朝皇帝无意将西藏纳入中国统治。他的目标是控制西藏难以驾驭的领袖，特别是要阻止西藏喇嘛用他们的宗教力量影响蒙古，损害清朝利益。过去，清朝试图通过封号和礼物赢得象达赖喇嘛这样的西藏高级喇嘛的友谊和忠诚，但是这种方法被证明是不够的。现在，清朝决定与西藏建立一种松散的保护关系，保证清王朝的利益。强大的清王朝会保护西藏不受内外冲突侵扰，让朝廷批准的西藏领袖统治西藏，而不危害清朝的利益。十八世纪，清朝维持了这种消极霸权结构，被迫三次派兵进入西藏。

清朝在西藏的管理做了一些重要变化。他们认定十五岁的理塘灵童为七世达赖喇嘛，安置在布达拉宫(Potala Palace)；逮捕和处死了一些主要的亲准噶尔官员，包括准噶尔任命的西藏摄政。清朝在拉萨建造了一所兵营，驻扎数千军队，以此加强朝廷在西藏的统治。他们同时废除了摄政一职（1642年由和硕特蒙古人设置），1721年代之以四名首领大臣（kalön，噶伦）的集体领导，其中之一，康济鼐为首席噶伦。四名噶伦都是重要的西藏世俗官员，支持拉藏汗，反对准噶尔入侵。

德斯得里(I. Desideri)，一个基督教神父此时住在拉萨，他记录这次事件时预言到：“西藏经过近二十年的骚乱与灾祸，1720年10月臣服于中国皇帝，他的子孙后代将会持续统治数个世纪。”^[9]由此，格鲁派和噶玛噶举派的宗教冲突

先将西藏置于和硕特蒙古部的控制之下，然后是准噶尔蒙古部，最后是清朝；后者从此统治西藏直到他们 1911 年在中国下台。

1720 年的清朝行政改革未能奏效。用几名噶伦代替一个大权独握的摄政本想达到稳定的势力平衡，但却造成了痛苦的纷争。1727 年，另外三位噶伦暗杀了首席噶伦康济鼐，又试图杀害支持他的颇罗鼐大臣，内战爆发。颇罗鼐逃脱了暗杀阴谋，回到他的家乡西藏西南部和西部，召集军队进攻拉萨。1728 年 7 月，他打败了其他噶伦，控制了这座城市。

早在 1722 年，当西藏噶伦抱怨西藏的封建经济仅能维持基本生计，无法供养数千清兵；皇帝因此撤回了他在拉萨的兵营。所以此时拉萨已没有清兵来恢复秩序。后来，当皇帝得知发生在西藏的政变，他不得不（在十年中第三次）派遣一支帝国军队进入拉萨。这支军队在颇罗鼐夺城后两个月后才抵达拉萨。此时局势已经安定，颇罗鼐控制了发动政变的噶伦，因此清朝将领和颇罗鼐联合成立法庭，下令处死那三位噶伦，他们的家人和其他一些卷入其中的官员和喇嘛。他们任命了新的噶伦，颇罗鼐显然支配全局，被确认为首席噶伦。二十二岁的七世达赖喇嘛，则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因为他的父亲似乎和下台的噶伦以及准噶尔人串通，他和他的父亲一道被流放到康区。

清朝实施了新的行政改革，希望能够稳定西藏的局势。为了确保法律和秩序，清兵重新在拉萨设立兵营，驻军两千。另在西藏东部昌都(Chamdo)设立一千人的付营，以便增援。除此之外，皇帝现在决定派两名满族将军（称之为驻藏大臣，*amban*）常驻拉萨，命他们注意西藏领袖动向，监督拉萨的兵营。^[10]清朝的驻藏大臣常驻拉萨从此一直持续到 1912 年。

清朝同时大幅缩小西藏和中国边界上的西藏领土，以此削弱西藏。1728 年，康区的三个大的藏人区域划归四川省管辖，另外三个划归云南省。^[11]安多或库库诺尔(Kokonor)则早在 1724 年统治该地的蒙古可汗叛乱后，改由西宁管辖。

1728 年，皇帝试图进一步分裂西藏，他提议黄帽派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管理整个西藏西南部（后藏, Tsang）和西部。班禅喇嘛拒绝了这一提议，但最终接受统治后藏的三个大区。于是，拉萨政府现在统治着一个小得多的政体。

1728年的改革奏效了，接下来的九十年，西藏内部平安无事。颇罗鼐是一个强有力的行政官员，他施政得力，政府稳定，同时巧妙地赢得了驻藏大臣和清朝皇帝的信任。他很快劝说北京把拉萨的兵营减少到五百人，1735年，带回流放中的七世达赖喇嘛，但将他排除在西藏管理之外。达赖喇嘛现在只不过是一个精神领袖。1739年，清朝皇帝封颇罗鼐为郡王，基本上成为西藏之王。两个驻藏大臣还在拉萨，但不参与日常管理；颇罗鼐决定西藏的大小事务。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写到，颇罗鼐“在西藏做出决定，仅在实施方面咨询驻藏大臣。”^[12]

1747年，颇罗鼐去世，他的儿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Gyurme Namgye)继承郡王之位。在五世达赖喇嘛统一西藏之后一百年，西藏现在是清朝的属地，统治者不是达赖喇嘛，而是一个世俗贵族家庭。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对清朝的态度和他父亲大相径庭。颇罗鼐巧妙地处理中藏关系，谨慎地表露出对清朝的友谊和忠诚，作为回报，他能够按照地方风俗和价值观自由地管理西藏。他的儿子则相反，试图从西藏驱除清朝统治的任何痕迹。他向乾隆皇帝抱怨说，清军无需驻扎在西藏，皇帝的专员，驻藏大臣干涉他的管理，剥削人民。因为西藏已经和平无事二十五年，皇帝同意。拉萨兵营减少到象征性的一百人，指示拉萨的驻藏大臣不要干涉西藏管理。他也同意额外拨款负担驻藏大臣和驻军的开销，以此减轻劳役（即，强迫劳动的税收方式）。但是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想把驻藏大臣和所有的军队赶出西藏。他开始组建自己的藏军，而且他错误地开始勾结清朝的宿敌，蒙古准噶尔部。

当驻藏大臣们得知这些诡计，他们把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诱骗到他们在拉萨行辕，杀害了他。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随从而后进攻驻藏大臣行辕，杀死了驻藏大臣和他们的卫兵。其他数百名中国人逃到布达拉宫，寻求七世达赖喇嘛的保护，得以幸免。清朝皇帝乾隆派遣大军远征西藏。

七世达赖喇嘛在这个政治真空期介入了。他制止叛乱，阻止杀害汉人和满人，任命一个世俗贵族领导政府，逮捕叛乱领袖。这样，清朝军队到达以前，在达赖喇嘛的权威下，拉萨秩序已经恢复。清朝将军公开处死了一些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随从。1723年和1728年，再次改变西藏政治结构。这一次，他们起草了一份正式重组计划《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希望长久稳定西藏政局。在长期通过一个世俗贵族家庭控制西藏之后，清朝现在恢复达赖喇嘛为统治

者，但是提升了驻藏大臣的作用，让他更直接地参与西藏内部事务。同时，清朝增加关键位置上的僧官，以此平衡世俗贵族的势力。例如，新的噶厦机构中四大噶伦中一个为僧官；自此，拉萨周边的三大格鲁派寺庙（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寺主和总管（计苏，chiso）也参与重大事务，和噶厦一起讨论。

[\[13\]](#)

接下来几十年内，西藏一直处在和平之中，但是这个国家既弱小又分裂。1788年，西藏和尼泊尔的纷争导致尼泊尔人的突袭，西藏人无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尼泊尔人劫掠了班禅喇嘛的主寺札什伦布寺，占领了西藏西南一大片地域。清朝皇帝派中国大军到西藏，和藏军一起于1792年赶走了尼泊尔人，强迫他们乞和。这是十八世纪清朝第五次派兵。

在没有中国外援的情况下，西藏人居然无力驱除尼泊尔军队；另外清政府还收到一些西藏政府管理和组织不力的指控。清朝再次重组西藏政府，这次通过一篇书面计划《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这次改革方案包括：用金瓶掣签来选择象达赖和班禅喇嘛这样的高级喇嘛（呼图克图hutuktus）的转世灵童，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选择转世灵童被政治上强大的世俗家族操纵。[\[14\]](#)在一些重大管理事务和任命上，方案授予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同等政治权威；要求高层官员如噶伦的提名必须提交皇帝批准。这次改革还包括一些法令：禁止滥用劳役剥削农民，禁止达赖和班禅喇嘛在世期间其家人担任公职。而且，清朝兵营现在驻扎在靠近尼泊尔边界的日喀则和定日(Dingri)。[\[15\]](#)

远征军大帅福康安(Fu Kangan)，在写给达赖喇嘛的信中这样阐述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则：

惟藏中事务向来毫无制度，达赖喇嘛惟知坐静安禅，不能深知外事，噶伦等平时任意舞弊，有事又不能抵御，必当更定一切章程，俾知遵守。今蒙大皇帝训谕周详，逐加指示，交本大将军等详细筹议，以期经久无弊，藏番永资乐利。达赖喇嘛既知感戴圣恩，将来定议时，自当敬谨遵依办理。倘或徇于积习，则撤兵后，大皇帝即将驻藏大臣及官兵等概行撤回，以后纵遇事故，天朝亦不复管理，祸福利害，孰重孰轻，惟听自择。[\[16\]](#)

福康安的评论揭示了北京对他的西藏属地领袖的失望。北京寻求一个不制造麻烦的和平的西藏，却发现在不到七十年期间不得不五次派兵。达赖喇嘛同意这些章程，并保证他的噶伦们也会按章行事。

1792年二十九条章程后的岁月里，驻藏大臣行使了他们最大的权威，但是他们不谋求将西藏吸收为中国的一个省。西藏保持了它自己的语言，官员，法律系统，不向中国缴纳赋税。实际上，1792年的改革还包括创建西藏第一支常备军，皇帝的目的是让西藏能够自卫，避免需要再派军队。这个军团在近代更通行的名字是“中国培养的”（或 Gyajong）。

很难评估驻藏大臣在西藏的实际角色。尽管清朝制定了详细的规则，他们的权力因为各种因素的变化相当地不同，这些因素包括他们的个性和能力，与西藏领袖的关系，以及当时中国和西藏的政治形势。1792年清朝皇帝给他在拉萨的驻藏大臣的一则批复显示了，自1728年以来条文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通常，有能力的官员派到首都的职位任职；派到西藏的多是中庸之辈，他们实际上啥事也不干，等着任期结束返回北京。因此，达赖喇嘛和噶伦可以在西藏事务上为所欲为，视此无能官员如无物。如此，驻藏大臣变得有名无实。从今以后，驻藏大臣须有效监控西藏的管理……达赖喇嘛和噶伦不应垄断权力。^[17]

然而，十九世纪肇始，清王朝内外交困，内有太平天国起义(1848-1865)，外有西方侵入的鸦片战争(1839-1842)，地位窘迫。毫不惊奇，西藏的驻藏大臣权力消逝，清朝皇帝对西藏的介入也减少。由此，在没有中国卷入的情况下，西藏1841-1842年与锡金和拉达克开战，1855-1856年和尼泊尔开战。在和尼泊尔的冲突中，西藏被迫每年向尼泊尔缴纳贡品，接受一个尼泊尔人常驻拉萨，以及尼泊尔商人的治外法权。类似的，1877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选择未经过金瓶掣签，这违背清朝乾隆皇帝于1792年规定的程序。1897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两年后，他在选择高级官员时不再（根据1792年的章程）征询驻藏大臣的意见，而是直接进行任命。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姐夫（和前西藏政府官员）平措扎西(Phuntso Tashi)解释说，“一百多年来，西藏的执政者无法做到这一点。满族政府对此不高兴但是……他们对此无能为力。”^[18]到二十世纪之交，清朝对于西藏的霸权更加有名无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西藏问题进入了潜伏期——西藏

没有明确地试图切断他和北京的联系：它名义上尊敬皇帝，但是不再服从皇帝在拉萨的驻藏大臣。

当第三者进入画面的时候，这种放任自流的安排永久性地发生了改变，一系列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现状。

英国的介入 [\[回目录\]](#)

到十九世纪末期，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影响扩展到西藏边界，喜马拉雅地区的一串小国或政权成为英国势力范围。至早于 1861 年，印英政府批准了一个去拉萨的考察使团，并向中国申请许可。他们对西藏和印度之间可能发展出繁荣贸易给予厚望，希望印度能吸走稳定的中藏贸易中茶叶和制成品的一部分，而从西藏得到羊毛、兽角、毛皮、草药、金和麝香等。那时，西藏禁止进口印度茶叶。1876 年，英国在《芝罘条约》中获得中国批准此类使团，印度可以从中国向西藏派遣一支考察使团，经四川、甘肃，或者直接从印度到西藏。^[19]

1886 年，英国马科勒(Macaulay)代表团在锡金集合进入西藏。因为西藏人的反对，此使团未能成行；但这个使团提醒西藏派遣军队到锡金边界，宣示主权。这引来了 1888 年的英国进攻，将西藏人赶出这一区域。作为此战的结果，拉萨的驻藏大臣到印度去和英国协商。这次协商的结果是 1890 年条约，在条约中，中国承认英国对锡金的保护权，并描绘出锡金—西藏边界。三年以后，1893 年，在中英商贸条约中，中国同意在锡—藏边界西藏侧的亚东(Yadong)开设“商埠”，对所有英国商人开放。英国政府同时获许派遣官员常驻亚东（西藏），监督该处的英国贸易。

但是，西藏没有参与这些协约，对其实施也不合作，形成了僵局。这就是 1899 年寇松勋爵(Lord Curzon)上任印度总督时的局面。他意识到中国对西藏事务没有实际控制权，于是他得到伦敦许可，试图和西藏建立直接通道，发展关系。十三世达赖喇嘛（1895 年亲政）对和英国发展关系不感兴趣；当寇松给他写信，达赖喇嘛原封不动地退还这些信件，回复说，中国人不喜欢达赖喇嘛和英国人通信。^[20]由于不能启动和西藏政府面对面的会谈，1903 年，寇松说服伦敦，派遣一支远征队强迫西藏谈判。但西藏人拒绝和远征队会谈，英国军官和

他们的印度军队逐渐深入拉萨，表面上是想劝诱西藏人谈判。西藏军队试图阻止他们前进，一系列战役之后，西藏人被轻松击败，损失一千多人。仅在古如(Guru)之战中，几分钟内就有六、七百名西藏军人被杀。侵略者不可抵挡，英国军队 1904 年 8 月 3 日进入西藏首都拉萨。他们是第一支征服西藏的西方军队。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通过驻藏大臣）劝说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英国远征军谈判，以阻止他们的进逼；当远征军进入拉萨之际，和其司令荣赫鹏(Younghusband)会面。但是中国对达赖喇嘛没有控制力，喇嘛不理睬这些劝诫，逃亡蒙古，害怕他会被迫签署不平等条约。从蒙古，达赖喇嘛希望得到沙皇的支持反抗英国。

为了让英军从拉萨撤军，达赖喇嘛的留守官员勉强答应了英国的条款，这些条款被写入 1904 年英藏条约。条约上只有西藏和英国远征军司令的签字——满族驻藏大臣拒绝签名——这份条约承认英国对锡金的保护权，印度（印英政府）有权派英国商贸官员在三个西藏城市（江孜[Gyantse]，噶大克[Gartok]和亚东）开设商埠。条约中非常含糊地排除中国，同时更明显地排除其他国家例如俄国，在西藏发挥政治影响力。西藏支付了 562,500 英镑（合 7 百 50 万卢比）战争赔款，英国军队占领西藏毗邻锡金的一部分（亚东的春丕谷[Chumbi Valley]），直到赔款付清。条约也规定英国商贸代表可以访问拉萨，讨论条约相关问题。^[21]根据条约的精神，印英政府实际上将西藏变为另一个“自然态”保护国。

在西藏的战争和占领拉萨的新闻令许多伦敦人震惊，他们并未授权寇松征服西藏。英国的利益高于印度。考虑到香港和俄国，很快，英国外交官批评 1904 年英藏条约中获得的政治利益。大笔的战争赔款减少了三分之二，减至 168,000 英镑；英军必须在三年内撤出西藏春丕谷。类似的，派员访问拉萨（影响当地事务）的权力也被单方面放弃了。

尽管如此，最后的英藏协定仍然使西藏大门向英国利益敞开。它同时也制造了关系到中国的主要外交和法律问题。因为驻藏大臣没有在条约上签字（中国政府也没有批准条约），如果伦敦不打算放弃其中国政策，也不想让西藏成为其属地，或者接受西藏的独立国家状态，伦敦就不得不寻求中国同意这些既得利

益。英国的西藏策略中存在固有的矛盾：大英帝国直接和西藏政府打交道，以达到其目的；同时和中国打交道使之合法化。

对中国而言，整个事件不过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的另一个屈辱。清廷认为，因为达赖喇嘛轻率地忽略了中国让他和英国人谈判的命令，英国人才有军队和官员驻扎西藏。另外，英国和西藏的双边协定中含糊地声称要在西藏排除外国势力的政治影响。从过去半个世纪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来看，北京很容易怀疑，英国阴谋把中国排除在西藏事务之外。

但对中国而言，幸运的是，伦敦的中国政策并不想将西藏转化为英国属地，更不用说让西藏独立了。而且，英国迅速缓和了中国的担忧：双方进行谈判，以得到中国承认荣赫鹏赫西藏签订的协定。作为谈判的结果，1906年中英条约对1904年的条约进行了修改（西藏政府不参与其中），条约重申了中国对西藏属地的法律主权。条约中的关键条款写道：“大英政府不谋求并吞西藏领土或者干涉西藏内政。中国政府承诺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西藏领土或内政。”以及“[1904年条约中的]各项权利除中国能独享以外，其他外国不能享有。”^[22]于是，在中国已经无力在西藏行使实际权利之时，英国单方面重申西藏对中国的从属政治地位。

次年的英俄条约使局势更加国际化，第二条开始时说，“双方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在无中国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大英帝国和俄罗斯不单独和西藏进行谈判。”^[23]

中国的反应^{[[回目录](#)]}

入侵西藏和1904年拉萨条约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在此之前，清政府无意直接管理西藏或使之汉化。英国咄咄逼人的行动暗示北京，如果不立即行动起来，它在西藏的霸权地位可能失去；如果西藏成为英国势力范围，英国人就能从西藏高原俯视中国要地四川。尽管清政府虚弱不堪，处在崩溃的边缘，仍以惊人的活力做出反应。北京自己向英国支付战争赔款，使得英军很快离开了西藏领土；并开始更活跃地介入西藏的日常管理。这样，英国对西藏的偶然入侵，刺激中国保护其国家利益，开始着手从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更

紧密地把西藏和中国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同时，在民族西藏边界地带，赵尔丰制定新的政策，迅速将大多数本地自治的藏人政权变为中国政府治下的县郡。并且，似乎是一个恶兆，他猛烈抨击喇嘛和寺庙的地位。此时，流亡的达赖喇嘛日渐衰弱，他第一次到外蒙古生活，然后流亡到现在青海省的民族藏区。他向俄国沙皇的求助没有奏效；因为 1904 年中国政府因其逃亡宣布废黜他的达赖喇嘛称号，他的流亡地位也不稳定。尽管西藏人从未对他的合法统治地位有任何怀疑，但是自他离开以后，驻藏大臣逐渐掌控拉萨事务，这使得达赖在未和清政府获得某种保证他对西藏的控制权的情况下，不愿返回拉萨。因此，1908 年他去了北京。达赖喇嘛声称驻藏大臣没有如实把他的意图告诉北京，要求直接向皇帝上奏（即，象 1792 年改革之前，绕过驻藏大臣）。然而，北京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难以捉摸，且有独立倾向，不想放松对他的控制，粗暴地拒绝了达赖的请求；但同意他返回西藏继续统治。中英和英俄条约已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清廷感觉比起冒险替换达赖，通过他来统治西藏更为容易。但是他们对达赖的定位可以从给他的新的屈辱的封号中可以看出：“忠诚顺从的代理摄政。”^[24]

尽管如此，中国不相信达赖喇嘛的忠诚或者顺从，背着他采取措施，确保他服从北京的指示。残酷平定四川和云南藏区的赵尔丰，现在成为特使，从四川派遣一支数千人的军队，来保证达赖喇嘛服从。1909 年 12 月末，达赖喇嘛在因荣赫鹏远征军逃离拉萨五年之后，再次回到拉萨。他得知中国军队正在路上。达赖喇嘛绝望地向英国发出了下面的痛苦的请求：

尽管中国和西藏是一家人，但是中国官员赵[尔丰——译者]和驻藏大臣联[豫——译者]一起策划谋害我们。他们不把我的奏折原本递交给中国皇帝，而是根据他们险恶用心更改奏折。他们正派遣军队到西藏，想废除我们的宗教。请电告中国皇帝，请求他制止那些军队。我们十万火急，乞求列强干预，使得中国军队撤退。^[25]

向中国，他写道：

我们，被压迫的西藏人民，向您发出这一消息。尽管外面看起来还好，里面大虫正在吞噬小虫。我们坦诚以待，但是他们偷走了我们的心。军队已发往西藏，大警将起。我们已派人送信到加尔各答(Calcutta)，电告详情。请召回最近抵达康区的中国官员和军队。如果您不这样做，大祸将要来临了。^[26]

可是没有任何干预，军队于 1910 年 2 月进入拉萨；达赖喇嘛再次逃亡，这次向南到他先前的敌人，英控印度。

中国再次废黜达赖喇嘛，逐步增加西藏的实际控制，中国官员更加直接进行管理。建立了中国邮政机构，并发行了西藏的第一张邮票（汉文和藏文双语）。西藏似乎将被彻底并入中国。但是这一进程突然被打断，1911 年，清王朝被推翻了。

对于汉人而言，清朝皇帝是异族；他们摧毁了伟大的华夏，并使中国沦落到“东亚病夫”的悲惨境地。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蒙受了重重屈辱：例如，中国在 1894-1895 年的中日战争中被打败，把台湾和满洲南部（辽宁半岛）割让给日本，被迫支持巨额赔款。1900 年，又爆发了反西方反基督教的拳匪起义，最后，西方多国部队占领北京，强加更多耻辱的特权和另外一大笔赔款。因此，汉人组织起来推翻了异族朝廷，恢复华夏尊严。革命于 1911 年 10 月 10 日在中国西部的城市武昌爆发，士兵杀害了他们的将领，占领该城。自此，革命迅速席卷全国；4 个月后，六岁的满族皇帝溥仪退位。满族在中国的统治结束了。

间隔期：事实独立 [\[回目录\]](#)

西姆拉条约 [\[回目录\]](#)

当 1910 年中国军队占领西藏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住在印度大吉岭(Darjeeling)，长久地考虑着六年内拉萨被两次征服的境况。在此期间，他和查尔斯·贝尔爵士(Sir Charles Bell)发展出亲密的私人友谊，后者是印英政府在锡金的行政长官；达赖也学习了现代政治的大量知识，亲眼看到一个高效专业政务机构和军队是如何统治一个大国。西藏新的愿景在他心中开始形成。

十三世达赖喇嘛立即利用了清朝的覆灭带来的好运。在印度流亡中，他组织了武装部队收回他的权力，在拉萨居住的尼泊尔调停人的帮助下，很快把所有中国官员和军队赶出西藏。1913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成功地返回拉萨。继清朝之后的新民国政府临时总统袁世凯，给达赖喇嘛发去如下的“复职”电报：

目前，民国建立，五族[汉、藏、满、蒙、回]共和，达赖喇嘛自然应感到和祖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情况下，他先前的错误可以忽略；他的封号“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从此恢复，希望他支持黄教，帮助民国。^[1]

达赖喇嘛回复说，他并未向中国政府请求他以前的封号，他“要在西藏行使世俗和宗教统治。”^[2]许多人将这份回复和他回来 22 天后发布的一则公告解释为等同于独立宣示。

可是，西藏问题远未解决，因为新的民国政府的观点是：满族皇帝政府的所有非汉族领土——包括西藏——都是民国的一部分。例如，“国父”孙逸仙是个极端国家主义的人，他号召创建一个强盛的中国，把日本人赶出满洲，把俄罗斯人赶出蒙古，把英国人赶出西藏。^[3]因此，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国家主义目标，是复兴中国往日的强盛；重新赢得西藏的控制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于是，1912 年 4 月 12 日，以袁世凯为首的新民国签署法令，宣布西藏、蒙古和新疆与其他省份同为中华民国领土，是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民大会中为西藏代

表留有席位，并颁制五色国旗，其中黑色代表西藏。^[4]西藏问题在近代转世再生了。

和这种民族复兴的渴望相冲突，西藏明显需要中国方面在其政治地位上有所妥协，否则就必须准备保卫其领土和新宣布的“独立”。我们可以看出，西藏无力做到前者，也无意采取后者的相关措施。因为无可可用之军，西藏寻求和中国的新统治者达成协议，在这方面它得到了新朋友印英政府的帮助。1905-1911年期间，中国势力直接管理西藏，此时印英政府发现，中国是个坏邻居。在英国人看来，在漫长的印藏边界上的那些中国官员，利用他们的权力在印度边界部落间挑弄事端。英国力求避免中国再次直接控制西藏，希望在西藏建立一个缓冲国。1913年，以此为目标，英国向新的中国民国政府施压，参加在印度西姆拉的中英藏三方会议。西姆拉谈判 1914 年产生了一份草约，这份约定为此后 40 年的西藏问题定下了基调。

开始，西藏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宣布其独立。西藏全权大使夏扎(Shatra)在其开幕词中即表达这一点，他说：“西藏和中国过去没有相互隶属，将来也不会相互关联。西藏是个独立国家，高贵的保护公达赖喇嘛统治西藏的所有僧俗事务。”^[5]另一方面，中国在其西姆拉初始提案对此激烈反对：“西藏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或大英帝国不得谋求破坏其领土完整。中国现存的所有领土完整的所有陈述须得到西藏的尊重和大英帝国的认知。”^[6]

西藏达到其目的的唯一希望是大英帝国的支持。但是，英国的策略和拉萨的并不一致。和 1904 年一样，伦敦不想支持独立的西藏，也不想象锡金和不丹那样，把西藏变为印度的保护国。伦敦此时无意面对支持西藏独立所带来的国际评论，也害怕此举对英国在中国和香港的商业利益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英国建议西藏名义上应接受中国之下的自治政府，但是中国的影响和势力被大大限制。

由此，西姆拉条约的最后草案宣布，西藏自治，同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藏人依照其习惯和法律由自己的官员治理西藏，中国不允许在西藏派驻大批军队和官员——但是中国可以派驻一个专员在拉萨，其卫队限制在 300 人以下。这个妥协不是独立西藏所要的，但是无疑它确保西藏完全控制其事务，包括军队，货币和其他所有重要功能。它同时使西藏的国际身份合法化，不用承

担可能和中国开战带来的负担。当然，英国得其所欲——在印度北部边界建立一个无害缓冲区，达到其政治利益，发展其商业利益。

西藏和中国在西姆拉的全权大使同意这个政治妥协，但是他们发现不可能在政治西藏和中国之间划一条双方同意的边界线。其焦点在于民族西藏，即西藏东部和四川西部的半自治藏区地带。西藏坚持所有的藏区都是西藏领土，而中国认为其边界在拉萨以东 125 英里的地方。象内外蒙古一样，在英国的调停下双方对内外藏边界达成了一系列妥协；但是最终新的民国政府否决了最终边界，并拒绝承认西姆拉条约。

英国代表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于是寻求伦敦批准直接和西藏签约。但是外交部阻止这种做法，认为这无疑等同于正式承认西藏独立。不过，印英政府对其需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总得为此做点什么。最终，它想出了一个巧妙的革新来达到其目的。麦克马洪被授权和西藏签订一个双边照会，约束双方遵守未签约的西姆拉条约。尽管这不是一个真的条约，印英政府感觉到，根据未签约的西姆拉条约中“自治”规定，现在可以合法地和西藏发展关系，并在以后三十五年内如此行事。它并且从西藏得到了不丹东部的一大片领土（今日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我们认为的“坏朋友综合症”的开端——西方列强宣称对西藏的友谊，但是竟然支持中国的真实拥有权的宣称，而拒绝支持西藏政治独立的基本目标。

对西藏而言，西姆拉对解决西藏问题毫无帮助。因为中国不承认条约，西藏的法理独立仍然得不到中国的承认。如果中国要用武力执行它对西藏的主张，新的英藏照会也不保证英国会用武力来保护西姆拉条约中规定的权利。英国很愿意接受西藏不顾中国愿望，放弃阿鲁纳恰尔邦的大片领土，但是不愿意承认这种做法证明了西藏宣称的独立。^[7]

西藏现代化的尝试^[回目录]

西姆拉的失败意味着西藏不得不面对未来中国可能的敌对行动。在这种威胁下，以达赖喇嘛的亲信擦绒(Tsarong)为首的一些年轻西藏贵族官员，迫切要求西藏的现代化，特别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保卫西藏利益。十三世达赖喇嘛

同意了，他们很快征集新军，军官和军士被派到印度和西藏南部城市江孜 (Gyantse) 的英国商务办事处培训。同时，西藏考虑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在江孜开办了一所英语学校，聘请英国人为校长。西藏迈开了加入现代社会的第一步。

然而，所有这些给僧俗精英带来巨大冲击，他们拥有西藏大多数土地，这些土地还是封建庄园，由一些象农奴一样的农夫世袭种植。现代化是昂贵的，他们发现自己面对新的税收来支持军队建设。而且，宗教领袖们认为现代化对主宰西藏的佛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而他们认为这种佛教主宰是这个神权国家的独一无二的特色。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的无神论和政教分离，保守派认为这会降低佛教的权威和重要性。他们认为，西藏数世纪来和中国共存，佛教（和格鲁派）主宰西藏，并无不良后果；他们质疑，如今为什么需要如此激进地改变西藏？因此，保守派的主要官员进行活动劝说达赖喇嘛，军官们威胁到佛教和他自己的权力和威信。到二十年代中期，他们的努力成功了，作为现代西藏历史的关键政治决定，十三世达赖喇嘛直击改革进程的核心，将要求现代化的军官们全部降职，关闭了英语学校。一夜之间，西藏失去了创建现代政体的最佳机会，而现代化本可以为其实地地位赢得国际支持，保卫其疆界。^[8]

西藏并未为此立即付出代价，因为此时中国完全陷入其内部事务和冲突，太虚弱而无能力挑战达赖喇嘛。于是，从 1913 年最后一个清朝官员和军队离开西藏到 1933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中国官员或军队不允许在西藏驻扎，西藏政府也没受到北京的干涉。十三世达赖喇嘛死后，中国在西藏的利益稍微有些改善，西藏允许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派出的“致丧团”访问拉萨，并同意开设一个办公室来处理解决西藏问题的相关谈判。这些谈判一无所获，但是西藏允许办公室继续存在。

1937 年，日本入侵中国；西藏不用抵抗中国，保卫自己的事实独立，西藏政府继续在没有蒋介石政府介入的情形下运作。然而，中国也没有放弃其对西藏的主张。相反，它在全世界（和中国本土）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积极造成西藏事实上是中国一部分的印象，有力地加强其地位。西藏事实上没有官员理解西方政治，也不会说英语，无忧无虑地忽略了这个不祥的发展，和先前一样，闭上眼睛不理睬现实，原封不动的退回英国政府的来信。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毛时代 [\[回目录\]](#)

二战胜利后，中国未能立即处理西藏问题；蒋介石政府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爆发了全面内战。四年后，中国共产党获胜；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开国大典。

此时，西藏问题的解决也不比清朝覆灭时更容易。1947年，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摄政政府和色拉寺之间爆发了一场痛苦的战争，西藏军事上衰弱，内部分裂，但是从任何角度，西藏象个事实独立的政体运作。但西藏也未能获得国际社会对其独立声明的支持。英国和印度（以及后来的美国）直接和西藏交往，如同它是个独立国家，但是继续承认法理上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很多对西藏当时政治状态的疑惑，就来自这种西方的双重标准。

例如，1943年，美国政府想派两名战略服务处(OSS, CIA的前身)官员到西藏，从陆路到中国，评估修建公路和机场的可能。美国请求其盟友蒋介石安排此事，但是因为中国并未实际控制西藏，西藏政府拒绝其要求。美国不得不请求英国（在拉萨设有办事处）直接从拉萨获得许可。当西藏政府确信，这是个真实、可能带来好处的美国政府代表团，西藏外事局给两名战略服务处官员签发了邀请。他们取道印度进入西藏，带来了礼物和一封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给年轻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信，请他提供便利。日期为1942年7月3日，信中写到：

至尊陛下：

我的两个同胞伊利亚·托尔斯泰(Ilyia Tolstoy)和布鲁克·多兰(Brooke Dolan)想要拜访您本人及历史名城拉萨。在美国有许多人，包括我，对您的土地和人民向往已久并怀有极大兴趣。我们非常珍视这个机会。

如您所知，美国人民正联合其他27个国家一道进行一场由侵略成性的国家强加于世界的战争，他们意欲摧毁整个世界的思想、宗教和行动的自由。盟国正在为保卫自由而战，并且相信我们会胜利，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力量是充足的，我们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我请伊利亚·托尔斯泰和布鲁克·多兰带一点礼物给您以表达我的友好情谊。

诚挚的问候

富兰克林D. 罗斯福^[1]

对于拉萨官员，这封信看起来象政府对政府公文，但是华盛顿却不是这么想的。尽管美国有威尔逊政府的对民族自决的强力承诺^[2]，尽管 1941 年在大西洋宪章中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行使之权力，”^[3]，美国拒绝支持西藏独立或其自决权。在此情况下，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告知罗斯福总统此信是写给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而不是西藏的长期政治领袖，这样我们不会冒犯中国政府，其主张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4]这种政策有其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在二战中是美国的重要盟国。但是西藏政府或者达赖喇嘛都未被告知其中的微妙之处。因此，西藏没有任何理由假定信不是送给作为西藏领导人的达赖喇嘛，或者此信并不表示美国默认西藏独立。

另一桩更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在 1948 年，西藏政府用自己的护照派一个商贸代表团到美国和英国。香港的英国官员签发了 3 个月有效的入境签证。当西藏人在美国时，英国签证过期了；当西藏人例行公事般申请新签证时，他们的请求被拒绝了。过渡期中的中国政府对英国政府提出抗议，根据英国官方观点，英国不接受西藏独立，但是接受西藏护照却隐含此意。英国外交部于是纠正此错误，向中国人保证犯了个错，承诺以后不会在西藏护照上签发签证。他们向西藏人建议，在另外一张写有“身份宣誓”的纸上签发签证。代表团感到既震惊又愤慨，他们拒绝这种做法，说如果这样，他们宁可不访问英国。他们的举动令在英国的西藏的朋友们惊慌失措，于是伦敦想出了一个机灵的解决方案，真实地表现出此时盛行的双重标准。他们小心地在过期签证章上划掉了“三个月”几个字，用笔在上面清楚地写上“九个月”。这种做法，使得他们信守了对中国政府的承诺，没有在西藏护照上签发新签证因为这还是老签证。同时他们也欢迎西藏代表团使用西藏政府签发的护照访问英国。

如果把西藏的经历和蒙古相比，则更具教育意义。清朝灭亡时，蒙古和西藏的政治状态类似，和西藏一样，蒙古也寻求独立。蒙古经历了共产党革命，成为苏维埃集团的一员。它和苏联维持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数千俄国人在蒙古工作，大量蒙古人在苏联学习。在关键的 1939 年诺门罕(Nomonkhan)战役中，蒙

古军队和其苏联盟友并肩战斗，打败了日本军队，中止了其北进计划。^[5]和西藏一样，蒙古的独立是事实独立而非法理独立，蒋介石政府继续主张其为中国的一部分。

俄国人在二战中的胜利迅速改变了这一切。和西方民主国家不同，二战后，苏联支持蒙古的独立主张。斯大林认识到一个友好的缓冲国的重要性，在雅尔塔劝说罗斯福总统同意在蒙古就是否独立进行公民投票。投票结果全体一致支持独立，苏联和美国劝说蒋介石接受投票结果。结果，今天蒙古是一个独立国家和联合国成员。

与之对比，二十实际前半叶，特别是二战中和二战后的关键时期，西方一再确认西藏在政治上从属于中国。尽管有着关于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崇高理论，西方民主国家维持着一致的政策，向中国的敏感性让步，接受中国的官方观点，即西藏是华夏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

十七条协定^[回目录]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引起了一些变化，两年后，西藏问题的死结被打破。

在其形成年代，中国共产党接受苏联领导，接受其民族政策：中国各民族区域应成为自治共和国，有权脱离。但是二战后，这种政策转变为中央集权制；新的共产党政府伊始，其民族政策是：共产党中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多民族国家，各自治民族区域（而不是共和国）无权脱离。西藏被认为是这些民族区域之一；1949年后期，新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宣布，解放西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PLA）的一个主要目标之一。^[6]

西藏政府发现自己处境维艰。清朝覆灭之后，一系列幸运的事件阻止中国积极解决西藏问题；但是此时这些因素都不再存在。西藏现代化派曾害怕，有一天西藏不得不用武力保卫自己的独立地位，如今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毫不奇怪，西藏装备不足，领导乏力；其军队只有一个业余的计划来对付入侵。此外，自1913年，西藏在国际上比以往更加孤立，因为英国不再有国家利益来维护西藏

的“自治”状态。1947年，印度独立，伦敦的角色定位在支持印度的外交政策；而后者此时的外交中心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西藏。

尽管如此，西藏政府也未坐以待毙。它对共产党在中国内战胜利的反应是：面临对其独立的共产党威胁，呼吁美国和大英帝国给予民事和军事援助。送往英国的信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军队已入侵中国兰州(Lanchow)、青海(Chinghai)和新疆(Sinkiang)各省；由于这些省份地处西藏边界，我们已递送官方文书给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Mr. Mautsetung)，要求他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

我们将我们政府送往中国共产党政府领袖的信件复件附在此信之后，希望他能适时考虑此事。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领袖对我们的信件置之不理，采取侵略性措施，向西藏派遣军队，西藏政府将被迫用可能的一切手段保卫自己的国家。所以，西藏政府热切希望从贵政府得到一切可能的帮助。

敬请考虑给我们民事和军事上大量帮助，我们不胜感激，将尽快给你们答复。

西藏外交局

拉萨[1949年11月4日]^[7]

西藏政府也给美国人送去了一封类似的呼吁信。然而，英国和美国都无意鼓励西藏人。美国告诉英国“他们将回复，劝阻藏人不要期待获得援助。”^[8]来自共产主义的敌人——西方民主国家的这种不承担义务的回复令人极其失望。但是因为选择有限，西藏政府决心派遣代表团去美国和英国（以及中国和尼泊尔），希望面对面的接触能得到一些支持。1949年12月22日，西藏外交局把以下信件送给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迪恩·艾奇逊：

西藏在过去三十年间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然而最近中国共产党领袖在广播上宣布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许多其他有关西藏的言论也完全是胡说八道。此外，中国共产党已经占领的新疆、西宁（青海省府）和西康等边界省份。^[9]

在如此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对此漠不关心。我们很快将派喇恰(Lachag)堪穷土登桑杰(Khen Thupten Sanghe)和四品官(Rimshi)登恰(Dingja)率领一个特别使团出访贵国，希望得到贵国政府的援助。

因此，如果我们的使团抵达华盛顿，希望您能够从各方面给予可能的帮助，我们致以最衷心的感谢。^[10]

得悉此计划后，新的共产党政府严正抗议；但是其担心是不必要的，西方民主国家无意鼓励西藏，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这会激起中国对西藏的入侵。美国政府害怕，即使书面回复都可能“被藏人认为是承认他们的独立状态”；于是，通过新德里的美国大使馆，美国口头劝阻藏人不要派出这一使团。^[11]英国人做出了类似的反应。

与此同时，在中国，政府宣布 1950 年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放西藏，这可不是空谈——毛泽东已开始计划“解放”西藏的策略。毛的历史感极佳，他清楚地理解西藏的国际状态使其和中国其他的民族截然不同。在一个场合，毛告诫他的将军们，他们要耐心，西藏要慢慢来：“西藏和新疆不一样，”他说，“旧社会新疆有 20 万到 30 万汉人，但是在西藏一个也没有。我们的军队必须在一个过去没有汉人的地方作战。”^[12]不仅仅没有汉人住在哪儿，正如我们所知，西藏直接处理外国事务，签署各种国际条约，管理出入境。尽管毛手握数百万大军，一支意志坚决、装备精良的游击队能在寒冷的青藏高原给人民解放军带来军事难题。武力解放西藏会带来严重的国际分歧，甚至可能引来共产党中国的敌人如美国。因此，毛泽东相信中国最好的策略是和平“解放”西藏；即，和西藏政府达成协议。这样会消除西藏山脉中长期的游击战，也会减少潜在的国际干涉。

此策略的问题在于，西藏政府不愿自愿放弃事实独立，成为毛的共产党国家的一部分。毛因而相信需要采取军事行动，强迫西藏到谈判桌前（就象 1903-1904 年英国人那样），但是他很清楚目标是通过协议和平解放西藏。因此，1949 年毛下令准备进攻政治西藏东部地区（以昌都为中心）。1950 年初，重庆的西南局^[13]受命发起进攻。如果西藏政府不能很快同意和平解放，毛希望进攻尽快于 1950 年夏季发起，他担心延迟只会给藏人更多时间来争取国际支持。

中国共产党请藏区（中国控制的青海、四川/西康省）的著名宗教领袖做出宗教自由等保证，劝说西藏政府开始“和平解放”的谈判。西藏政府犹豫不决，错过了中国提出的派遣谈判代表道北京的最后期限，毛下令解放军第 18 军进攻昌都。1950 年 10 月 7 日，解放军跨过金沙江前线，进攻保卫边界的藏军。其军事目标不是推进到拉萨，而是羁縻并切断昌都的一万藏军退路，使其不能向西撤退建立新的防线。

西藏军队领导组织无力。藏军的将领由政府官员轮流担任，而没有经过特殊的军事训练；很多士兵作为乌拉役被征，往往将全家带到前线。藏军的防守策略有漏洞，英国人十三年前就已经告诉他们这是无用的。当解放军进攻时，防守的藏军分散成小部队沿金沙江分布。解放军小队迅速突破设置的防线，从后翼和侧翼保卫藏军；两周内，解放军俘获了包括政府总司令在内的藏军。通往首都的道路打开了，因为昌都和拉萨之间实际上没有后备军。但是，根据毛泽东的西藏策略，解放军停止前进，再次呼吁拉萨开始谈判。毛并不想简单地征服西藏，尽管这样做很简单。他想和西藏领袖达赖喇嘛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他希望达赖喇嘛接受中国统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工作，逐渐改革西藏的封建经济，这样中国队西藏的主权声明能够合法化。

西藏政府最害怕的事情如今变成了现实——西藏面临军事进攻，却没有明显的手段来对付。藏军甚至没有一个计划将军队转入游击战来骚扰人民解放军。西藏再次转向国际社会寻求支持，向联合国、美国、印度和英国送去了呼吁信。西藏给联合国的呼吁信使得人们重新检视西藏问题，特别是，西藏并非联合国成员，它是否有资格将其问题提交联合国。联合国宪章第 35 条第 2 款说，“非联合国会员国之国家如为任何争端之当事国时，经预先声明就该争端而言接受本宪章所规定和平解决之义务后，得将该项争端，提请大会或安全理事会主义。”^[14]但西藏是一个“国家”吗？英国外交官检视了这个问题，得出结论西藏有资格作为一个国家，^[15]可将此问题提交联合国，但是同上面指出的一样，英国外交官也感到处理西藏问题是印度的首要责任，英国则唯印度马首是瞻。伦敦同时认为，联合国不可能下令中国从印度撤回其军队，这种失败只会削弱联合国的影响。印度在此事中扮演关键角色，但是对西藏而言，不幸的是，印度决定不让西藏妨碍它与中国发展密切友好的关系，因而反对联合国讨论此议题。^[16]当萨尔瓦多在联合国提出此问题时，英国和印度代表首先发言，建议不考虑西藏问题。于是，提议被中止。

西藏政府对此感到孤立无援，沮丧不堪，觉得没有选择，只能派谈判团去北京，并于 1951 年春天派出代表团。就像 1904 年英国入侵拉萨后他们被迫做的一样，代表团于 1951 年 3 月 23 日勉强地在协议上签字。此协议被称为“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17]

十七条协议正式结束西藏问题的争端，为中藏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第一条明确写道：“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18]西藏，在其 1300 年的有记录历史中，第一次在正式文本协定中承认中国的主权。与此让步交换，中国在第 3、4、7 和 11 条中，承认维持达赖喇嘛和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变，直到西藏人民希望改革。

第 3 条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第 4 条	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第 7 条	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第 11 条	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19]

毛感到，十七条协议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解决方案，此方案清楚地将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合法化。但是，此合法化同时允许，最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西藏保留其封建神权政府和经济。此一妥协清晰地将西藏和其他民族区域区别开来，因为只有西藏和北京达成此书面协议，允许传统政府继续统治。

达赖喇嘛首次得知协议签订时住在亚东，他和他的高官 1950 年末即搬到这个接近印度/锡金边界的小城，准备在中国入侵拉萨时能迅速逃到印度。协议签订的消息令他们吃惊，因为签订之前具体条款还不清楚。西藏谈判代表团认为，如果将每一条款送到亚东讨论会引起无穷无尽的讨论，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他们感觉，这样会导致中国大举入侵西藏，西藏不可避免将被打败，生命财产损失，西藏的佛教机构被毁。因此，他们同意努力争取最好条件，并为之负责；因为他们认为达赖喇嘛总是可以拒绝接受协议。^[20]

如何回应该协议？亚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否认该协议，逃离西藏；另一部分人认为达赖喇嘛应该返回拉萨，遵守协议条款。支持返回的

一派看重协议的某些部分，例如前面提到的第四条。而以俗官噶伦索康 (Surkhang) 为首的反对派认为，中国人不可信，一旦他们控制了西藏，他们不会遵守协议。他们忧虑那些含糊不清的条款：第 11 条说，如果西藏人民需要，将进行改革；而第 15 条说，中央政府会在西藏建立军事指挥部和军政委员会，以保证协议的实施。他们也不喜欢协议给予中国在西藏驻军权，并处理西藏的防务和外交事务。最后，他们害怕如果承认中国的主权，将来时势变化时将无法宣布独立。

到此时为止，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在中藏冲突中扮演了相对次要的角色，但是当时是冷战的全盛时期，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是尽可能骚扰和阻碍新的共产党政权。中国在西藏的扩张为此提供了新的机会，华盛顿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当然，从美国的角度看，如果达赖喇嘛批准协议返回拉萨，控诉中国共产党的扩张则属无的放矢；因此美国的主要努力，是劝说达赖喇嘛否认协议，选择逃离。

藏人和美国官员在印度匆忙进行秘密接触，也同在亚东的达赖喇嘛协商。美国提出，包括其他一些建议，如果达赖喇嘛公开否认协议，离开西藏，允许他和数百名高官到美国避难。^[21]然而，即使对于不谙现代外交事务的藏人来说，美国的支持声明听起来也太空洞。尽管高唱自由和民族自决的高调，华盛顿却不愿支持西藏为一个独立于中国的国家，也不愿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支持，使得藏人能够有效地在西藏开展对中国人的游击战。美国仅支持西藏自治，“通过印度提供轻武器。”^[22]在此情况下，达赖喇嘛最终没有选择否认协议，逃往印度。

西方人很难理解达赖喇嘛如何能够选择返回毛统治下的西藏，因此印度的一些西方“专家”猜测，在亚东达赖喇嘛的官员阻止其逃亡。美国拟定了一个奇怪的计划来“解放”他，（于 1951 年 7 月 17 日）发给达赖喇嘛一封信，列出逃离的三个选项：

- a. 选择一小部分忠诚的随从，和他们一起悄悄离开 (亚东)。最好在夜间启程，以避免从各大寺院及拉萨的政府机构中派往亚东的代表劝说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 b. 命令 (原文删去了名字) 秘密将他护送到印度。(删去了一部分)
- c. 假如上述两种方案都行不通，达赖喇嘛可致函 (原文删去了名字) 请求 (原文删去了名字) 秘密转交给哈里尔 (Heinrich Harrer, 一名奥地利登山爱好者, 过去七年间居住

在拉萨)和帕特逊 (George Patterson, 一个英国传教士, 共产党接管西藏前居住在西藏东部), 并按照原定计划化装在亚东附近迎接达赖喇嘛, 然后把他送往印度。同时还由(原文删去了名字)转达采取这一行动的详细计划, 而且他还应向达赖喇嘛表明, 这只能作为最后手段来采纳。^[23]

但是此行动的前提很荒唐。达赖喇嘛并非“被监禁”在亚东, 而是因为他和大部分官员发现缺乏美国提供的支持。他们看来, 美国不愿意全力支持他们的目标——提供积极的外交和军事援助, 确定西藏成为联合国承认的独立国家。美国愿意派遣军队去朝鲜, 竟然不愿意承认西藏为一个独立国家, 更不用说提供武器和训练, 在西藏发起游击战。相反, 如果达赖喇嘛接受协议返回拉萨, 旧的政治系统维持不变, 达赖喇嘛仍然是其领袖。他们希望达赖喇嘛能够逐渐劝说中国人允许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核心价值得以延续。

讽刺的是, 年轻的达赖喇嘛并不反对社会改革的主意, 他也不坚持在西藏维持传统的剥削封建制度。在 1994 的采访中他回忆道:

我自己从小就喜欢机械学校。当我小的时候, 我就想我们应该有学校和机器。

从帕里(Phari)到拉萨的路自英国时期就有了, 但是那条路不能走小汽车, 我想将来我们可以容易将其变成小型车公路……我强烈地感觉到最好有一条大型车公路。

当我们到达江孜(城), 我听说帕拉(Phala)家族在那有个小学校, 我强烈感到我们应该在农村多建学校; 我们谈到我认为象乌拉差役这样的税种很坏, 我也不喜欢(给人们重负的)租税和(父子相传的)老债。我还小的时候, (布达拉宫的)清扫工告诉我这些事情。^[24]

因此, 似乎达赖喇嘛和中国有望在变革和现代化方面达成妥协, 达赖喇嘛接受了大部分僧俗官员的观点, 1951 年 8 月返回拉萨。1951 年秋, 中国军队和平进入拉萨。

十七条协议为中藏相互关系建立了书面的双方同意的共同基础, 承诺西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同时不失其生活方式的独特性。这远少于西姆拉讨论的自治, 但却是能被中国官方接受的方案。1951 年 10 月末, 达赖喇嘛发电报给毛泽东, 正式接受协议。但是, 双方很快发现, 执行十七条协议的条款既不直接也不容易。

依据十七条协议共存 [\[回目录\]](#)

签订十七条协议之后，毛泽东在西藏执行了一种缓和政策，这一点和西方普遍认识不同。尽管他的最终目标显然是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目标改革西藏，但是他的西藏政策寻求创建和谐的汉藏关系；缓和西藏的忧虑，让藏族精英随着时间逐渐接受重新和中国“统一”，同意社会变革。自称“新中国人”，在西藏的解放军官兵强调他们是来帮助西藏，而不是来剥削或者欺凌西藏，他们小心谨慎的展示他们尊敬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例如，他们向拉萨地区的所有两万名僧尼布施。根据该原则，他们制定了严格的行为准则，禁止解放军违背人民的意愿行事，要求他们用旧中国的银元支持物品或服务（而不是纸币）。这种政策也允许旧的封建宗教制度保持不变。1951年至1959年间，没有贵族或寺庙财产被充公，而且封建地主被允许继续对其世袭农夫行使司法裁判。此一政策的中心是达赖喇嘛。毛将达赖喇嘛作为一种特别角色，通过他，西藏的封建和宗教精英（及其大众）将逐渐接受他们在中国新的多民族共产党国家的地位。可见，毛在此期的西藏政策是一种渐进主义。不妨发展军事和管理机构，但是西藏的中国官员不得过早地试图强迫其改变。^[25]

但是，毛的政策碰到了很多问题。在共产党内，范明(Fan Ming)领导的一派认为，党应该支持西藏的第二大活佛系统——班禅喇嘛，因为他政治上“进步”。尽管毛认为需要渐进主义政策，许多西藏的解放军战地指挥官发现这很困难：他们很难向封建精英表示尊敬，而对旧制度视而不见。西藏的中国官员实际上制定了计划准备于1956年开始政治经济革命，但是由于毛泽东的阻挠该计划没有实施。

但是，民族藏区的情况则非常不同，那儿的藏人不属于政治西藏的一部分（也不受十七条协议约束）。四川省1955至1956年期间跟上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运动，也波及藏区。1955年末，四川省党委书记李井泉在全省发动民主改造，包括少数民族地区。这很快导致藏区的血腥叛乱，难民进入政治西藏区域，来自民族藏区的叛乱者逃到安全的拉萨及其郊外。他们成为拉萨1959年起义形势急剧恶化的一个主要因素。

在政治西藏的藏人中间，毛的政策也碰到了严重的问题。西藏政府中，以噶伦阿沛(Ngabö)为首的一些政府官员倡议西藏应迅速改革其封建制度，但这一倡议未得到广大的支持。阿沛比喻道，自己做的帽子总比别人做的合适得多；此论调无人响应。尽管达赖喇嘛尊敬阿沛，希望试图同中国（以及西藏的现代化改革者）达成操作上的妥协，^[26]他无力（或不愿）控制其政府内的反对中国的活动分子。于是，从一开始，极端民族主义的强硬派就制造了一种对抗气氛。和20年代一样，西藏保守派只是不想要任何改变。他们觉得西藏独一无二，完美无缺。而且，他们感觉西藏是在昌都入侵后被迫和中国签订城下之盟，因此他们可以不必被协议条款约束。由此，他们不试图和中国人达成某种妥协，而是在拉萨制造种种不愉快的条件，特别是食品短缺，以此劝说中国人撤出一部分官兵。此一基本策略，和西藏官员18世纪对待清朝驻军的策略相同。

50年代中期，西藏内部局势开始恶化。中国强硬派努力争取在西藏开始“社会主义转化”改革；西藏强硬派与民族藏区起义失败的逃亡人员结盟，组织武装叛乱。此外，美国鼓励反中国派，1957年开始训练和武装西藏游击队。1957年，为挽救其渐进策略，毛做了最后的努力：他减少了西藏的汉族干部和军队人数，书面承诺达赖喇嘛，中国在未来六年内不会在政治西藏进行社会主义土地革命。毛进一步说，六年过后，如果条件仍不成熟，他将继续延迟改革。^[27]但是，达赖喇嘛无法稳定西藏局势；1959年3月，拉萨爆发了起义，达赖喇嘛逃到印度。随后达赖喇嘛宣布否认十七条协议，寻求西藏独立和民族自决。西藏问题再度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毛的“渐进主义”策略失败了。

藏人的叛乱同样以失败收场。中央情报局对游击队的支持来得太晚，也太少；西藏游击队无法完成他们的最初设想，在西藏内部建立据点做为“自由西藏”的基地。中情局随后帮助游击队在尼泊尔北部建立了避难基地，但是从尼泊尔发起的对西藏的袭击对西藏的政治局势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同时，西藏的中国政府宣布中止十七条协议，废除传统政府。政府没收了僧俗精英阶层的财产，西藏数千庙宇中绝大多数被关闭，同时建立了新的共产党政府机构。^[28]一度在中国共产党国家之内存在的特殊的西藏神权政体走到了尽头。

对于西藏和中国而言，1951—1959年的过渡期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西藏的权力精英无法发展并实施一个现实策略：以此策略，或者诱使中国人离开，或者在中国内部制造一种环境实行长期自治。西藏精英中的不同派别采取的政策自相矛盾，军事对抗既不成熟也没有效果：最终，老的社会，连同他们想保存的佛教制度等等都被毁灭。在中国一边，意识形态狂热过早地激发了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阻碍了赢得藏人真正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一部分的任何机会。

但是，中国的一部分人认为，毛的有缺陷的缓和政策才是这一失败的原因。整个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党内关于这一政策抱怨不断，尤其是部分人认为毛对达赖喇嘛的看法有误；他们觉得达赖喇嘛表里不一，表面上拥护革命，实际上寻求“分离主义”政策——即试图把西藏分离出去，摆脱中国控制。这一派平静地将1959年叛乱和西藏问题的重新国际化归因于此一政策，至今，中国仍有部分人认为这是党（和毛泽东）的最大失败之一。^[29]

1959年以后，流亡藏人和中国争相将自己对西藏历史和当代世界的诠释合法化。中国人谈论西藏旧封建农奴制度的极端残酷和弊端，流亡藏人则讨论许多中国人的文化和人权侵害行为，包括种族清洗。这一“诠释”之战一直持续到现在。

开始，流亡藏人在此诠释战中占了上风。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中情局实际上资助流亡藏人的法律事务所——西藏问题被提交到联合国。联合国西藏问题的决议（1961年和1965年通过）使用的语言支持西藏自决的主张：

[联大]严重关怀西藏事态之后续，包括西藏人民基本人权之遭破坏及其传统享有之独特文化与宗教生活之遭受压迫，

查悉有大批西藏难民出逃邻邦，足见此等事态已使西藏人民感受极大痛苦，深感焦虑，

鉴于此等事态破坏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规定之基本人权及自由，包括民族自决原则，且有增加国际紧张局面与加深民族仇恨之不良影响，

重申信念认为对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原则之尊重乃发展以法旨为基础之和平世界秩序之所必须；

再度郑重呼吁停止剥夺西藏人民之基本人权与自由及其自决权利之行为；

希望各会员国以一切适当之努力实现本决议案之目的。^[30]

1959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发表报告，称西藏“从各种意义上来讲都是一个独立国家，享有极大程度上的主权。”^[31]

美国先前的立场是承认西藏是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国家，此时更进一步，提到西藏的民族自决权。1960年，国务卿克里斯蒂安·E·赫脱(Christian E. Herter)在一封信给达赖喇嘛的回信中，采用了新的说法：“如您所知，美国一向认为西藏是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国家**，传统上，美国人民同样支持民族自决原则。美国政府相信，此一原则适用与西藏人民，西藏人民应**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原文着重号）。^[32]

然而，达赖喇嘛及其代表寻求联合国和美国支持西藏独立，对此美国无意支持。美国在以下档案（日期为1959年10月14日）中的言论显示，尽管此时美国深深地卷入训练和资助大量的西藏游击队行动，美国继续拒绝承认西藏独立：

关于美国是否承认西藏独立的问题，远东事务局[FE, Far Eastern Affairs]仔细研究了此举的得失。考虑所有因素，我们的结论是，反对承认西藏独立的举张占了上风。从美国国家利益和藏人的立场考虑，我认为这一结论是正确的。我们和藏人有相同的目标：让世界持续关注藏人的事业，保持达赖喇嘛为西藏人民的有效发言人的角色。我相信美国承认达赖喇嘛政府为独立国家对这两个目标没有好处。预期几乎没有国家会跟随，我们的承认只能让达赖喇嘛做为流亡政府的领导人明显地依赖于美国获取政治支持。这显然会损伤他目前作为亚洲一个令人尊敬的领导人的声望和影响，也会妨碍他代表西藏人民的行动。

但是，美国仍然需要看起来对达赖喇嘛的请求做出响应，保持我们的一贯立场，支持民族自决原则。^[33]

因此，对于流亡藏人而言，^[34]指望美国全力赢得世界支持西藏独立，从一开始就成问题；到六十年代后期，当总统尼克松(Nixon)和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Kissinger)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美国对西藏的支持中止。此时，美国撤回对以尼泊尔为基地的西藏游击队的支持，几年内军事行动失败了。此外，从1966年开始，美国的官方立场不再谈到西藏的“民族自决”，甚至也不提赫脱在1960年提到的自治国家。

随着美国政治焦点转向和中国搞好关系，西藏变得令美国政府困窘。西藏问题不再和美国国家利益相关——实际上，还对此有害。到七十年代，世界局势的变化使得流亡藏人的形势更加恶化了。如此，流亡藏人 1959 年之后的努力对西藏局势没有影响，也无法创造国际舆论同意其自决或者独立。中国共产党重建了西藏，将农区和牧区变为人民公社；在文化革命和“破四旧”运动的旗帜之下，对传统的西藏文化和宗教带来严重的冲击。在叛乱、食品短缺和斗争“阶级敌人”之时，西藏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在此期间的具体死亡人数还不得而知，但是西藏的文化受到了实质性的伤害。

一个留学美国大学的藏人 1964 年回到中国，在其自传中生动地回忆起 1966 年和红卫兵一起返回拉萨时的印象：

我们在拉萨呆了四五个月……我离开拉萨到印度已经十年了，变化很大。我第一次往四面看，我被很多新房子、建筑和道路惊呆了……高速路边的行道树给我特别的印象……然而，我很快发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变化……

这个城市最大的变化之一是缺少一个营业的中心市场。街道上不再有什么叫卖。那些狭窄却充满货品的售货棚不见了，市场上买卖双方的笑声和讨价声不见了，我以前常去的茶馆和啤酒店也不见了。路两边只矗立着一些缺货的国营商店。

很快我发现人们也没法吃饱。食品都是供给的，几乎没有肉、酥油或者土豆。我在旧拉萨居住了很多年，从没想到过这样的食品短缺。那时，食品很丰富，如果有钱，你会有很多自由和选择。现在食品供给处在很低的层次上……

可能我看到最大的不同是，人们总体看起来垂头丧气，阴郁不乐。他们看起来很可怜，就象他们刚刚失去亲朋好友。^[35]

另外一篇回忆描述宗教被迫害的程度：

我还碰到一位女士……后来成为我的妻子……从任何意义上来说，桑耶拉(Sangyela)都没有被批斗的危险，因为她绝对来自无产阶级。但是她十分虔诚，憎恨政府，因为政府关闭寺庙，禁止任何宗教活动，连自己家里都不行。因为文化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根除所有残余的旧价值观，旧习惯和旧信仰；如果邻居或者当官的发现你信教，密告了你，你就会被在大会上被批斗。但是我们藏人是很顽固的，来自各阶层和背景的藏人冒着被惩罚被批斗的危险，秘密在家里念经，或者转寺庙，就象在闲逛，默默地念经。桑耶拉是其中的一个。桑耶拉还继续点酥油灯，供奉菩萨。她从每月微薄的供给中挤出一点来，点燃一个小的酥油灯；她把灯放在门后面以前的祭坛的柜子里面，而

不是象通常放在祭坛顶上。当她告诉我的时候，我想，将点燃的灯放在老的木柜子里面，可能会让整个房子着火。^[36]

简而言之，1959年叛乱之后，佛教被毁，藏人被迫放弃他们深深拥有的价值观和习俗，而这些构成他们文化身份的核心。阶级斗争和持续不断的运动宣传与他们过去理解和感觉的一切相抵触，毁灭了传统藏族生活中的社会文化机构。对于西藏的藏人而言，那是一段痛苦的时光。^[37]

后毛时代 [\[回目录\]](#)

毛泽东 1976 年逝世，随后“四人帮”垮台，邓小平执掌权力。这些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新的文化和经济意识形态，和美国的关系正常化；并给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大业中的两大问题——台湾和西藏问题——带来了新的契机。

1978 年，中国在西藏做出了一些单方面的姿态，例如释放一些犯人，宣布藏人可以探望国外的亲属，给一些流亡藏人签发探望西藏的签证。这些行动很快发展成为一种“对外”策略：试图劝说达赖喇嘛及其跟随者返回中国，解决西藏问题。1978 年，中国政府的代表和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 定居香港，能说流利中文)在香港进行了非正式谈判；双方都表达了在西藏问题上和解的兴趣。随后，1979 年邓小平邀请嘉乐顿珠访问北京，告诉他，除了完全独立，其他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所有的问题都可能得到解决。他还说，达赖喇嘛可以派遣参观团于 1979—1980 年访问西藏，实地考察当地情况。^[1]显然北京相信代表团会被西藏自 1959 年之后的进步，以及西藏人民和国家的团结所折服。中国同时觉得，经过了 20 年的流亡生涯，达赖喇嘛会更迫切地安于在中国做一个新的、更“自由”的领导。达赖喇嘛于是派遣了三个参观团访问中国，其中包括他的家人。

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汉人任荣，向北京报告说，西藏的政治局势很好，藏人团结在党和祖国周围。但是，一个参观团，包括达赖喇嘛的另一个哥哥，访问青海省的藏区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种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令北京感到局促不安，北京于是和拉萨的任荣联系，问他如果参观团按计划访问拉萨会发生什么事情。据说任回答说，比起安多的农牧民，拉萨人民在意识形态上更成熟，他们强烈支持共产党；拉萨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西藏当地官员对此深信不疑，西藏自治区(TAR)的政府甚至在参观团抵达前召集居委会，告诫当地的西藏“群众”不要因为对旧社会的痛恨，而对达赖喇嘛的参观团扔石头或吐唾沫，因为代表团是中国政府的客人。拉萨群众什么也没说，但是给参观团比青

海更盛大的欢迎。成千上万的拉萨人包围了参观团：很多人哭着喊着，其他人献上哈达，争相去触摸达赖喇嘛的哥哥，少数人喊出了西藏民族主义口号，例如，“西藏独立”和“汉人，滚回去”。因为北京的官员也陪同着藏人难民的参观团，任荣，以其对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改革无情而著名，无法掩盖这次惨败，以及他对藏民群众情绪的一无所知。此外，与中国人期待的相反，这些访问向流亡藏人展示了中国所宣传的西藏的社会主义进步是虚假的。藏人的生活水平很低，经济发展差，宗教和经院制度几乎被全毁了。流亡藏人还发现，尽管藏人群众经历了二十年的共产党宣传，他们仍然虔诚地信奉达赖喇嘛，认为他是藏人的领袖。这让流亡藏人们觉得，西藏应该按照藏族的价值标准，由藏人统治。如果“解放”和将西藏纳入中国领土的目标是要赢得普通群众的心，1959年到1980年间中国的政策和措施显然是失败的。参观团的总的影响和北京期望的正好相反：在流亡藏人的历史低潮期，增强了他们的信心。^[12]

北京的对外政策伴随着新的对内政策，北京试图通过改善西藏的经济状况，满足藏人的民族感情来解决西藏问题。经过大量的初步调查，1980年初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一次西藏工作会议。会议上的下面一些说法反映了新的动向：“我们解放[西藏]三十年了。现在国际形势非常复杂。如果我们不抓住机会改善[藏汉]民族关系，我们就会犯下大错。所有共产党员必须统一认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3]不久以后，1980年5月，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和副总理万里前所未有的亲自来到西藏进行调查，以此决定西藏工作会议的方针是否需要修改。他们的所见所闻显然令人失望，发现事实比他们预期的还要差。胡公开宣布在西藏进行宽松的六条改革，其中一些观点非常突出：

(1)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力……

在统一领导下的自主权不能被废除。有必要充分地、独立地行使这一权力。那些不符合西藏情况，以及不利国家团结、发展生产的東西要摒弃或修改。自治区应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自主权，可以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放弃某些法律法规，保护民族自治和其特殊的民族利益。^[14]

(2)……和全国其他省自治区相比，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较低。这一情况显示，西藏人民的负担必须大幅减轻。接下来几年内，对西藏人民实行免税、免征购……取消各种捐税。不得征用群众做无偿劳动。农牧民的产出必须以协商价格购买或进行物物交换，满足双方需要；取消他们的征购配额……

(3)在所有经济问题上，西藏采取特殊的、适合西藏情况的灵活政策，包括农业、畜牧业、金融业、商业、手工业和通讯业，以期加快西藏经济发展速度……

(5)在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的前提下，要大力地、充分地发展和复兴藏族的科教文化事业。藏族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绚丽的文化。藏族文化举世闻名，包括佛教，音乐、舞蹈，以及医药和戏剧；我们要认真地研究和发扬藏族文化。所有忽视或弱化藏族文化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继承和发扬藏族文化方面做出成绩。

西藏的教育事业进步不够。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我们要努力在西藏设立大学，中学和小学。部分文化失传，寺庙中的佛教经典被毁，我们要尽力保护、整理和研究它们。在藏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应学会说、写藏语。这是必须的，否则他们就会脱离群众。爱护少数民族群众决不是空谈。我们要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

(6)要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要极大地加强藏汉族干部的亲密团结。……未来两到三年内，西藏自治区政府职能部门中的全职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原文着重号]^[5]

这样的公开言论令人瞩目，据说比起秘密报告和胡耀邦对党内干部的讲演，这还算温和的；在讲演中，胡将中国在西藏的二十年努力比作把钱扔进了拉萨河。

胡耀邦和中共中央的决定，放弃了文化大革命的强硬同化政策，回到毛泽东 50 年代的更加注重民族敏感性的策略。新政策包含两个主要部分：(1)民族方面——鼓励复兴藏族宗教文化，包括大量使用藏语，用藏人干部代替大批汉人干部，从各方面使得西藏自治区更加藏族化；(2)经济方面——暂时免去税收和“低于市场价”的征购，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西藏经济发展，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平。

但是，北京不再愿意象五十年代那样，允许一个分离的，非共产党的拉萨政府——西藏应继续被共产党统治。^[6]这就是胡耀邦所指的“在统一领导下”。尽管藏族文化、语言和民族性要增强，工作在西藏的汉人要求学习藏语；但是藏人必须通过藏族共产党干部，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实施自治。虽然邓小平说，除了独立，其他的都可以谈，事实上，共产党的控制是先决条件。从中国的角度看，和解意味着达赖喇嘛返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藏。

尽管如此，新政策表示北京试图矫正他们对藏人犯的错，赢得藏人的信任和支持，虽然这些都是在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框架之内。这些变化也试

图回应海外的批评，同时告诉西藏的藏人，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这些不仅仅全是宣传。尽管西藏的很多汉藏干部对新政策强烈不满，中国政府在 1980 年后紧接着的这段时期实施了胡的政策若干方面。整个西藏个人宗教活动大范围复苏，（在一些限制条件下）庙宇重新开放，新的儿童僧人涌进这些寺庙，传统得以复兴。要求在商店和官方建筑上用藏文标志，公共机构被指示和人民打交道时使用藏语，藏族干部的人数增加，制定计划以提高藏文教育水平，大批汉族干部离开。^[7]不仅欢迎流亡藏人回来访问，藏族居民也可以出国探访他们的亲戚。

随着对内政策的形成，北京同时继续其对外政策，和达赖喇嘛接触。1979 年—1981 年期间，双方的非正式会谈继续，包括下面这封 1981 年 3 月 23 日达赖喇嘛给邓小平的信：

三个参观团已经能够发现西藏的正面和负面的情形。如果藏人的身份认同获得保持而且如果他们真正的快乐，我们没有理由抱怨。不过在事实上，九成以上的藏人在忍受着心理和生理上的痛苦，而且活得很不快乐。这些悲哀的情形并不是因为天灾而起，而是人为造成的。因此我们必须以合理的方式根据现实努力地解决这些问题。

为此我们必须改善**中国和西藏**，以及西藏内外藏人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设法在真诚和平等的基础上，透过未来更深的了解，建立起藏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友谊。现在已到了紧急运用我们的共同智慧，以容忍和宽大来使藏人获致真正快乐的时机。在我这一方面，我仍然为全体人类的福祉贡献我的心力，尤其是穷苦老弱的人，尽我的全力而且没有国界之分。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们对以上几点的看法（原文加着重号）。^[8]

考虑到流亡藏人要求民族自决和独立，这封信的调子比较和缓，令人鼓舞。但是，它仍然将西藏和中国称为分离的政体。中国政府没有直接回复这封信，1981 年 7 月 28 日，胡耀邦在北京秘密会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讨论了西藏问题。在这次会见中，胡提出和达赖喇嘛和解的五点方针：

中国已经走上新的时期，政治能够长期安定，经济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达赖喇嘛应该相信这一点。

达赖喇嘛和他的代表，应该开诚布公地和中央政府交往，不要捉迷藏。1959 年的事件我们不要再纠缠了。

中央政府真诚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我们欢迎他们回来的目的，是欢迎他能为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以及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 1959 年以前的待遇不变。至于西藏他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当然他可以经常回西藏去看看。我们对跟随他的人也会妥为安置，只会比过去更好一些。

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简单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9]

这一立场，当时并未公开，反映了中国政府的看法，他们认为西藏问题基本上是中国和达赖喇嘛之间的争端，而不是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问题。中方同时表明，中国不愿考虑妥协，在中国建立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的政治制度。如果达赖喇嘛回来，他能够“享有 1959 年以前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但是不要回到西藏，也不在西藏任职，大概意味着他将享有人大副委员长的名誉地位，而且经济上也得到妥善安排。西藏的政治制度仍然由共产党统治。他和其追随者将以个人名义回来，而不是作为一个新的政府，他们将“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尽管在声明中没有说明，做为补偿，中国将允许西藏独特的民族/文化（包括佛教）特性，并致力于改善藏人的生活条件。

显然，北京极力劝说达赖喇嘛返回中国。从其优势地位出发，达成合适形式的和解能够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的回归能再次使得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合法化，结束有关西藏问题的国际对话，劝说西藏群众真心接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的地位。当然，其风险在于，错误的和解很可能会给西藏的分离主义势力带来新的压力，或者更糟糕的，可能煽动新的叛乱。因此，关键在于维持对西藏的政治控制。尽管如此，中国人比较乐观，他们认为，他们愿意帮助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繁荣，许诺帮助西藏发展经济，这些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方案。考虑到此，他们邀请达赖喇嘛派参观团到北京。^[10]达赖喇嘛接受此邀请，1982 年 10 月，三个流亡藏人代表抵达北京，可能就此揭开中藏关系的新篇章。

达赖喇嘛及其官员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些会议上如何回应中国。胡耀邦的五点方针令达赖喇嘛大大的失望了。尽管有邓的高调，基本上除了独立，其他的东西

也不可能拿到台面上进行认真的谈判。对于达赖和其官员，他们是否可以接受少于完全的政治自治，如果可以，少多少？尽管他们强烈的认为，至少从 1911 年清朝灭亡开始，历史清晰地证明西藏的独立；但他们也理解西藏现在实际控制在强大的中国之手，藏人不可能在战场上打败中国。决定的焦点集中在：是否采取强硬路线，认为时间在他们一边，从而排除实际政治控制以外的其他选择，或者采取稍微缓和一些的姿态，相信真正的政治自治实际上很难做到，这是唯一的机会来保护文化上和种族上“藏化”的西藏。这些选择非常困难，高级官员们在达兰萨拉深入讨论达数月之久。

中国的五点方针尽管提出了一些妥协，但对于达赖喇嘛和其官员来说，甚至考虑一下其可能性都非常困难。二十年来，西藏流亡政府立场强硬，坚持西藏完全独立的权力，而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没有一丝人性或诚实的野蛮的、不值得信任的暴君。突然显示出愿意回到西藏，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治下，仅此就能轻易破坏达赖喇嘛和其流亡政府在难民社区中的合法性。流亡领袖同时也担心，历史是否会认为他们是叛徒，永远放弃了西藏的独立权利。这是个富含感情的话题，难以以一种不掺杂个人感情，成本效益分析和现实政治的方式来进行理性分析。西藏谈判团的一个成员谈到，开始，他发现自己甚至很难对中国谈判对手笑一笑，握个手。突然之间，西藏问题已超越了国际竞技场上的“表述”之战——达赖喇嘛和其官员手握藏人的命运，他们不得不谨慎衡量他们的决定对西藏下一代的潜在影响。

令问题更复杂化的是“民族西藏”的未来地位。流亡政府已深深地承诺重建一个“大”西藏，这样政治西藏和民族西藏将统一在一个政治单位之下。这是上一个西藏政府的努力目标（在 1913—1914 年的西姆拉谈判中），也对此寄予厚望；但是这对流亡政府尤其重要，因为大量西藏难民来自那些藏区。自 1959 年以来，达赖喇嘛在流亡政府中对民族藏区的藏人一视同仁，努力将不同地区的藏民团结到一个社区中，同时也将包含这些藏区的未来的“自由”西藏作为基本政治目标。然而，大西藏的目标完全无视政治现实。西藏已有一个多世纪未统治这些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的大片地区，在 1949 年共产党上台之前，已有大量移民移居，包括汉人和非汉人（回族），很难想象中国会将这么大一块地方拱手让出。但是，如果达兰萨拉决定不追求大西藏的目标，则会失信于流

亡的东部藏人。和放弃独立一样，这也是一个有高度争议性的议题，一旦外界得知达赖喇嘛愿意考虑此事，无疑会永久破坏流亡社区的团结。

除了这些限制和解和妥协的条件之外，另外一个因素是达兰萨拉领袖们的观点，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感觉自己占了上风。他们派出的参观团的访问揭示，西藏的大多数人民仍然拥护达赖喇嘛，因此他们觉得在谈判桌上有一个强有力的筹码——藏人的忠诚。因此，尽管中国有强大的力量，西方政府对西藏独立支持缺缺，他们仍感到中国不可能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解决西藏问题。回顾起来，这一点多少有点简单化和天真，但是对 1982 年的达赖喇嘛和他的高级官员而言，这已足够使天平倾向保持强硬，不进行任何妥协一侧。他们认为时间在他们一边。

最后，达兰萨拉在政治和领土让步上没有达成一致，甚至有压力不要为北京谈判达成任何共识。于是达兰萨拉派遣高级代表团到北京，指示他们只就大的问题进行谈判；例如，就西藏和汉藏关系提出历史争论。因此，这些讨论不涉及达赖喇嘛回归的具体问题。对于他们的政治地位，藏人代表仅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说法，*顺便*提到：如果中国愿意让台湾“一国两制”，西藏期望更多。

藏人的态度令中国人感到失望。他们本希望流亡政府准备好以友好坦率的态度来讨论他们回归的细节问题，当听到藏人坚持讨论大的问题和“贡施关系”，并未打算接受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西藏，不禁感到沮丧。如同流亡领袖估计过高一样，中方的这种期望同样简单化，有点天真。北京希望和解，但又不愿在改变西藏自治区的政治控制问题上与流亡政府进行妥协交换。结果，这次历史性的会谈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一无所获，相反，北京严重怀疑和达赖喇嘛和解的可能性。

1982 年会谈之后，流亡领袖避免对会谈进行评论，显示了一些善意，但同时继续攻击中国的政策和在西藏违反人权，^[11]这样的攻击往往超越了实际情况反应的事实；例如，指控中国进行种族灭绝。达兰萨拉仍惯于发动对抗性的“陈述”战争，而不愿采取新的行动，向中国发出清晰的信号：达赖喇嘛已准备发展新的友谊和和谐关系。

在中国一边，胡耀邦缓和政策的反对派将以上流亡政府的种种行为解释为他们没有诚意的信号。事实上，一些人明确将其定义为历史重现——他们认为这和五十年代达赖及其政府的两面派做派如出一辙。北京从而强化其对内政策，加大对西藏发展的资金投入。这一政策在1984年北京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上定案。会上批准了西藏自治区四十二个主要建设项目，将内地的“开放”政策扩展到西藏；尽管一些领导和专家担心这样会带来更多的非藏人口，从而进一步恶化藏人对中国和汉人的抵触情绪。从某种角度来看，既然北京无法劝说达赖喇嘛回归，解决西藏问题，强化它对西藏的统治，它就在没有达赖喇嘛介入的情况下，发展现代化西藏，同时允许群众（在中国法律制度框架内）发扬文化信仰宗教。

尽管如此，北京也不愿切断和达赖喇嘛的谈判，1984年，藏人代表和中国的第二次面对面会谈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谈上，藏人带来了准备好的谈判方案。他们声明，达赖喇嘛拒绝中国的五点方针，他们自己的具体建议包括：建立一个非军事化的，全面内部政治自治的大西藏。^[12]这一表态，显然从一开始就不会有结果。北京无意讨论西藏的真正政治自治。他们期望提高西藏的稳定与安全，而不是把西藏的政治控制让渡给达兰萨拉的那些“敌人”，搞乱西藏，更不用说让达兰萨拉来控制大西藏。一方面，达兰萨拉的领袖们误判了他们自己的优势和北京愿意达成协议的愿望；另一方面，他们只是不想接受任何让步。中国的不妥协态度令他们既生气又失望，从感情上也无法相信他们能够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达赖喇嘛访问北京和拉萨的建议不了了之。

中国则继续推行其对内政策，到1985年末1986年初，很多干部和知识分子认为北京很快将启动第二轮改革，加强胡耀邦所说的自治状况。在这一状况下，大部分官员应该是藏人，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是藏语。此外，新任的西藏党委书记伍精华不是汉族，而是少数民族（彝族），意味着下一任党委书记可能是第一位藏族党委书记。伍精华随即做出姿态，表现出他和政府尊重西藏文化，例如，在节日穿着藏装。他还创造一种气氛，支持西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因此，至少在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看来，拉萨处在一种有希望的气氛中。中国仍然确保，我们西方人所知道的言论和集会的政治自由，在西藏和中国其他部分

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允许西藏文化和宗教在一个藏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发展繁荣，已经迈了很大的一步。越来越多的流亡藏人持“海外华人”签证访问西藏，大部分到国外探访亲属的藏人也回国了。

但是，另外一股潮流在中国积聚力量：胡耀邦的宽大手段在中国和西藏都备受攻击，更多的左派藏族和汉族干部相信，向藏族民族敏感性做出更大让步的政策是有问题的，甚至是危险的。这些高级干部试图阻碍伍精华在西藏的计划，在北京私底下交流对他的批评。尽管如此，党的西藏政策基本上没有变化，即使在胡耀邦 1987 年 1 月被迫退休后也是如此。

达兰萨拉于是发现自己处于尴尬境地。他们很清楚，北京无意让西藏享有不同的政治制度，更不用说独立。他们也很清楚，北京正沉浸在某种成功感之中，感觉其改革很可能会赢得，即使不是藏族人民的心，最少也是他们的胃。在拉萨和农村地区，公社被解散了，物质生活极大地改善了。同时，中国的经济能力和国际声望不断增加，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其与北京的战略关系。因此，流亡政府面临着真实威胁，其在西藏问题中的角色可能被边缘化。

达兰萨拉和达赖喇嘛于 1986~1987 对此做出回应，他们发起新的政治攻势——我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国际游说运动。”^[13]一方面，他们寻求新的西方政策和经济手段，来迫使北京给他们所希望的让步；另一方面，给西藏的藏人以希望，达赖喇嘛已接近成功获得西方支持来解决西藏问题，实质上，把藏人的注意力从他们的胃转向他们的民族之心。

达兰萨拉的新建议 [\[回目录\]](#)

美国政府是这场新的攻势的中心。在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中间，美国在藏人五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给他们提供了最多支持。但是，当美国放弃围堵中国，转而采取缓和政策时，对西藏的直接援助结束了。西藏问题即使从边缘上都不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流亡政府的新攻势，对准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软肋——国会，寻求重新获得美国的积极支持。这一策略的关键创新是，第一次由达赖喇嘛将流亡藏人的政治讯息带到美国和欧洲，特别是在政府论坛上。此前，他仅以宗教领袖的身份旅行和讲演。^[14]在西方支持者、捐赠者、美国众议院同情者

和国会助理的帮助下，他们发起了一场为流亡藏人的事业赢得美国支持的运动；本质上，此运动重新定义了西藏问题的意义，从地缘政治的国家利益转向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美国对自由和人权的意识形态的承诺。其目标是创造一种动力：引导美国去支持西藏，因为这是热爱自由的美国人的正义事业。

1987年，运动获得了几个主要突破。六月份，众议院通过议案，谴责在西藏的人权侵犯，指示总统表达对西藏的同情，敦促中国和达赖喇嘛进行建设性谈判。^[15]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第一次发表其政治演讲。这是一次精心准备、措词强硬的讲话，他谈到，西藏在中国入侵时是完全独立的。^[16]达赖喇嘛将这次入侵称为中国对他的国家的非法占领。特别的，他说，“虽然西藏失去了自由，不过按照国际法，今天的西藏仍然是一个被非法占领的独立国家。”这次演讲也提出严重的人权侵犯指控，两次指控中国对西藏人民进行“大屠杀”。

达赖喇嘛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建议，建议如下：

将西藏转型为“和平区”——包括整个民族藏区，要求中国迁走军队和军事设施。

放弃他认为会威胁到西藏族群生存的汉人移民政策。

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民主自由。他断言“藏人被剥夺了所有基本民主权利和各种自由，他们生存于一个外来政权之下，而在这个政权之中，所有的权力都是被汉人官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队所把持。”

恢复并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禁止中国利用西藏作为生产核子武器并弃置核子废料的场所。

开始就西藏未来地位以及西藏与中国人民的关系进行谈判。

此次演讲在美国收到很好的反响，三周后，即10月6日，参议院通过了类似的议案。最后，1987年12月22日，里根(Reagan)总统签署了《1988~1989财政年度外交关系授权法》，附上了这份国会的修正案，包含如下要点：

(i) 过去四十年来，很多藏人因为战争、迫害或者饥饿遭受不幸和死亡；美国政府必须向他们表示同情。

(ii) 美国政府必须将藏人的待遇作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外交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iii) 美国政府须促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积极响应达赖喇嘛的努力，为西藏未来展开建设性会谈。

(iv) 美国政府必须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释放西藏所有的政治犯。^[17]

它还在关于出售军事物资方面增加了一个限制性条款：美国政府应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解决西藏人权问题上的诚意和适时的表现”，并授权接受不少于 15 名藏人进入美国大学。^[18]

虽然这个政策比起现已放弃的 1960 年克里斯蒂安·赫脱的立场要弱得多，而且仅是“国会的认识”，但是达兰萨拉仍将其看成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以此为起点，国会将驱动建立新的美国对藏外交政策，积极寻求西藏问题以对达赖喇嘛有利的方式解决。于是，从此以后，美国再次活跃在西藏问题之中，尽管是通过国会而不是国务院或行政分支。

第一次骚乱——1987 年 10 月 1 日 [\[回目录\]](#)

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活动在拉萨广为人知，并获得了急切的呼应。^[19]藏人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和 BBC 中文广播，中国政府也在当地媒体上宣传抨击达赖喇嘛的访问。9 月 27 日，距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第一次演讲不到一周的时间，拉萨哲蚌寺的民族主义僧人们举行了一次政治性示威，支持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的建议。他们开始沿着内转经道（bogor）前进，这是一条主要的转经道（环绕神圣的拉萨大昭寺）和主要的藏人自由市场。几圈后，警察还没有出现；他们沿着一条主要道路向西藏政府前进。并在那儿被捕。

四天之后，10 月 1 日上午，另外一队二三十个僧人在拉萨示威，表达他们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以及对先前示威者的支持，并要求释放他们。警察马上把他们监管起来，开始殴打他们。一群藏人聚集在警察总部外面，要求释放这些僧人；不久以后，示威升级为全面骚乱。最后，人们放火焚烧了警察局，一些车辆和商铺，警察（包括藏人警察）向人群开火，大概有六到二十个藏人被打死。

这场骚乱，以及其中表达的反汉情绪，令北京感到震惊。历年来，拉萨不断发生秘密的民族主义事件，但是那些事件规模小，相对孤立，容易处理。现在北

京要面对的现实是：成千上万的普通藏人发怒了，他们冒着死亡和牢狱之险，参加大规模骚乱，反对政府和汉人统治。此次骚乱尤其令北京难堪的是，它正好呼应了达赖喇嘛和美国国会议员们对中国的攻击，显然向世界证明，西藏的可怕的情况是真实的；尽管中国认为他们正在执行一个缓和的政策。

骚乱过后数月，拉萨不断有更多的僧尼示威，并固定出现反政府的招贴。然后，警察能够迅速逮捕示威者，而不触发骚乱。僧人和政府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民族主义僧人发起示威，政府试图逮捕他们以避免另一起骚乱，显然，骚乱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而小的示威则不会。

到1987年末，人们的注意力转向1988年2月的藏历新年和祈祷大法会，将有2000多名僧人来到拉萨的大昭寺，进行数周联合祈祷。^[20]问题是，当天的祈祷大法会是否还能按计划进行；如果进行，僧人们是否会试图在此场合发动大规模示威。另一场骚乱的风险值得认真考虑，因为成千上万的拉萨信教藏民会参加法会。

在西藏的很多高级干部认为，1987年的骚乱证明了他们的观点：缓和的“民族”政策是危险的，会导致共产党在西藏失去权力。在拉萨和（四川）成都召开了几次特别会议，提交了对自由政策的批评报告，并将报告非正式的送交北京；新的党书记，赵紫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讨论西藏问题。11月，政治局判断，目前西藏的问题部分原因是因为北京的西藏政策没有正确执行。但同时，它也认为目前的政策太自由了。这标志着北京从其缓和政策开始后退。

政治局决定之后，拉萨日报头版发表文章，将十月骚乱的部分责任归因于当地干部过分和不当运用“极左思潮”。此前，它将示威和骚乱完全归因于外部煽动。现在它承认它自己的干部也有问题。这篇精心计划的文章试图以一种现实和坦白的方式赢得藏人的好感，尽管这种坦白某种程度上激怒了很多西藏的高级干部。

同时，北京做了一个决定，此决定后来看来思虑不周。为了回应国际压力，中国领导人显然感到，要向世界显示，其自由的西藏宗教政策是成功的；于是，它批准了当年的祈祷大法会。西藏自治区书记伍精华宣布，往年，他都身着藏装参加大法会，今年他仍旧如此，以此公开显示他对藏人对其宗教文化的强烈

感情的尊敬。他还说，他在西藏的主要三项工作是，宗教，民族文化和统一战线；这大致显示，他的核心工作内容将是，继续搞好和藏人的关系，从根本上关心他们的民族敏感度，更胜过经济发展。

作为和解试图的一个大动作，是已故班禅喇嘛于 1988 年初访问拉萨，班禅是拉萨第二大活佛世系。班禅被派到西藏，授权做出一些让步，试图平息那些僧人，让祈祷大法会顺利进行。计划是，如果僧人们参加祈祷大法会，并在以后关心宗教而不是政治，将给僧人们切实的财政补偿，放松限制。做为要求大法会前释放所有僧人的回应，1988 年 1 月 26 日西藏政府释放了 59 名僧人，做出善意的姿态，而仅羁押了 15 名僧人。^[21]接下来，在哲蚌寺的大会上，班禅喇嘛告诉僧人们，政府将拨款拉萨三大寺（哲蚌、色拉和甘登）人民币两百万元（500,000 美元）。

班禅喇嘛试图平息局势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大部分愤怒的僧人对中国的西藏政策非常不满，这没法用钱来弥补。他们觉得，中国现在试图利用祈祷大法会，做为一种宣传工具来对付达赖喇嘛的建议；而且他们认为，这次时间在他們一边，因为达赖喇嘛现在成功地获得了美国的支持。在这种气氛中，很多年长的僧人建议政府，不要在拉萨举行祈祷大法会，因为他们无法保证那些年轻僧人们会做些什么。他们强烈建议，1988 年的祈祷大法会应在各自的喇嘛庙分散举行，而不是集中到拉萨的大昭寺。

但是政府拒绝了建议，坚持召开祈祷大法会。因为邀请了外国记者，政府哄骗、威胁并请求那些僧人们参加。尽管有很多僧人抵制，大多数都来了，直到最后一天，1988 年 3 月 5 日，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当喇嘛们举着强巴佛(弥勒佛 Maitreya)塑像的仪式就要结束时，一个僧人向坐在典礼上的一排官员叫嚷，要求释放仍被关押的一名僧人。一个藏人干部叫他闭嘴，他和其他僧人立即反驳说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就这样，正当所有人认为法会平安无事地度过时，局势失控，潜伏的愤怒酿成了拉萨的第二次骚乱。随后在拉萨的逮捕和镇压则将民众更远地推向了激进民族主义一边。

骚乱之因 [\[回目录\]](#)

为什么在中国采取其缓和、照顾敏感民族情绪的改良政策之时，会发生这一系列骚乱呢？思考其原因是很有启发的。

中国宣称示威部分上是被达兰萨拉鼓动的。不清楚达兰萨拉（或者某些流亡藏人）是否真的命令一些哲蚌寺的僧人组织示威，但是很清楚，僧人们的示威是为了对抗中国在拉萨的批判宣传，并展示对达赖喇嘛在美国提出的新建议的支持。至今，僧人们还为此感到骄傲，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支持达赖喇嘛代表西藏在西方做出的努力。^[22]

影响藏人态度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他们用中国政府制度的框架来理解美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是橡皮图章，所有的事情都由党决定；因此拉萨的藏人自然而然地认为，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反映了美国政府对达赖喇嘛和西藏独立的支持。因此，很多拉萨的普通藏人相信，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的发言是西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在他们眼中是世界头号军事强权——将很快强迫中国“解放”西藏。西方的事情通过短波电台传播，在决定藏人特别是拉萨人的态度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任何角度看，很清楚，那些参加第一次示威的僧人们，从未梦想过他们的支持达赖喇嘛的非暴力反抗会酿成血腥的反中国骚乱。大规模骚乱不同于小的政治示威，其原因是复杂的。尽管中国在进行改革，对政府（在藏人的眼中是汉人的同义词）的辛酸和不满仍然残余至今。

自 1959 年被中国直接统治后，藏人经历国家，民族和个人的丧失和苦难，他们一直对此非常愤怒。和美国的一些少数民族类似，他们把过去的压迫部分当成了当前的现实，而将他们的不满发泄到今日的汉人身上。很多在西藏的汉人的谦逊态度更强化了这种病态心理。

此外，中国政府坚持迅速发展西藏经济，这一政策制造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自 1984 年以来，汉族和回族大量涌入西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过程的开始，并不象通常指控的那样，是一个中国精心策划的方案，想用汉族“殖民居民”来“淹没”西藏；而是政府意图迅速发展西藏经济的结

果。这些发展项目支付的大笔资金导致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连锁反应，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汉族建筑工人，其存在又创造了对新的中国餐馆、商店和其他服务业的需求。官方也了解其中的弊病，实际上 1984 年西藏党委曾试图禁止青海的汉人和回人进入西藏。但是西藏对木工、泥瓦匠和其他技术工人有着巨大的需求，这种现实需求使得禁令无法执行。汉族商人和工匠的成功给临近省份送去了西藏有利可图的信息；这一信息每年又带来了更多的汉人和回人。今天，连汉族乞丐都到拉萨来找生意。拉萨的大部分藏人对这些情况感到不满：汉人逐渐控制了当地经济，从他们手中抢走了工作机会，他们可爱的城市变得越来越汉化。他们要经济发展，但不想以拉萨和西藏的民族特性和人口构成的转变为代价。

自从 1951 年“解放”以来，过去的伤害让当地藏人感觉痛苦和愤怒；加速的经济发展项目更加加剧了藏人的这种感觉，也破坏了藏人对改革正面影响的态度和感情。除此之外，藏人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到民族问题上——西藏有太多的汉人，他们谋取了太多利益。这种局势反过来又加强了藏人的无力感，以及对汉人主导的权力滥用的反感。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北京不愿意给藏人所要的全面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自邓小平上台后，佛教迎来了新的复兴，很多一度繁荣的寺庙，例如哲蚌寺，也恢复了其作为宗教中心的功能。但是，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限制，例如限制僧人的总数。这些限制激怒了僧俗群众，突出了这样的事实：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实践自己的宗教和文化，需要得到异族汉人价值系统的允许。在北京看来，这些限制是有意义的，因为那些寺庙是民族主义和藏独活跃分子的温床。让那些寺庙的规模和财富增长，只会增强那些致力于挑战中国在西藏地位的人的力量；但是，限制他们，却使得拉萨的藏人很容易看到玻璃杯是半空的而不是半满的。

最后，藏人认为西藏是他们专有的家园，不能低估这种强烈的历史和民族情感。因为 1950 年西藏没有汉人，所有的成年藏人清楚地记得一个全部是藏人的西藏。他们觉得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国家，把它转变为中国的一部分。他们相信西藏应由藏人，使用藏文，并按照符合藏族文化核心价值观和信仰的法律进行管理。对于大多数藏人而言，新的改革向这个方向进了一步，但是，如果西

藏不是单一民族地区，仅仅允许个人转经轮，点酥油灯还不够。汉族工人的流入很明显是往错误的方向上走了一步，这也不符合胡耀邦政策的精神。

1987年秋，第一次骚乱前夕，拉萨藏人的态度和感情很矛盾。一方面是压抑已久的愤怒，不满和沮丧；另一方面，文化、语言和经济条件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关键在于，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新的成功给他们提供了除了中国统治的另外一个现实选择——达赖喇嘛的工作和美国的力量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独立仿佛就在眼前。

在这种气氛中，藏人伟大文明的精英象征——僧人——提供了点燃怒火的催化剂。1987和1988年的骚乱本质上是被压抑的不满和愤怒的自然爆发的爆发。这不是拒绝1980年的改革政策，而是对1959年以来，藏人被强权异族消灭国家，毁坏文化的计划外的反应。这场骚乱类似于美国在洛杉矶瓦茨区(Watts)和其他内陆城市经历过的可怕的种族骚乱，或者在伤膝大屠杀(Wounded Knee)中美洲原住民爆发出来的愤怒。当藏人看见警察殴打手无寸铁的僧人，他们的民族热情爆发了。他们不是针对贫穷的物质条件，而是发泄对过去的不公正和现在被多数异族统治的不满。多修一个运动场，一条道路，一间工厂或者一栋公寓楼解决不了拉萨的问题，正如不能解决美国黑人贫民窟的问题一样。

北京的强硬策略 [\[回目录\]](#)

来自美国国会的新的支持，以及西藏发生的示威和骚乱，令流亡藏人们下结论：他们开始积聚了需要的关键力量，可以给北京施压以达到他们政治自治的目标。

1988年4月，中国宣布如果达赖喇嘛公开放弃独立目标，他可以居住在西藏（而不是北京）。两个月后，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对欧洲议会的讲话中对此做出回应。这标志着他对返回西藏的条件的第一次公开阐述。其主要内容包括：

整个的西藏(包括民族藏区和政治西藏)应该变成一个自治的民主政体，这个民主政体应于西藏人民为其共同福祉和保护自己及西藏的环境而同意的法治基础上与中国共同建立。

中国政府应负责西藏的外交。西藏政府应透过其外事单位，在宗教、商业、教育、文化、观光、科学、体育和其他非政治事务上与外界发展并维持关系。西藏应该加入与这些方面有关的国际组织。

西藏政府应建立于基本宪法之上。这个基本宪法应该授权西藏的民主体制政府……这表示西藏政府将有权决定所有有关西藏人民和西藏事务的事。

由于个人自由是任何社会发展的真正根源和潜能，西藏政府应完全恪遵全球人权宣言以确保包括言论、集会和信仰在内的这些自由。其中宗教是西藏国家认同和深藏在每一个藏人心中的精神价值的根源之一，西藏政府应特别加以保护和发展。

西藏政府应设立于拉萨，应该有一个经由民选选出的行政长官、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和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

西藏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应该取决于西藏人民的意愿，并特别注重提升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准。

我们应该召开区域性的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军事化。在和会召开、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达成之前，中国得在西藏维持数目严格限制的军事设施，这些设施的存在应该完全为了防卫的目的。^[23]

达赖喇嘛表明他已准备好和中国就此建议进行谈判，并宣布其谈判小组成员，其中包括一名荷兰籍法律顾问。

斯特拉斯堡建议不寻求完全独立，但是它也不接受中国政治制度下的有限自治。如其说它呼吁给西藏新的地位，还不如说它支持回到清朝统治下的自治权。达赖喇嘛可以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对西藏事务基本没什么权力。因为这份建议基本上早在 1984 年秘密会谈中就已提交给中国，所以对中国而言没什么新东西。但是，这次讲话的重要性在于：达赖喇嘛第一次公开告诉他的人民（和世界），独立是个不现实的目标；如果能够完全自治，他愿意接受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勇敢的建议，这份建议在流亡藏人政治圈内掀起了波澜，很多人批评它是背叛。^[24]

这份建议同时是个有效的政治策略。如果，象流亡领袖所期望的那样，他们的胜利能够劝说北京比 1984 年更接受那样的政治自治，双方将开展实质性的谈判。同时，因为邓小平和其他高官多次重复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现在这份建议把北京放在了一个困难的位置。显然，拒绝这份建议会显得北京不

讲道理，同时也提升了达赖喇嘛一个政治家的国际声望，为了达成永久性的和平愿意做出妥协。

起初，斯特拉斯堡讲话将北京陷入混乱。从基本面上看，领导层并没有改变他们愿意接受的妥协方案；但是，内部也有意见认为，至少要给外部一种愿意讨论斯特拉斯堡建议的印象，因为它没有要求独立。最后，在开始表现出一些有兴趣的信号之后，强硬派的观点占了上风，斯特拉斯堡建议被认为是独立的一种隐蔽方式而被拒绝。回顾一下历史，不谈中国怎么可能允许成立一个大西藏，在中国当时的内部局势下，很难看出北京怎么可能让藏人享有西方民主式的自由，而让中国的其他部分置身其外。达兰萨拉在谈判队伍中包括了一名西方顾问，这不必要地刺激了中国，让后者认为受到了外部干涉。最终谈判没有进行，6个月后，1988年12月，僧人们纪念国际人权日的示威引发了拉萨的第三次血腥骚乱。

在此局势不断恶化之时，西藏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于1989年1月28日意外逝世，他的死给北京带来一个突然的秘密机会。中国方面希望打破和达赖喇嘛的僵局，由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喇嘛来北京参加班禅喇嘛的葬礼，想借此机会让达赖喇嘛和中国高层领导非正式地讨论政治局势。^[25]一个例外的机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达赖喇嘛面前，他可以访问中国，而不用理清那些复杂的政治问题。做出此一邀请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方面相信达赖喇嘛比他的那些顾问们更缓和，直接的讨论可能会打破僵局。

但是达赖喇嘛和其高官不愿意接受这一邀请。中方不让达赖喇嘛访问西藏，因此流亡领袖担心，如果他到中国而不去西藏，拉萨的藏人会觉得被抛弃。他们也害怕中国可能会漠视他或者把他当成个小人物，以此来羞辱达赖喇嘛。此外，达兰萨拉的强硬派官员们担心，在和中国高层面对面的讨论中，达赖喇嘛可能会接受比他们所想的更多的妥协。于是，他们认为一切显然对他们有利，流亡领袖们劝说达赖喇嘛不去冒这个险，拒绝了邀请；告诉中国佛教协会，他们已在达兰萨拉举行了适当的仪式来悼念班禅喇嘛。^[26]后来很多人回顾起来，认为这是1978年后丧失的最重要的机会之一。

其间，1989年西藏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拉萨的藏人继续进行小的民族主义示威，并在1989年3月5日酿成第四次拉萨骚乱。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终于认

识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必须采取强硬手段来镇压动荡局面；它走出了激烈的一步，在西藏宣布戒严。



1. 尽管这对夫妇是受过教育的政府公务员，他们选择了西藏很普遍的传统藏式婚礼。上百名被邀请的客人，从这个小屋走过，在新郎（左）和新娘（右）的脖子上围上哈达(Katak)，把礼金装在藏式的纸叠信封内，放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然后，客人们到一个大的租用的礼堂，在那儿他们庆祝三天——喝酒，吃东西，打麻将等。



2. 拉萨旧城被拉萨河谷的裸露的高山环绕，大多数本地拉萨人都住在这里。街道上杂乱地拥挤着汽车、自行车、人力车和行人。街道两边的大多数传统藏屋都被替换为新的混凝土建筑，但是如图所示，基本上风格划一。随处可见的经幡飘扬在屋顶，标志着藏人对自己传统宗教文化的虔诚。



3. 数千年来，西藏僧俗到全西藏的各个圣地朝拜。很多人，象这位孤独的僧人一样，步行数月，前往遥远的岗仁波齐山；这座著名的神山坐落在西藏西部边陲，被认为神佛教宇宙的中心。他把所有的行李背在传统的曲木框架背包内，手持木制朝圣手杖，他从四川省的喇嘛寺出发，历经5个月，走了1100公里，到达拉萨西面320公里的这个佛塔；还需要走2个月，560公里才能达到他的目的地。



4.-5.上——一家来自西藏北部的藏民家庭，到拉萨来朝圣，参观拉萨大昭寺著名的释迦牟尼佛像。他们穿着日常的羊皮服装，这是他们第一次来拉萨。

下——与之对照，这两个拉萨藏人时髦、现代，看起来和北京或者克列夫兰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北京希望这一代藏人（和他们的小孩）会成为现代化藏人，安于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6. 这个藏族女孩居住在西藏北部高原“羌塘”，她用一个产自华东的镜子检查自己的“化妆”。她脸颊上的胭脂是印上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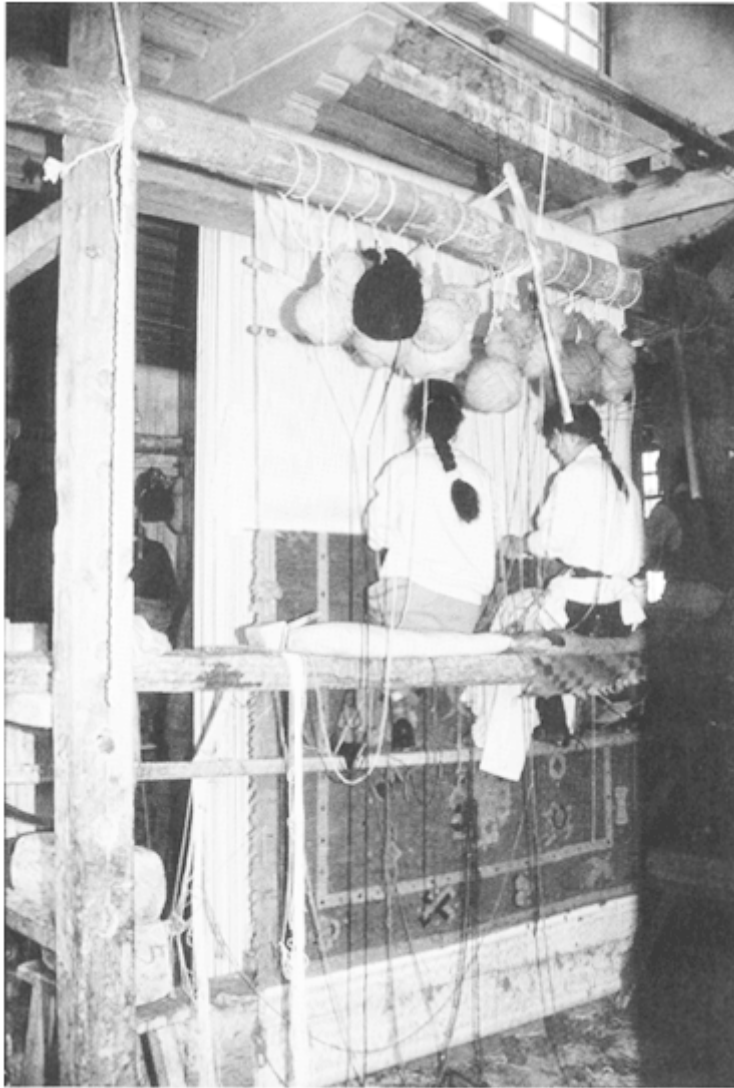
7. 止贡县乡村小学学生开始一天的早操。对于当地的很多家庭而言，学校代表了一种希望：他们的小孩可能找到工作，离开农业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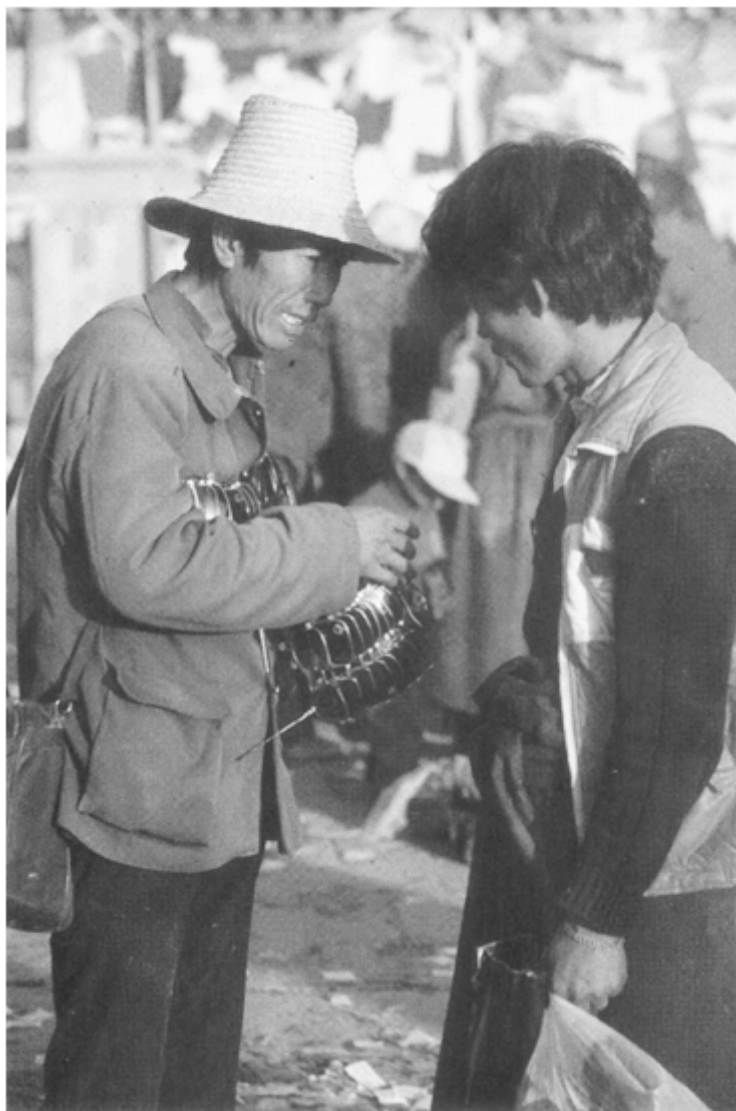
8. 拉萨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是雪顿(Shodun)节，每年8月末的雪顿节上，将上演传统藏戏。这些剧目和佛教主题有关，由蒙面的歌舞队演出。每年有数千拉萨人参加哲蚌寺、罗布林卡和拉萨其他地方的演出。图中猎人(ngomba)正在表演他们的舞蹈。



9. 七月六日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生日，这一天，成千上万的藏人来到城市东南部的公园庆祝这一节日：祈祷、熏香、洒青稞、野餐。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新的风俗，每个参加的人向其他人抛洒青稞面粉。一个小时之后，所有的参加者从头到脚都盖上了白色的青稞粉。



10. 经济发展中，西藏的一个优势产品是出口手织地毯。西藏人改进了他们传统的地毯设计和生产技术，生产出有国际竞争力的毯子。这张照片中，两个女青年被拉萨的一个大型合资地毯厂雇佣，在一个大型织机前织一块起居室用的大地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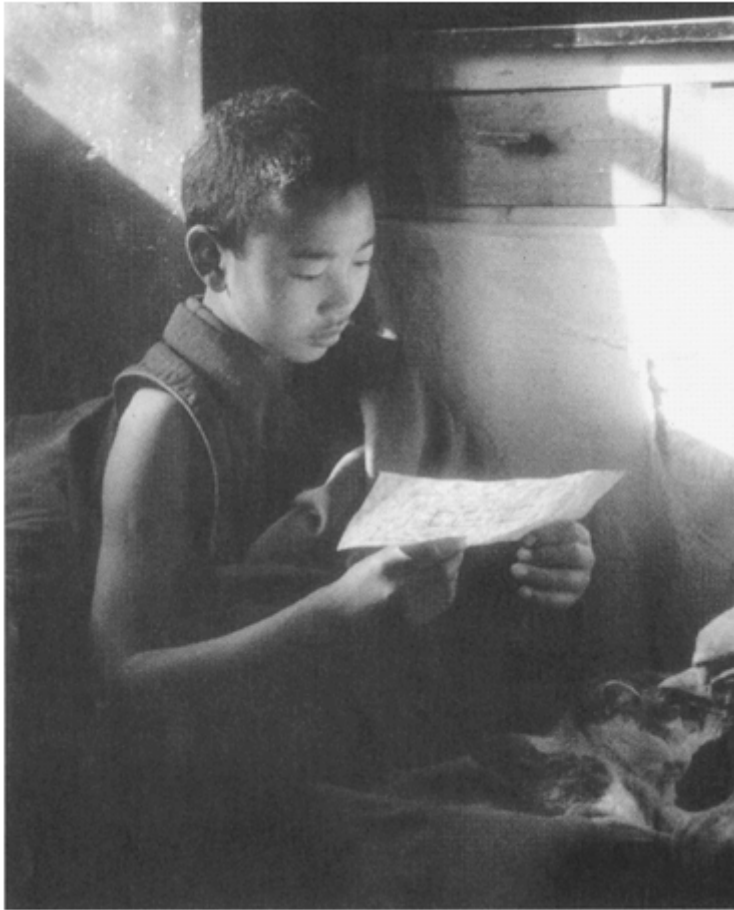
11. 很多汉人小贩，象图上这个人一样，在拉萨走街串巷，把太阳镜卖给象这个青年一样的本地藏人。



12. 中国日益卷入西藏经济，包括乞丐和图上的这名汉族体力劳动者。



13. 拉萨藏人走在环城的八公里转经道上，把一些熏香扔进火堆。每位妇女在整个转经途中手持一个转经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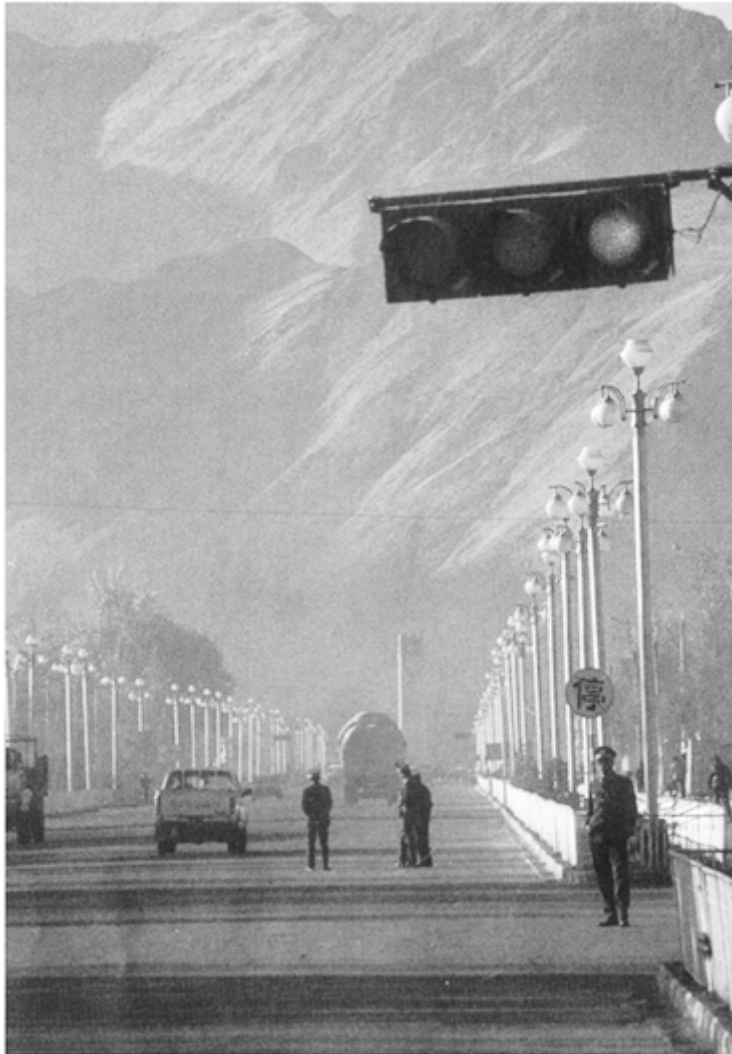


14. 文革中寺庙被全面禁止，文革后整个西藏的寺庙得以复兴；拉萨最大的寺庙哲蚌寺在 1959 年曾经有 1 万名僧人，现在只有 800 名。这张照片中，哲蚌寺的一个小喇嘛坐在自己的房间里背诵经文。



15. 在拉萨，教育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很多父母中间，私立的学前班逐渐普及。这个学校是由一个前政府的僧官创立，教二十多位学生学习藏文读写。这张照

片中，一位稍大的孩子教另一位新学生如何写藏文，他用的是传统教法，手把握住学生的手写出字母。



16. 除非发生政治骚动，拉萨的警察和军队基本上保持低调。这张照片上，几名警察在拉萨西部的主路上值勤。背景上的纪念碑是为了纪念二十世纪 50 年代修建从中国到拉萨的公路的中国工人。1996 年，纪念碑被西藏民族主义者放置的炸弹毁坏。

1989年北京受到的另一个大挫折是达赖喇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海内外的藏人都认为那是一个胜利——一个间接的但是强有力的声明：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合法的，这是一个信号，全世界都在身后支持达赖喇嘛和中国的斗争。最后，1989年也带来了天安门事件。尽管这一事件和西藏的形势没有直接联系，藏人一般对所谓的“汉人”事务不感兴趣，天安门事件无疑在中国鼓励了更强硬的政治政策，当局更容易在西藏采取强硬措施。

到1989年底，北京在西藏的内外策略处于一片混乱之中。除非中国愿意放弃西藏的直接政治控制，接受类似斯特拉斯堡建议的控制状态，藏人将继续他们的国际游说活动，鼓励更多的内部示威和新的国际谴责。达赖喇嘛重新夺回了主动权，他的国际建议成功地把局势扭转过来，北京在国内外两个战场都处于被动防守。

而北京对此的反应是采取更加强硬的民族同化政策。在北京，鸽派很难反驳历史的重演：毛泽东的渐进主义西藏政策（支持达赖喇嘛同时放慢改革速度）促成了1959年的叛乱；而胡耀邦的政策导致1987~1989的骚乱。很多官员强烈感觉，如果中国不停止“娇纵”西藏反动迷信分子，局势会变得完全不可收拾。中国政法委书记乔石（现在是人大委员长）在一次到拉萨的调查过程中的讲话，揭示了北京的愤怒和沮丧之情。在拉萨召开的一次西藏政治协商会议上，前西藏政府和宗教领袖批评当前的宗教、语言和经济政策。乔石的反应非常愤怒，对着这些前社会精英，冲口而出一些“阶级斗争”的词汇，这些词汇自从1978年邓小平上台就没有听到过了。乔石提醒他们，对于过去的错误，政府已经归还了寺庙，并给予他们很高的社会地位；然后他辛辣地问他们还想要更多吗——“你们想要我们怎么做？”他说，“把你们的仆人还给你们，让你们象旧社会那样生活吗？”

在1989年冬的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的缓和政策正式被放弃。领导层的总体感觉是，北京对西藏的自由化条件，既没有从拉萨人民那儿得到表扬，也没能使他们相信他们最好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相反，他们增长的民族主义激情带来了不安和骚乱，实际上弱化了中国在西藏的地位。这一失败促使北京采取新的政策，提高西藏的安全，而不依赖于赢得西藏当前的这一代人；北京认为，这一代人是毫无希望的反动分子。

新政策假定：不能指望达赖喇嘛在西藏扮演建设性角色。北京试图抛开他来解决西藏问题。更具体的做法是，北京派遣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员（非藏人）进藏，来加强西藏党的领导，希望他们能够更加有效地使西藏和藏人现代化。类似的，更大的努力放在教育藏族年轻干部和复兴党的各级机构上——从上层到乡村一级。当然，安全方面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在不稳定区域增加了一些便衣和警察局，更新监视设备。这些措施的结果是，新的示威很快得到控制，有效制止其升级为骚乱。确实，自1990年戒严解除之后七年间，尽管有频繁的示威，却没有发生一起新的骚乱。此外，实施这些控制措施没有限制拉萨居民的日常生活——只要拉萨人不从事政治活动，他们想去哪就可以去哪，会见朋友，邀请喇嘛举行宗教仪式，集会等等。这种成功给了北京的领导人信心，无论藏人不同政见者（或者流亡藏人）搞什么阴谋，他们的安全部队都能对付。

中央政府新政策的基石是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为基础建设和提高生产力的发展项目拨出大笔资金，以此来加速西藏的经济发展。这一政策寻求西藏和藏人的现代化，提高他们的收入，牢牢地将西藏和内地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以降低他们的离心力。为了有效地实施这一政策，北京决定西藏必须迅速发展。例如，1994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西藏工作会议宣布，西藏“迫切需要发展得更快些”，制定了经济计划，要求每年增长10个百分点，到2000年在西藏1993的GDP基础上增长一倍。在1994年会议上，北京同时批准了总额达23.8亿元（约合2亿7千万美元）的62个基础建设项目。^[27]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的经济政策取得了北京所希望的效果。大批藏人从经济上受益，其他的也把注意力从政治转到新的经济机会上来。但是，这一政策也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经济融合”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允许非藏民族（汉族合回族）自由地在西藏做生意。成千上万的汉人和回人来到西藏，参与建设项目和开办公司。随着北京逐步提高资金投入，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这一非藏人群是整个中国一个常见的现象的一部分，通常称为“盲流”——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地区（通常是农村）的常驻居民，但是暂时居住和工作在另外一个地区（通常是城市）。他们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没有“户口”，因此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殖民者”，但是长年累月地住在那儿。^[28]自中国于1984年至1985年间宣布要将“开放”政策扩展到西藏开始，作为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

这股人流不断扩大。对于这一人群，西藏自治区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他们极大地改变了拉萨的人口构成和基调，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扩展到小的县城。如此多的非藏人在西藏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们的到来将西藏的政治中心拉萨，变成一个非藏居民人数与真正的藏族居民相等，甚至更多的城市。

非藏人现在控制了当地经济的各个层面的大部分领域——从街头的自行车修车匠，到计算机店老板，到和中国内地做生意的大公司。拉萨的很多藏人对这股洪流颇有怨言，他们认为应该制止或者严格限制这种情况，因为西藏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市场经济新的增长的第一受益人应该是藏人而不是外来者。藏人们相信他们在经济上无法和那些更有技能、更工业化的汉人和回人竞争；如果政府不介入，保证自治区居民的福利，他们将在经济上和人口构成上不断被边缘化。^[29]这种言论认为，正象北京树立强大的壁垒，阻止外国人控制中国的新兴民族工业那样，西藏应该制定规章制度，阻止有资金和其他优势的中国人，保护藏人。

北京否决了这种言论，坚持快速发展是第一位的。它拒绝禁止或者限制非藏工人流入西藏，也不愿为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特殊的经济保护法规。邓小平本人强烈支持这一观点。例如，1987年他说，“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30]

当然，北京不愿意阻止这一流动，也有其政治和战略动机。大量的非藏人口在西藏居住和工作，这给北京一个新的强大的拥护中国的“支持者”，提升了西藏安全。^[31]虽然这些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永久殖民者，但任一时刻都有大量的中国人居住在西藏的主要城市。就像很多美国人那样，他们到一个城市去工作几年，最后定居在这个城市；很多汉人也可能最后定居在西藏。因此，既然北京无法劝说大部分藏人忽略达赖喇嘛，接受成为中国一部分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北京可以让大量中国人定居在西藏。我们很容易想象，如果中国对西藏的控制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中国不光会派遣更多军队，它也会通过新的法案，

给予“流动人口”有吸引力的补贴，诱使他们在西藏定居，以此来造成大批汉人的定居事实。

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期望这些中国人能给藏人带来现代华的思考和行为模式的范例，让他们耳濡目染，逐渐仿效。基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经验，北京领导人部分倾向于这种文化传入过程，更“现代化”的汉人能够打开藏人的思想和眼界，创造出新的，“现代化”的藏人，而这些藏人不会深受宗教和喇嘛的影响。因此，尽管北京意识到，其开放政策短期内会给藏人带来伤害和痛苦，它觉得这是西藏社会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代价，长期而言它会获得胜利。

但是，很多藏人，包括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这一政策的伤害。一个在拉萨少数民族干部圈里传播的“黑色”幽默反映了藏人对中国政策的失望：

你知道[中国统治下]现代西藏历史的四个阶段吗？

第一个十年(1950-60)，我们丢了土地[即，中国军队进入并控制了西藏]；第二个十年(1960-70)，我们丢了政治权力[即，传统政府被汉人主导的共产党政府替代]；第三个十年(1970-80)，我们丢了文化[即，文化大革命毁灭了宗教和其他旧的风俗]；第四个十年(1980-90)，我们连经济都丢了[即，开放经济政策使得非藏人主导了自治区的经济]。

北京还试图通过教育制度来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藏人精英阶层。在西藏的标准学校系统之外，自1985年北京开始了一个计划，在中国内地省份建设特殊的西藏中学，并在1987年后扩大了这一计划。今天，大约有10,000青年藏人在中国内地的这类学校中就读，并有更多的在职业学校念书。1994年，西藏开始了新一轮教育和党的改革，寻求减少文盲，同时更严密地控制教育内容，以使西藏学生不会接触到微妙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意识形态。同样，1994年，下令西藏政府官员召回在达兰萨拉念书的子女，停止在家中供奉达赖喇嘛的画像。^[32]

这些措施未必能消除民族忠诚和敏感度；例如，很多在内地生活的藏族学生，遭遇了当地汉人的偏见和固执，强化了他们的藏族认同。尽管如此，这些变化可能及时产生了一类受过良好教育，宗教色彩淡漠，感觉在中国社会生活舒适的藏人群体。评估这种可能性尚为时过早。

北京目前的“强硬”西藏政策也延伸到语言等文化领域。藏人可以自由的穿着、说、写和用“藏语”生活，但北京现在不愿实施（制度化）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改变，担心会强化西藏的特性，将西藏和中国的其他部分分隔更远。因而，中国不进行语言改革，将藏语作为政府机构的标准语言；同时，它推迟了一项计划，在中学用藏语教授自然科学课程，尽管近年一个为期六年的实验班发现，用藏语学习自然科学课程的学生比用汉语学习自然科学课程的成绩更好。1997年初，西藏教育政策出现了逆转的兆头，从扩大藏语在学校的使用，转向更早地引入汉语教学。^[33]同样，北京继续限制僧尼的人数，收紧重建寺庙的限制，并加强对现在寺庙的管理。

所以，北京1989年之后的政策基本上暗中重新定义了西藏的民族和文化自治。在很多领域，例如计划生育，西藏仍存在特殊的补贴和优惠待遇，但是基本政策已经发生了改变。过去认为，因其历史，西藏在中国有其特殊地位；现在则认为，西藏只不过是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少数民族而已。西藏被看作是一个民族区域，只要藏人愿意，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文化生活，传承；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承诺要保证西藏的人口构成、语言同质性永远不变。“民族敏感”的政策被不那么缓和的政策所代替，西藏现代化和建立新的“现代化”藏人优先。凡是强调西藏特性，将之和中国其他部分分隔开来的政策被否定（或者阻止），因为这和中国的国家利益相对立。所有这些，敲在西藏民族主义者的心头，他们认为西藏是他们的人民和文化的祖国——他们的国家。这些政策突出了他们涉及汉人利益的持续无力感，加强了很多藏人对汉人和中央政府的憎恨。如此，北京在西藏推行这一高风险的策略，非常可能招来相反的结果，加剧它力图克服的暴力、血腥和仇恨。

西藏的强硬政策将达赖喇嘛置之不理，强迫他亲眼目睹他视之为悲剧的一系列事件。在一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中，尽管有战争和征服，饥荒和自然灾害，西藏仍然是其人民独享的家园。现在西藏以及流亡藏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的逝去。达赖喇嘛继续赢得巨大的国际同情，对西藏的本地藏人态度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但是他无力停止中国的新政策；因为这一政策（最少在短期内）不依赖于当地藏人的批准，而国际社会也没能提供实质性的支持。

于是，北京重新占了上风。达赖喇嘛的国际运动的胜利看起来越来越象祝捷舞一样的胜利。他的国际建议在西方赢得了巨大的象征性胜利，但是这些不仅无法强迫中国达成他们的目标，反而在促成新的强硬政策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而这一新政策实质性地改变了西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达兰萨拉及其西方支持者威胁中国对西藏的政治统治，这正好给北京的西藏强硬派以口实，以此为借口，他们放弃了胡耀邦在八十年代早期倡导的民族敏感性的西藏政策。

未来 [\[回目录\]](#)

未来会怎样？在人类步入 21 世纪之时，这场冲突将会怎样结束？达赖喇嘛和中国是否能在某个共同基础之上达成和解？美国能够扮演何种角色？

中国 [\[回目录\]](#)

北京目前对和拉萨喇嘛开展新的讨论兴趣缺缺，因为北京相信他仍然不可能做出中国可能接受的妥协。1995 年，双方在选择班禅转世灵童的问题上发生争执；这显示双方妥协的巨大难度，以及为什么北京对达赖喇嘛有如此疑虑。

1989 年 1 月 28 日，十世班禅喇嘛在西藏逝世，中国政府同意选择新的班禅喇嘛。因为共产党是无神主义者，对他们而言谁被选为新的班禅喇嘛都没什么区别；但是因为此事和西藏有关，选择过程应按照西藏传统和规范，以确保新的转世灵童在西藏的宗教合法性。同时，考虑到政治需要，北京需要寻访过程必须明确反映中央政府在挑选转世灵童上的权威，而且下一任的班禅喇嘛必须在中国找到。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北京的策略是，由前任班禅喇嘛主寺（扎什伦布）的喇嘛和僧官们组建一个“传统的”藏人寻访队伍，授权他们按照古老的传统习惯（梦境、预兆、形迹和寻找）来确定一组转世灵童“候选人”。这一步骤完成后，再在中央政府的见证下，从“金瓶”中抽出一支匿名签，此签确定正式的转世灵童。^[1]这一金瓶拈签的习俗起自 1792 年清朝皇帝乾隆。

这一计划的问题在于，藏族规范要求，新的班禅喇嘛应被达赖喇嘛确认，而北京的计划中排除了达赖喇嘛的参与。毫不奇怪的是，达赖喇嘛反对金瓶拈签，更反对中国政府有任何权威来批准或废除西藏喇嘛的最终选择。^[2]对于北京而言，把达赖喇嘛排除在寻访过程之外固然简化了寻找新的班禅喇嘛的问题，

（同时强化了北京的政治主张），但是如此行为，达赖喇嘛将否定中国选择的班禅喇嘛的合法性，可能会自行在流亡藏人中选择一个不同的班禅喇嘛。因此，已故班禅喇嘛的官员力劝修改最初的方案，试图和达赖喇嘛在寻访上达成某种共识。

达赖喇嘛似乎也不想让选择下一任班禅喇嘛变成一场政治秀。1991年3月，他送了一封信给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说他愿意在寻访过程中提供帮助；从1990年到1993年，他的大哥嘉乐顿珠在不同场合劝说中国政府，让达赖喇嘛参与进来，让他派遣喇嘛到西藏帮助寻访。^[3]

北京没有同意；但是它默许寻访小组的负责人，扎什伦布寺的恰扎活佛和达赖喇嘛取得联系。1993年7月17日，恰扎活佛趁嘉乐顿珠访问北京之时，托他转送一封信给达赖喇嘛。^[4]这封信用了传统的西藏手卷格式，提及达赖喇嘛时使用了最尊贵的措词，信中向达赖喇嘛祈福，希望他帮助迅速选择班禅喇嘛；也就是说，请求达赖喇嘛在选择过程中的合作。^[5]此时中国的态度似乎是，如果达赖喇嘛愿意合作，当然最好不过了；但是如果达赖喇嘛不合作，中国也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

嘉乐顿珠把这封信带给了印度的达赖喇嘛，但是达赖喇嘛的回应很强硬，要求恰扎活佛到印度来当面求教。^[6]显然这也不算什么负面回应，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内部政治，这种访问是不可能的；至此，达赖喇嘛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毫无政治争议地选择下一任班禅喇嘛，他的态度显得有点暧昧。中国方面对此没有公开回应；而这给了中国的强硬派进一步的证据，试图和达赖喇嘛打交道是没有用处的。

从藏人的角度看，达赖喇嘛认可新的班禅喇嘛至关重要，因此恰扎活佛继续非正式地和达赖喇嘛通讯。到1994年底，寻访队伍汇编了“候选灵童”列表，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将从中选择；恰扎活佛给达赖喇嘛一封信，信中列出了25名候选灵童的详细资料（包括照片）。他还告知达赖喇嘛，种种迹象表明，其中一名男童——根敦确吉尼玛(Gendun Choekyi Nyima)——是真的转世。^[7]尽管印度的某些人催促，达赖喇嘛应下令流亡的扎什伦布僧人在西藏以外寻找下一任班禅喇嘛；1995年初，达赖喇嘛还是检查了这些资料，同意恰扎活佛的结论。2月初，达赖喇嘛给恰扎活佛回信，说他的占卜结果也确认了根敦确吉尼玛。

对于恰扎活佛及其官员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胜利；他们坚持扎什伦布寺应被允许按照西藏惯例，联系达赖喇嘛，寻访转世化身。现在看起来，如北京开始委托的那样，在中国境内找到一名班禅喇嘛，并被确认。剩下要做的是如何确

定最后的选择过程，宣布选择结果，让达赖喇嘛和北京都不失颜面。^[8]前任班禅喇嘛的选择（1941年至1949年寻访）似乎给这种妥协提供了一个先例。

二十世纪早期，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关系不好。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回到拉萨，向封建庄园主征收新税，九世班禅喇嘛拒绝了，声称他的土地使用权（由满族皇帝授予）条款排除了此等附加税种。^[9]十三世达赖喇嘛坚持班禅喇嘛必须缴纳，这使得九世班禅喇嘛和他的高官于1924年逃亡到中国。后来，班禅喇嘛于1937年在内地逝世。

依照藏族传统，去世的班禅喇嘛的官员（流亡在中国内地）开始寻找他的化身。1941年他们认定青海省的一名藏族男童，并确定他就是新一任班禅喇嘛。但是，达赖喇嘛拒绝接受青海男童，指示班禅喇嘛在中国的随从把男童送到拉萨进行最后检查，同时包括另外两名候选男童。去世的班禅喇嘛的官员反对该提议，坚持他们认定的就是真的转世灵童，西藏政府于是拒绝最后承认青海灵童为新的班禅喇嘛。

此时，在中国的班禅喇嘛的官员也从蒋介石政府处寻求对灵童选择的最终确认，中国一直声称，自清朝以来，中国政府对班禅和达赖喇嘛的选择有最终裁决权。^[10]经过深思熟虑，中国政府最后接受了去世的班禅官员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想劝说他们逃往台湾。1949年6月3日，国民党正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当时的中国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正式承认时已11岁的青海灵童为十世班禅^[11]——并于1949年8月10日，在青海塔尔寺举行了坐床仪式，中国政府蒙藏委员会主任（代表李宗仁）参加了仪式。当然，拉萨的西藏政府没有派遣官员参加，因为他们不承认这些活动的合法性。^[12]

尽管有了国民党政府的承认，班禅喇嘛还是决定把宝押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因为他们看起来更可能帮助他返回西藏。因此，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解放”青海省之后，班禅喇嘛的官员立即热诚地与他们取得联系；1949年10月1日——也就是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日子——班禅喇嘛给毛泽东发电报说：

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

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13]

第二年，毛泽东认可青海灵童为十世班禅喇嘛，同意一旦重新统一西藏就恢复他在西藏的地位。^[14]

但是，对于大多数藏人，这位班禅喇嘛的合法性还是个问题，因为达赖喇嘛还没有认可他是真正的转世灵童。等到 1951 年达赖喇嘛的代表团到达北京谈判 17 条协议时，中国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坚持西藏方面必须先承认青海灵童，才能开始会谈。西藏代表团没有宗教权威来做出这种决定，被迫发电报给达赖喇嘛，请求指示。达赖喇嘛很快举行占卜仪式，确认青海灵童为真正的十世班禅喇嘛，此事就此了结，直到 1989 年班禅喇嘛去世。

因此，尽管在确认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存在着竞争，在最近的先例中，扎什伦布的僧官独立确定候选人，中国政府认可灵童，而无需进行金瓶掣签仪式，然后达赖喇嘛承认这个选择。然而，尽管有此先例，新的班禅喇嘛的确认还是以一场政治崩盘而告终。

由于恰扎已经获得了达赖喇嘛对根敦确吉尼玛的确认，接下来绝对必要的是，他要获得北京给该灵童的认可。他的计划显然是，北京先正式承认该灵童，然后达赖喇嘛指出他也认为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换句话说，一切依照上次的先例。中国媒体报道，1995 年 2 月 11 日，恰扎活佛试图劝说中央政府免除金瓶掣签，向他们保证，根据藏族传统，他在扎什伦布前任班禅喇嘛灵塔（宗教坟墓）前进行了抽签，结果确定根敦确吉尼玛是无可争议的真正的转世化身。^[15]显然他的努力没有成功，来自中国的消息来源显示，1995 年 3 月，政府要求恰扎提交三到五名候选人姓名，以供金瓶掣签之用。^[16]四月中旬，报告显示中国的汉藏官员准备集合，参加坐床典礼，尽管此时一切都未公开发布。就在这个时刻，1995 年 5 月 14 日，达赖喇嘛突然向世界宣布，他已认定根敦确吉尼玛是新的班禅喇嘛。他的声明宣称中国政府在选择上没有任何权威，他说，“寻访和确认班禅活佛的转世化身是宗教事务，而不是政治事务。”^[17]

这一宣告当然激怒了中国政府，并使之感到尴尬。北京试图通过恰扎活佛和扎什伦布寺，按照“藏族”的惯例来进行此事，甚至寻求达赖喇嘛的帮助；但是现在，被羞辱地扔到一边，好像与整个决定过程毫无关系。达赖喇嘛向全世界

展示，即使他身在流亡，他仍然能够决定转世寻访的最后结果，尽管此次寻访由中国政府主办在西藏进行。

然而，我们还不清楚，达赖喇嘛为什么这样做；双方也没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公开版本声称，恰扎非法地将国家机密（未说明）泄露给达赖喇嘛——恰扎于 1997 年 5 月因分裂国家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 6 年有期徒刑。^[18]然而，他与达赖喇嘛的联系真的未经批准吗？

显然，恰扎是在被批准的情况下在北京和嘉乐顿珠相会，并通过他送信给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回信，前面已经提到，是通过“官方”手段，由新德里中国大使馆转交的。此外，恰扎活佛是一名拥护政府的爱国喇嘛，其政治生涯基于反分裂、支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在政府圈子里面很有名，深得西藏自治区政府（西藏自治区政府受北京之令负责寻访过程）的信任。因此，在如此明显的国家重要事务上，他不象是在自做主张秘密和达赖喇嘛接触。另一方面，事情有可能是这样，北京的高官大体上知道这些接触，但是不了解细节，特别是，恰扎把所有候选灵童信息都送给了达赖喇嘛。

无论上面那种情形是对的，看起来当恰扎试图劝说中央政府放弃金瓶掣签时，在是否放弃金瓶掣签问题上形成了僵局，这一僵局无意间让达赖喇嘛有机会在北京之前宣布他已经确认了转世灵童；如果是这样的话，又该怎么办呢？当北京正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恰扎——这次的确没有通知政府的任何人——显然联系达赖喇嘛，告诉他有关此一僵局的^[19]消息。达兰萨拉就此消息进行了讨论，其结果就是达赖喇嘛先发制人的宣告。

我们希望此事件的全部细节能在近年透露出来，但是目前，重要的是此事对西藏问题的影响。无论在中国和印度发生了什么，达赖喇嘛决定先发制人地宣布下任班禅喇嘛，这一决定至少可以说是政治上不够敏锐。即使北京最后选择了另外一个灵童，达赖喇嘛仍然能够否决北京的选择，说出自己的。相反，如果北京最终决定选择正确的灵童，达赖喇嘛也可以盖上关键的印章，确认选中了正确的班禅喇嘛。双方都可以向其追随者和全世界解释事件的“真实”含义，同时（这样做），达赖喇嘛给了北京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他真心诚意地愿意和北京合作，减少冲突，解决问题。

显然，达赖喇嘛清楚地知道他的先发制人的宣布会激怒中国政府，我们必须假设他的真实意图是，无论政治上会有什么后果，他要向北京和全世界显示他在这一事件上极为重要的角色；再或者，他相信他必须采取此单边行动，以推动中国选择正确的灵童，这一行为背后的逻辑是中国不会否决他的选择，因为这也是恰扎活佛（以及扎什伦布寺自己的寻访小组）的选择。

无论达赖喇嘛的动机如何，从中国观点看来，他的这一宣布是一个敌对的政治行为，旨在让中国难堪；同时再次说明达赖喇嘛无情地追求在西方世界的名望，而不顾中国付出的代价。中国认为，达赖喇嘛再次在关键时刻藐视北京，并送出了一个清楚的信号，在决定到底干不干时，他还是选择不干！

当然，达赖喇嘛的宣布置北京于困境。整个过程的基本先决条件是要确认中国中央政府在选择转世灵童上的权威，北京不得不决定是否挑战达赖喇嘛（当然，也是它自己的寻访小组）的选择。如果它同意达赖喇嘛的选择，可能会给人印象，它只不过是遵从达赖喇嘛的更高的权威。但是，如果它不同意，并选择了另外的灵童，那么很多（即使不是大多数）藏人会拒绝接受这位班禅喇嘛是真正合法的。

北京花了5个月来决定这个事情，但是最后它取消了根敦确吉尼玛的候选灵童资格，用金瓶掣签选择了另一名男童；中国政府于1995年11月正式确认其为下一任班禅喇嘛。达赖喇嘛及其支持者叫嚣着攻击这个决定，认为这个男童是个假的转世化身，控告北京令人生厌地侵犯了西藏的宗教自由和达赖喇嘛的历史特权。在这个问题上，北京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且现在仍然是。现在，就有了一位大多数藏人不愿意接受的重要转世喇嘛；和另一位根敦确吉尼玛，后者一定是被严密监视，以防他突然被带走逃亡——而这将会令目前的灾难极大地复杂化。

许多流亡藏人或西方人士都把这看做是达赖喇嘛的一次胜利，很难理解他们的逻辑。确实，这事让藏人和他们的西方支持者们感觉良好，因为他们看见达赖喇嘛在这件事情上发挥了他的权威，但是他付出的代价太高而得到太少。从实际情况看，即使他选择的班禅喇嘛跟着他流亡，受他监护也不安全，因此他实际上把他选择的灵童推入终身软禁的境地。这为流亡藏人创造了一个强有力的人权议题；但是其代价是，正在他受到不断增长的压力，要劝说中国放松对西

藏的政策之时，这件事却增强了许多中国人士对他的不信任和憎恶之感。除此之外，更多的鸽派中国官员此时正试图游说国家代表大会，一个注重民族敏感性的寻访过程最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达赖喇嘛的宣告极大地破坏了这些官员的可信度。于是，他的行为再次强化了鹰派的观点，中国不能信任达赖喇嘛，也无法和他合作；此事同时也降低了中国可能和他重续谈判的可能性。而且此事的“奖品”——新的班禅喇嘛——则落入中国的控制之中。如果达赖喇嘛真的想在政治上玩硬的，他理应在流亡社区中选择一名班禅喇嘛，并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教育和培植他。

但是这就是西藏问题的本质。即使双方都有共同利益要防止一场灾难，感情和“脸面”问题——政治骄傲——轻松让他们出轨，失去理性。理性上，达赖喇嘛知道他需要在北京有更多的朋友和支持者，而不是华盛顿或者纽约，但是从感情上，他很难采取适当的措施达到这一目的。

紧随着挑选班禅喇嘛的这次灾难，北京加强了对达赖喇嘛的宣传攻势，使用更粗暴和侮辱的词句。这一反达赖喇嘛运动持续到现在，许多中国人士相信，等待 62 岁的达赖喇嘛逝世，是对他们的“西藏”问题的最简单的答案。同时，中国政府全力加快发展和西藏现代化政策。它希望无论达赖喇嘛和藏人怎么想，怎么做，这一政策能够巩固其在西藏的地位，最终创造出新一代藏人，而这一代藏人认为最合乎自身利益的就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即使没有成功，这一政策也会从根本上改变西藏的人口构成和经济特性，因此，即使不能赢得西藏的下一代也不会减弱北京对西藏的控制。

因此，对于中国方面而言，认真的加入寻求一个谈判解决方案并没有多大好处，就更不用说做出很大的让步了。北京进行着其同化政策，它对达赖喇嘛的信任达到了最低点；因为缺少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外部有效制裁，北京肆无忌惮地追寻着自己的目标。

另一方面，邓小平于 1997 年 2 月去世，这给达赖喇嘛一个微小的新机会。很明显，中国的许多专家和鸽派并不同意当前强硬路线背后的假设，质疑这种政策是否能维持中国所希望的长期的西藏稳定。他们认为，此一政策更加恶化了藏人的被疏离感，特别是年轻藏人，强化了他们的民族仇恨和政治失望，让他们觉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藏族人就不能有民族热情。由于潜在的

民族情感，因此，为了中国的长期利益，还是应该回到更多考虑西藏民族性的西藏政策。如果北京的领导层稳定下来，而达赖喇嘛能发出合适的信号，它可能会对重新谈判感兴趣。对于任何中国领导人而言，解决西藏问题不言而喻代表着一个历史性胜利。对于一个这样的突破而言，什么时候都不算晚，但是达赖喇嘛必须走出第一步。目前西藏仍是强硬派当权，如果不能给北京和拉萨的鸽派人士一些新的推力，这将不会改变。这种推力只能由达赖喇嘛提供。

达赖喇嘛和达兰萨拉 [\[回目录\]](#)

流亡社区的局势不赞成达赖喇嘛做出某种大的妥协，以解决当前的僵局。自然，他和其高官拼命地希望能够停止非藏人进入西藏的人口迁移，他们相信，如果西藏被非藏人淹没，即使是“流动”人口，藏族的文化、宗教和语言不可能繁荣。他们抱着深刻的民族主义信念，无论西藏独立或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藏人家园应该受到保护；于是，他们鼓励西方支持者敦促北京重新和他们进行谈判，并寻求其他国家为他们的利益进行调解。达赖喇嘛自己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最近他写信给党总书记江泽民，指出他愿意对中国进行一次宗教访问——明确是一次对佛教圣地，山西省五台山的“非政治性”朝拜。另外，在邓小平去世（1997年2月）时写给江泽民的悼念信中，达赖喇嘛写道，

我很遗憾，在邓先生的有生之年，我们没有展开关于西藏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但是，我坚定的相信，邓先生的去世给藏人和汉人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挑战。我非常希望，在您的领导下，中国政府能够发扬智慧，以和解和妥协的精神，通过谈判解决西藏问题。至于我自己，我仍然坚定地相信，我们之间的问题，只能在真诚和开放的气氛中，通过谈判解决。^[20]

此外，在达赖喇嘛 1997 年访问台湾时，他一反常态地指出，他愿意接受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我[建议]访问台湾，明显证明我已经放弃了西藏独立的观点”，在联合报的访谈中，达赖喇嘛如是说……

“因为台湾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对台湾的访问显示我同意此一观点。我不寻求西藏独立。这一观点非常清楚”，达赖喇嘛在他印度的办公室告诉报界。^[21]

中国还没有同意达赖喇嘛的访问，即使是一次伪装成宗教朝拜的访问。自 1989 年北京自己邀请达赖喇嘛进行一次宗教性访问以来，已经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中国领导人认为，因为达赖喇嘛继续坚持与斯特拉斯堡建议类似的西藏政治自治，因此新一轮谈判也不会有什么成果。例如，在最近访台时，路透社报道，“达赖喇嘛说，尽管有些藏人反对，他倾向于“一国两制”方案，北京年内将在香港首先实施，并希望扩展到台湾；按此方案，他的祖国将在中国主权下获得广泛自治。‘我非常相信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精神’，这位 61 岁的僧人告诉新闻简报，并重申他只寻求西藏自治，而不是独立。”^[22]

因而，目前达赖喇嘛（和其领导人）面临的问题和他们第一个代表团访问北京时面对的类似——他们愿意接受的比独立少多少？政治自治是底线吗，是否能接受更多让步？时间在达赖喇嘛一边吗，还是时间正在流逝？如果时间正在流逝，应该今年做出让步呢，还是明年可能更好？这一本质上的僵局和八十年代早期一样——中国似乎绝对不愿意给西藏另一套政治制度——自治——的权力，而达赖喇嘛也不愿意接受比自治还少。如果说有什么新东西，那就是北京当前的强硬政策，这一政策给达赖喇嘛和其领导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么快速解决斗争，要么发展出有效的对抗手段，制止中国改变西藏的民族和经济特征。

达赖喇嘛有几个选择。他可以继续他目前的国际游说运动，通过攻击北京的人权记录，尽力将中国放在世界赛场的防守位置，同时努力为他的事业在华盛顿和欧洲寻求更多支持。达赖喇嘛及其支持者对此已是轻车熟路了。可是，现实情况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已经清楚地显示出，他们不愿在总体的人权问题或者特别的西藏人权问题上疏离中国。于是，就象失败的球队队员在头盔上得到一颗星，奖励打球打得好一样，这些国际上的成功让每个人都感觉良好，却改变不了比赛的结局。而且，从某种程度上，他们和中国对抗，鼓励流亡领导人的强硬态度，可能会使已经危险的局面进一步恶化。

继续当前政策隐含的意义是希望——流亡藏人希望历史进程会提供他们想要的胜利，共产党中国会象 1911 年的清朝和 1991 年的苏联那样迅速解体，而给他们带来机会，重新获得对西藏的控制。西藏谚语“藏人总是充满希望，汉人总是疑神疑鬼”在当前达兰萨拉的政治圈有着特殊的回应。对于达赖喇嘛，目前的

方针主要是等待——在等待历史来以一种满意的方式解决这个两难问题的同时，达赖喇嘛则力图保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西藏问题。这是达兰萨拉和达赖喇嘛的安全选择。

但是，这种不作为的选择有一个明显的缺点。西藏正在以一种流亡领袖们痛恨的方式转变着；目前的转变进程持续时间越长，这一转变将来就越难以逆转。时间看起来不在达赖喇嘛这一边。此外，邓小平 1997 年的逝世给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邓小平反对胡耀邦的政策，支持强硬派，因此，达兰萨拉看来，他的死意味着在北京可能的妥协之路上，少了一个重要的障碍。因此，达兰萨拉受到更大的压力，劝说北京和达赖喇嘛达成协议。他们有两个可能的方向：一个方向是实质性的妥协——达赖喇嘛可以送给北京清晰而且重要的信号，他愿意进行实质性谈判，也就是说，接受比真正的政治自治要少的东西。这和尼克松总统和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当年所做的类似：为了达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单方面解除对中国的贸易禁令，将第七舰队移出台湾海峡，开始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使用“红色中国”或者“中共”这样的贬义词，以此向中国表示华盛顿的诚挚愿望。但是，走这一步，对于达赖喇嘛而言有着极大的困难，因为这有可能破坏流亡社区的脆弱的团结。^[23]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把西藏 4 百万藏人的利益置于 13 万流亡藏人之上，同时也要求达赖喇嘛避免头盔上那些华而不实的“星星”。除非他强烈相信他的妥协建议能够成功，这样做对于他来说非常困难。

另一个可选的方向是扩大——鼓励（或者组织）在西藏的暴力反抗行动，以此给中国施加压力，做出让步。整个 80 年代，双方都调整了策略，来对付对方的建议；此种模式的恐怖主义暴力活动可以阻止中国寻求正常的商业目标。这一策略并不寻求把中国人赶出西藏，而是劝说北京，如果它不对达赖喇嘛采取更缓和的路线，藏人会在西藏和中国其他地方制造混乱。这种策略极有可能以西藏之外某地为基地，由小组受训过的军事人员实施，但是它将扩展到整个西藏。

如果这一暴力策略成功，它会使中国在当前危险的领导人权力交接时期变得更不稳定。即使只能部分成功，它也会缩小西藏的旅游业，阻止海外投资增长，威胁西藏的所有非藏人的安全，并唤起国际社会对这一严肃问题的认识。这一

策略将从根本上显示，藏人的民族情绪没有打折；它会告诉中国，强硬政策是无效的。如果策略有效执行，中国几乎无法阻止这种恐怖袭击，除非它再次在西藏实施戒严；即使如此，藏人军事分子仍可以将他们的注意力移向四川、青海和北京与西藏有关的目标。如果不改变目前对旅游者和商务人士的开放政策，北京无法阻止爆炸物进入中国东部发达城市。

然而，如同妥协方案一样，因为达赖喇嘛强烈的非暴力主张，这一诉诸武力的措施对他而言极其困难；但是他也很难阻挡这一方向。^[24]在西藏的特征如此明显地被改变之时，他无法劝说中国采取缓和政策；这一事实使得越来越多的武装藏人认为他的温和抵抗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而转向更暴力的手段。其症结在于，藏人不可能无限期在站在一边，目睹北京肆意改变他们的家园而不受到任何惩罚。对现实的绝望、愤怒和民族感情酿成的烈酒已经令海内外藏人沉醉，他们开始有了暴力抗暴的想法——他们认为这是“良心之战”，西藏版的起义(intifada，阿拉伯语，专指巴基斯坦人在被占领土上的起义——译注)。

尽管这样，流亡藏人似乎在寻求外部资助，来组织和发起这种活动。因而，真正的问题不是他们是否会这样做，而是他们决定什么时候不再等待开始行动。1996年，拉萨发生了三起爆炸事件，最后一一起大爆炸炸坏了一栋政府大楼和临近的旅馆，800米以外的房子都震动了。^[25]尽管这些袭击的目标是建筑而不是无辜平民，考虑到目前藏人的沮丧和愤怒情绪，以及他们的策略需要对北京产生强有力的推动力，西藏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卷入到如同中东和北爱一样的种族暴力活动之中，这并非无稽之谈。

因此，经过漫长的历史，西藏问题当前似乎到达了一个关键点。双方看起来都无法冒着必要的风险，达成解决冲突的妥协方案；而倾向于继续发展对抗性策略，阻击对方，为己方积聚力量。然而，随着流亡藏人越来越无力改变西藏的局势，他们的受挫感增加，严酷的暴力活动的危险也指数倍地增加，无论有无达赖喇嘛的同意。

美国和西藏问题 [\[回目录\]](#)

本书不适合详细讨论近五十年来藏美关系的发展和变化；^[26]我反复强调，自尼克松和基辛格在 1969~1971 年和中国进行和解之后，美国对西藏的支持大幅减少。^[27]此后十年间，西藏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上的隐学。直到 1979 年达赖喇嘛甚至不允许访问美国。然而，80 年代发生的事件再次将西藏问题带到前线。达赖喇嘛的国际活动在国会、人权界和市民游说团体中赢得了强烈的同情和对西藏的支持，如此他能够将西藏议题从乏人问津的专业“外交”领域带到美国国内政治的核心舞台。^[28]国会率先出击，启动了一系列支持达赖喇嘛的措施，例如，上一章提到的 1987 年通过的支持西藏的议案，1987 年邀请（达赖喇嘛）在国会人权小组上发言，（1990 年开始）在美国之音设立藏语广播，为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设立富尔布赖特学者计划，立法要求国务院在“国别人权报告”中和中国分开，为西藏另立一章，立法要求国务院发布“关于美国国会承认的真实藏人代表的关系；达赖喇嘛，他的代表和西藏流亡政府，以及关于西藏情况”的报告（原文斜体）。^[29]国会还建立了自由亚洲电台（包括藏语广播节目），1996 年在国务院授权法案附加案中号召设立一名大使级的“西藏特使”。这位特使的职责是，鼓励中国和达赖喇嘛代表进行谈判，协调行政机构对国会西藏相关议案的反应，访问西藏和流亡中的藏人营地，促进藏人流亡政府和美国政府的关系。^[30]尽管因为克林顿总统否决了整个国务院拨款法案，最后一项没有成功；设立“特使”的想法将再次提起，因为国会的亲西藏游说团力图劝说美国官方的政策，使之更倾向于接受西藏为与中国分离的实体。

在美国，达赖喇嘛和他的事业的声望，以及对他的支持，也经历了爆炸似的大发展，赢得广泛关注：包括在全美（以及在很多西方国家）成立西藏游说团体，人权组织对西藏的公民自由关注增加，有很多娱乐界明星也加入进来，例如哈利森·福特(Harrison Ford)，里查·基尔(Richard Gere)，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和已故的阿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某种意义上说，达赖喇嘛自己也成为一个流行文化的偶像。

这种对西藏的广泛兴趣和国会的注意，使得近几届政府给予达赖喇嘛和西藏更多关注。例如，布什总统（老布什——译注），不仅私下接见达赖喇嘛，^[31]还

于 1991 年签署国务院授权法案，法案中包含一些关于西藏的非常强烈（尽管没有约束性）的语句，如下：

国会认为：

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西藏，包括被划入中国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省的那些藏区，是一个**被侵占的国家**。

西藏的真实代表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他们被藏族人民所承认。[原文着重号]^[32]

1993 年比尔·克林顿的就职典礼上，总统（对西藏问题的关注）进一步提升。作为新的中国政策的一部分，新政府在对华外交中更重视人权和民主问题，克林顿公开批评中国在西藏的所作所为。例如，1993 年 5 月 28 日，他宣布，如果中国不能在一系列人权问题上取得进展，国务卿将不会在 1994 年为中国申请最惠国(MFN)待遇，他包括了“保护西藏独一无二的宗教和文化遗产”。六个月后，当克林顿总统和中国党总书记江泽民在西雅图会见时，他当面敦促江改善西藏的文化宗教自由状况，和达赖喇嘛展开谈判。^[33]这是美国首次愿意使用其影响力试图推动中国对藏政策的变化（尽管它在西藏主权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因此，1993 年被很多藏人和其支持者看作是美国转变藏美关系的一年——如果部分因为中国的对藏政策而否决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流亡藏人将获得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孜孜以求的那种推动力。

但是，众所周知，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美国的对华政策在 1994 年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克林顿总统宣布他不会用经济制裁来诱导中国的政治变化，更不用说西藏了。^[34]人权不再和最惠国待遇挂钩，流亡藏人被打回原点。这是一次痛苦的失望。

脱钩后三年，克林顿政府将地缘政治和经济目标置于人权和政治自由之上。政府在和中国打交道时，低调处理西藏问题；尽管涉及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人主张，帮助西藏是一个原则问题和良心问题——西藏是一个重要的测试，美国是否愿意领导创建一个新的，更民主的后冷战世界。但是，政府和国务院的主流观点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西藏对美国并无战略意义，美国应避免西藏问题伤害到中美关系。从战略上来说，中国太重要了。克林顿政府用“全面接触”来描述其策略，他们认为，与中国打交道的最好方法是从正面来进行接

触，而不是以缺少人权和民主为由来攻击或者孤立中国。1994年国务院为国会准备的西藏报告传达了这种接触理论：“美国促进中国当局尊重人权的能力，取决于我们和中国的双边关系的强度。如果中美关系严重恶化，则美国绝对没有办法来促使中国的藏族人权得到更大的尊重。”^[35]克林顿政府全面接触策略的中心是，让中国相信，美国无意挑战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94年的报告用一种非常粗暴，反达兰萨拉的语句表述了美国在西藏政治地位方面的立场，以此来安抚中国。

在历史上，美国一直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至少自1966年始，美国的政策是公开承认西藏自治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一长期政策和整个国际社会的观点是一致的，包括中国所有的邻国：没有国家认为西藏是一个主权国家。因为我们不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美国和自称“西藏流亡政府”没有外交关系。[原文着重号]^[36]

尽管如此，因为强大的中国和西藏游说团体的影响，克林顿政府发现它不可能完全忽略人权议题，它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走钢丝：一方面大声讨论中国的宗教和公民自由（包括西藏），另一方面避免严重损坏中美关系。总的说来，它力图通过一些同情和关注的姿态来平时国内批评，并希望将对中美关系的损害降至最小——包括，达赖喇嘛在华盛顿和国务卿、副总统等高官会面（以及总统“路过加入”并留影作政治秀），不挑战“国会思维”的煽动性语句，偶尔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和西藏和平解决争端。克林顿政府也被迫继续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但不进行制裁。例如，今年，美国再次（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共同提出一项联合国提案，谴责中国的人权记录。提案草案包括了有关西藏的语句，其中一条关注“对藏人文化、宗教和其他自由越来越多的限制，包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的案子”，其他条款要求中国政府“保护藏人独一无二的文化、民族、语言和宗教特性。”^[37]但是，如同以往的提案一样，中国不费吹灰之力就阻止了该动议，提案甚至没能进入正式讨论。西方民主国家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和中国对抗缺乏共识：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拒绝联署丹麦的联合国提案，^[38]美国对此的支持也称不上积极。

因此，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十年来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作为，很清楚美国的行动无助于解决争端，甚至也没有缓和中国的西藏政策。他们帮助达赖喇嘛在西方

的声望如日中天，让海内外的藏人感觉良好，但是（从达赖喇嘛的观点看）却没能阻止西藏局势继续恶化。崇高的说教和同情的姿态混杂在一起，没能给中国施加任何实质性的压力；即使说的是事实，那也不是它想要的。此外，美国的介入不仅仅是简单的无害——它还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美国的行动使得很多藏人相信，它支持达赖喇嘛在西藏实现民主的愿望，鼓励他们继续反对中国。我生动地记得，当我在拉萨近郊的哲蚌寺做研究的时候，一个 21 岁的僧人跑过来，小声问我，美国什么时候把中国赶出西藏，帮助达赖喇嘛回来。我试图向他解释，中国是个强大的国家，美国不会做什么具体的事情，他听不进去，用力地说，“不，不，我知道美国比中国强大得多，美国会帮助我们。”

因此，很多北京人士认为，美国在“鼓动”藏人，威胁中国在西藏的战略利益，试图把这一战略边境地区搞得动荡不安（就像中情局五六十年代做的那样），这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这一看法，阻止了更和缓的中国人士倡导的民族敏感性政策；共产党内批评这种政策，认为它只会在西藏引发骚乱和仇恨，而不是更友好和接受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因此，美国的政策不经意地强化了中国的极端强硬派的立场；而他们的政策，正是达赖喇嘛想改变的。于是，很难不做出这种结论：美国对西藏和达赖喇嘛的支持本质上起了反作用，是西方“坏朋友”症状的最新例子。美国政府和国会表达同情但是无害的支持姿态，同时很小心的避免使用他们的力量促使中国按照达赖喇嘛愿意接受的条款妥协；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促成的条件，使得北京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在西藏实施强硬政策。

只要中藏关系不演化成为严重的暴力冲突，克林顿政府采取现实政治的态度，不愿过多介入西藏问题。但是，如上文指出，反中国的暴力活动似乎越来越成为可能。这种不断升高的局势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西藏真的爆发严重的暴力恐怖活动，中国军队将不可避免地重拳出击，藏人的“为自由之战”将在美国赢得支持，而这会给美国国内政治圈施加强大的压力。北京自然而然地会将这种支持视作对中国核心战略利益的严重支持，如此将严重破坏已经非常脆弱的中美关系，使美国的整个亚洲政策复杂化。

西藏的严重暴力活动也会影响到中国自己的内部稳定。它将引发一系列事件，使中国在其非常重要的时刻不稳定，或者将领导人的交接进程，推向反美强硬

派一边。北京最恶劣的情况之一是，西藏的严重骚乱会扩展到新疆、内蒙古等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更糟的是，和他们相互配合。流亡藏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们一直希望看到中国象苏联那样解体，如果在中国领导人交接中出现任何经济或者政治不稳的信号，他们会敏捷地介入进来，力图恶化或者加速这种不稳定。所有的藏人领袖都记得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先例，1912年他从印度发动军事行动，一年内赶走了满汉官员和军队。美国的对藏政策就此出现了裂缝，因为它既不施压要求和平解决争端，也不制止流亡（和国内的）藏人采用暴力策略。

当然，我们可以讨论，藏人可能无力组织并支撑对中国的恐怖袭击——或者无意为此——但是，如果美国允许局面恶化到这种地步，再来见招拆招，那可能是太短视了。目前的美国政策就是允许这种危险的局势自行发展，而其结果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至少，这种暴力转向会对中美关系发生负面影响；最坏可能下，它会加剧中国的分离势力，在这个关键的亚洲国家引发政治动荡。

那么，是否有某种妥协的解决方案，可以满足冲突各方的需要呢？如果有，它需要哪些条件呢？

为了达到成功，一个妥协方案必须满足中国的战略和声望需要，同时保护藏族土地，以及藏民族语言、文化和人口构成。藏人本质上需要一个政治和民族制度都合适的民族解决方案。根据这种看法，西藏应主要由藏人组成，被藏人统治，使用藏语，并允许西藏文化和宗教的自由表达。对于达兰萨拉而言，最好的情况是独立或者完全的政治自治（类似斯特拉斯堡建议或者在香港应用的“一国两制”方案）。但是，如我们所知，这些选择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也不代表解决问题的具有现实性的共识。如果胡耀邦不能接受这种类似联邦制的西藏方案，期望邓小平的继任者也不现实。达赖喇嘛必须降低其底线，以达成某种妥协方案。

整个世纪以来，西藏努力寻求一个和它强大邻居相邻的可以接受的政治生态，这一努力没有凑效；而目前双方的财力和势力的巨大差别，使得西藏一方的形势比以前更弱。^[39]藏人也许觉得，仅仅因为他们的对手力量强大，就希望他们在原则上做出妥协，这样太不公平；很难不对这种观点表示同情。但是，历史

给他们一手差牌，西藏发生的事情显示，西藏的局势正在发生飞快的变化。如果他们现在无所作为，只是得到越来越多的象征性的胜利——在他们已经缀满星星的头盔上再加上更多闪烁的星星——如果几十年后，达赖喇嘛过世（他现在已经 62 了），独一无二的藏族家园可能已不复存在。

因此，达成妥协方案的关键问题是，是否可能在北京愿意接受的框架内——即不改变目前的共产党政治制度——创建真正的“民族”西藏？我认为答案是“可能”，如果双方将过去的仇恨和不信任放在一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做出让步。

中国一方，也必须做出重大的让步，将西藏恢复为人口构成和语言上的同质地区。这于北京来说是一个冒险的一步，但是这在其内部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西藏是通过一个独特的书面协约，十七条协议，和中国统一的。

在政治方面，“新的”西藏自治区将保持当前的政治制度，但是北京将逐步任命藏人为党和政府官员，包括党委书记。到十年过渡期结束，藏族官员占的百分比将大幅提高，从目前的 60~70% 到 85~90% 之高。

在文化方面，将采取一些措施，提高藏文化的优势。其中最关键的是逐渐将藏语作为政府的基本工作语言。尽管西藏公共机构和高级官员同时必须会中文，教育系统也将继续教授汉藏双语，但恢复藏语作为西藏政府官方语言，这一举措会使得藏文化发展和现代化到目前不可能的程度。在班禅喇嘛和阿沛阿旺晋美的敦促下，这一改革的详细计划已在 1987~1988 年间制定，随时可以启动。其他的文化措施包括，消除对寺庙僧人数目的限制，以及允许国外的喇嘛回国讲经；这些措施可以由双方制定，并逐渐实施。

在关键的人口构成和经济领域，北京必须采取措施，大幅减少生活在西藏的非藏人数量，减少（来自其他省份的）外部经济竞争，以使得藏人成为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北京将继续其重点发展经济的做法，因为藏人也需经济，但需要稍稍放慢速度，因为首要的考虑是藏人的直接经济福利。因为西藏绝大多数非藏人不是合法居民（殖民者），北京无需负责他们的再安置和再就业，可以送他们回家，尽管这是个敏感的问题。一个合理的目标是，

逐步回到 1959 年藏人起义时的人口构成情况，那时从人口特征上看，西藏城市乡村绝大部分是藏人。

这一进程的结果将是，西藏的主流文化、语言和人口构成是藏族。它将继续其现代化进程，由藏人主导，尽管是“共产党”藏人。这一西藏可能还需要西藏绝大多数藏人的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外部支持不会降临）。如果中国将来沿着台湾的路径，发展出更民主的制度，例如多党制，西藏的政治领袖也相应地扩大他们的统治基础。这一妥协方案的前提是，将西藏转变为现代社会，同时完美地保留它丰富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促进这一发展符合双方利益。西藏意义上的政治自由是第二位的，让步于保护民族、人口构成和文化同一性。

这一方案的最大障碍是流亡人士要求的大西藏。安多和康区，无疑在社会生态、文化和宗教方面和政治西藏类似，但是历史差异和目前的政治现实使得创造一个大西藏极不可能，最少目前不可能。对这一僵局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北京在西藏自治区和民族西藏地区同时实施改革，双方同意暂不讨论统一问题，直到新的进程已实施 5 或 10 年，双方已建立新的信任和尊重关系。

北京目前认为，有理由相信，考虑藏人反中国、拥独立的强烈感情，以及达赖喇嘛的可疑态度，即使这样一个“文化—民族”方案也会给其在西藏的地位带来潜在威胁。因此，要得到中国的良好响应，这一妥协方案应包含一些因素：清晰地强化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加强其长期的政治控制。

只有达赖喇嘛能为北京提供这些，因此他而不是流亡政府，才是这一妥协中的关键因素。北京实际上一直拒绝承认达兰萨拉流亡政府，坚持只和达赖喇嘛讨论他回归的问题。要想赢得上面提到的这些让步，达赖喇嘛需要同意做些事情。首先，他必须返回中国/西藏，并公开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其次，他必须积极工作，创造藏人和非藏人之间和谐合作的关系，劝说拉萨的藏人，停止骚乱，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不寻求藏人的真正的独立西藏。他必须利用他无比的声望和魅力来改变西藏藏人的态度，支持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他在西藏的精神高度是无与伦比的，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做到；再加上中国支持他的努力，积极完成上面建议的那些改变。^[40]一旦启动，这一进程将会实施十年以上，甚至即使大多数流亡藏人选择继续呆在海外。对于中国而言，这一解决方案将合上西藏问题这一页，因为如果达赖喇嘛接受这一方案，西藏对藏独的主

要支持也会停止。对于达赖喇嘛，那意味着为其人民保留一个真正的，单一民族的家园。

但是，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助，这种妥协是不可能发生的。流亡社区对这样一种文化妥协还缺乏共识，更不用说除开民族西藏地区，因此，达赖喇嘛很可能需要独立寻求这一行动——而得不到他的流亡政府的一致支持。他必须单方面送给北京明白无误的信号，他最后愿意和他们（在文化方面）进行合作，解决西藏问题。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和过去一样，他的倾向会是抵制这一决定。得出这一协议的关键在于，在中国领导人和达赖喇嘛之间发展出信任和尊重的新型关系。但是，如同在选择新的班禅喇嘛问题上的崩盘一样，回到旧的对抗模式比创建新的和谐关系要容易得多。

因此，如果中国和达赖喇嘛继续各行其是，按照上面这些条款的谈判解决冲突的方案在目前还不太可能。参与的双方信任太少，有太多理由不去冒这个险。因此，如果想有所进步，某种“催化剂”必不可少；在此美国可以扮演一个建设性角色，或者通过地下外交直接进行，或者通过挪威（或蒙古）等第三国。目前还不能公开的判断出这种美国参与将如何发生，但是可以断言，鉴于目前中国对藏人的低信任度，达赖喇嘛需要强大的鼓励，来送出一个大胆的信号，抓住北京的注意力。特别是，他需要保证，如果他返回中国而中国违约，美国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保护他。另一方面，美国也需要私下向北京保证，它将大声声张地支持新的安排，而不论国会和西方的顽固分子如何批评。

朝这个方向前进会使美国政府冒着一些危险，因为中国对外部干涉其内部事务极为敏感；而国会可能会批评政府把达赖喇嘛出卖给了共产党；但是如果小心翼翼地行动，而且和达赖喇嘛达成了协议，就可以把危险降到最低。不管怎么样，美国国家利益的潜在收益都要比政治冒险要大得多。它不仅消除了西藏问题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同时它也和美国的人道原则一致，帮助藏人保护西藏为他们真正的文化和民族家园。它从而也使美国成为治好“坏朋友”综合症的第一个重要西方民主国家。

西藏问题目前到达了一个危险的转折点。中国正在寻求的政策在达赖喇嘛看来正在改变西藏，也许是不可逆转地改变，而这种局势随着时间推移将会恶化。尽管北京的主流意见是，这一政策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期利益服务，但是

对很多中国人士而言，这一政策在藏人中制造愤怒、憎恨、示威和暴力，这无法保证中国想要的长期安全和善意。如果汉藏两族想要达成一个安全的，有意义的和睦局面，最少最少，需要考虑藏人深刻的民族情感。邓小平的逝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做出新的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达赖喇嘛是这一妥协方案的中心。他已经 62 岁，他必须考虑在他有生之年怎样能够最好地保护他的人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他的前任十三世达赖喇嘛，于二十年代在保守派的压力下做出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解散军团，废除核心现代化进程。十四世达赖喇嘛现在站在又一个十字路口，深思如何为他的下一代人民保存一个“藏族的”西藏。他可以继续置身局外，希望外部力量来消灭他的敌人；但是可能他很快会感到有压力去采取一个更主动的步骤——或者接受本文提到的那些主要妥协以此保护西藏，或者默默地勉强接受对付中国政策的新战略，在西藏组织暴力运动。似乎很明确的是，为了美国和富有同情心的美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应该发展一种策略，确保达赖喇嘛和他的领袖们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

注 [\[回目录\]](#)

前言 [\[回目录\]](#)

1. Monynihan 1994, pp. 66, 150. [\[返回\]](#)
2. 当然，美国的例子显示的是民族自决的问题，而不是国家主义。 [\[返回\]](#)
3. Rong和Naigu 1994, p. 509. [\[返回\]](#)
4. Richardson 1984, pp. 1-2. [\[返回\]](#)
5. 这种表述战争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流亡藏人政府对入侵的表述更加流行——例如，美国国会坚持认为，入侵西藏发生在1949年而不是1950年。 [\[返回\]](#)

帝国时代 [\[回目录\]](#)

1. Shakabpa 1967, pp. 39-40. [\[返回\]](#)
2. 这些事件的记录被雕刻在拉萨的石柱上，至今尚存。参看Richardson 1985 公元 821/822 的条约文本。 [\[返回\]](#)
3. Kolmas 1967, pp. 12-15. [\[返回\]](#)
4. Shakabpa 1967, p. 63. [\[返回\]](#)
5. 同上； Rossabi 1998, p.41. [\[返回\]](#)
6. 个人信件， E. Sperling, 1997 年 4 月. [\[返回\]](#)
7. Shakabpa 1967, p. 63. [\[返回\]](#)
8. 牙含章 1991, pp. 47-48. [\[返回\]](#)
9. De Filippi 1937, p. 170. [\[返回\]](#)
10. 牙含章 1991, p. 52. [\[返回\]](#)

11. Kolmas 1967, pp. 41-42. 这一区域的某些地方，例如理塘和巴塘，1735 年重新划归西藏管辖。 [\[返回\]](#)
12. 颇罗鼐死后清高宗给新驻藏大臣的信，引自牙含章 1991, p55. [\[返回\]](#)
13. Dung dkar 1983, pp. 124-125. [\[返回\]](#)
14. 每个候选灵童的名字和生日以满、汉、藏文书写在金签上，放在满族皇帝提供的金瓶中。在拉萨的大昭寺于佛像之前进行祈祷，之后拈签，佛祖保证选择了正确的金签。 [\[返回\]](#)
15. 这份档案由福康安，转世喇嘛吉隆活佛（代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总管共同起草。一份翻译来自牙含章 1991, pp.72-83. [\[返回\]](#)
16. 牙含章 1991, p.72. [\[返回\]](#)
17. 同上， p. 83-84. [\[返回\]](#)
18. Phuntso Tashi 1995, p. 296. [\[返回\]](#)
19. Lamb 1960, p. 146. [\[返回\]](#)
20. Richardson 1984, p. 78. [\[返回\]](#)
21. 同上， p.91. [\[返回\]](#)
22. 同上， p.272. [\[返回\]](#)
23. 同上， P.274. 关于这段时期的更多细节，可参见： Goldstein 1989; Lamb 1966; Richardson 1984; Snellgrove和Richardson 1980; 牙含章 1991. [\[返回\]](#)
24. Teichman 1922, p. 14. [\[返回\]](#)
25. Goldstein 1989, p. 51. [\[返回\]](#)
26. 同上， pp. 51-52. [\[返回\]](#)

间隔期：事实独立 [\[回目录\]](#)

1. Teichman 1922, p.18. [\[返回\]](#)
2. Goldstein 1989, pp. 59-60. [\[返回\]](#)

3. Grasso, Corrin和Kort 1991, p.72. [\[返回\]](#)
4. Li 1960, p. 130. [\[返回\]](#)
5. Goldstein 1989, pp. 68-70. [\[返回\]](#)
6. 同上, pp. 71-73. [\[返回\]](#)
7. 有关西姆拉条约的深度探讨, 请参见Lamb 1989, pp. 13-14. [\[返回\]](#)
8. 关于这一时期的更详细的研究, 请参见Goldstein 1989, pp. 41-212. [\[返回\]](#)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毛时代 [\[回目录\]](#)

1. Goldstein 1989, p. 392(转引自U.S. Foreign Relations, 1942, 103.91802/687). [\[返回\]](#)
2. 伍德鲁·威尔逊对自由和自决的崇高承诺可见他 1918 年 2 月 11 日对国会联席会议做的讲话, 他说, “我们必须尊敬民族渴望; 现在人民应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进行统治。‘自决’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从此以后, 政治家应不顾危险, 采取紧急行动。”(引自Moynihan 1994, pp. 78-79). [\[返回\]](#)
3. 同上, p. 93. [\[返回\]](#)
4. Goldstein 1989, pp. 391-392. [\[返回\]](#)
5. Rupen 1979, p. 46. [\[返回\]](#)
6. 牙含章 1994, pp. 417-418. [\[返回\]](#)
7. Goldstein 1989, p. 625. [\[返回\]](#)
8. 同上, p. 626. [\[返回\]](#)
9. 西康省于 1927 年在民族西藏地区设立, 现为四川省西部地区。1955 年合并到四川省。 [\[返回\]](#)
10. Goldstein 1989, pp. 628-629. [\[返回\]](#)
11. 同上, p. 630. 与此相反, 1950 年 6 月, 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 以此显示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Harding 1992). [\[返回\]](#)

12. 毛泽东 1977. [\[返回\]](#)
13. 1949 到 1950 期间，（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划分为四个大的大区。负责管理新解放的区域，直到成立“人民政府”。西南局负责云南、四川、贵州和西藏。 [\[返回\]](#)
14. Goldstein 1989, p. 715. [\[返回\]](#)
15. 美国也一样。 [\[返回\]](#)
16. 印度认为，此时提出西藏问题会损害其在朝鲜停火做出的努力。 [\[返回\]](#)
17. 声称因为这份协议是在压力下签署的，所以是无效的，这是令人误解的。当然，藏人不愿签署这份承认中国主权的协约，但是如同许多战败国一样，他们没有选择。中国谈判一方数次威胁，如果不接受某些条款，他们将继续入侵到卫藏；但是西藏谈判者肉体上没有受到威胁，直到最后他们也可以自由选择拒绝签署。类似的，声称西藏政府的印章是由中国人假造的也是不正确的。中国只是为西藏代表团的每个成员刻了私章，他们用这些章签署了协议。对于这份协议的详细讨论，请参见Goldstein 1989, 第 20 章。 [\[返回\]](#)
18. Goldstein 1989, p. 765. [\[返回\]](#)
19. 同上， pp. 763-769. 共同程序是中国宪法 1949 年的先驱。 [\[返回\]](#)
20. 同上， pp. 759-760. [\[返回\]](#)
21. 美国介入的发展情况的细节，可参见Goldstein 1989, p. 763 ff. [\[返回\]](#)
22. Goldstein 19889, p. 794. [\[返回\]](#)
23. 引自Goldstein 1989, p. 798. [\[返回\]](#)
24. 达赖喇嘛会见Goldstein, 1995 年 4 月。 [\[返回\]](#)
25. 作者目前正在著述一本关于五十年代的中藏关系的专论。 [\[返回\]](#)
26. 达赖喇嘛会见Goldstein, 1995 年 4 月。 [\[返回\]](#)
27. 有趣的是，此时在中国，毛泽东正在向左转，于 1957 年发起了反右运动，1958 年又发起了大跃进。 [\[返回\]](#)

28. 1959年起义之后，根据各寺庙卷入到起义中的不同程度，对其进行分别处理。那些认为是“参与”起义的寺庙，大多数僧侣都被送回家，或者（象俗人一样）被送到生产队。一些没有参与起义的寺庙，例如班禅喇嘛的主寺扎什伦布，继续行使其寺庙的功能，直到文化大革命。在其他一些重要的寺庙，少数僧人留下来看管寺产。著名的对寺庙建筑、经书、佛像的毁坏主要发生在文革早期，1966~1967期间。[\[返回\]](#)
29. 应该指出，邓小平密切参与了西藏问题。1949年到1955年，他是驻扎在重庆的西南局政委（西南局负责1950年的入侵和西藏管理）。他1955年调到北京担任党总书记。[\[返回\]](#)
30. 1961年12月20日的联合国决议1723号(XVI)，引自Van Pragg 1987. [\[返回\]](#)
31.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1959, p. iv. [\[返回\]](#)
32. Public Records Office(FO371 150710), 1960年2月20日，克里斯蒂安·E·赫脱致达赖喇嘛的信。[\[返回\]](#)
33. 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帕森斯Parsons)给国务卿克里斯蒂安·E·赫脱的备忘录，1959年10月14日（引自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60, vol. 19, China）。[\[返回\]](#)
34. 以及西藏境内的一些不确定人数的藏人。[\[返回\]](#)
35. Goldstein, Siebenschuh,和Tsering 1997, p. 108. [\[返回\]](#)
36. 同上，pp. 109-110. [\[返回\]](#)
37. Goldstein和Beall 1990, pp. 40-46. [\[返回\]](#)

后毛时代[\[回目录\]](#)

1. Tibetan Review, 1978年6月号，p.4; 1979年2月号，p.9. 1978年12月28日，当美国记者提问时，邓小平也提到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而且，“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我们都欢迎。”邓小平还说，尽管达赖喇嘛过去不喜欢政府，

只要他现在喜欢，过去的都没关系了。（人民日报[北京版]，“白皮书”，9/24/92）。[\[返回\]](#)

2. Goldstein 1990. [\[返回\]](#)
3. 选自“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会议的报告”，1982年1月23日，（民族政策文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p.10），引自Sharlho 1992, p. 38. [\[返回\]](#)
4. 这儿说的National指民族或种族。 [\[返回\]](#)
5. 世界报道总结。1980年5月30日(新华通讯社，中文) [\[返回\]](#)
6. 中国不存在“民族”共产党。因此，西藏的共产党是一个统一的中国共产党 (CCP)的一部分，服从其政策方针。 [\[返回\]](#)
7. 需要指出，撤出汉族干部的政策在西藏碰到很多障碍，因为心怀不满的“左派”干部拉了执行的后腿；很多汉族干部决定，为了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要留在西藏。一般来说，那些有一技之长的干部，例如医生、科学家等等希望离开，因为他们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但是那些没有这些技能的干部很快发现，他们在中国内地更糟。中央政府规定他们的家乡省份必须接收他们，但是却没有规定应按相同的工资和补贴接收。这些干部的家属也在拉萨，大多数都有收入。当他们意识到，回到中国内陆意味着生活水平降低，很多干部抗议并坚持必须在离开西藏之前解决他们的工资和补贴问题。在这些问题的影响下，撤出政策从没彻底实施过。实际上，它可能促成的结果是，鼓励最好的，有技能的干部离开，而技术最差的干部留了下来。 [\[返回\]](#)
8. News Tibet. 1993年9/10月号， p.7.; 和Office of Tibet的一位女士. [\[返回\]](#)
9. Beijing Review 49(5): 10, 1984. [\[返回\]](#)
10. Tibetan Review (1983年5月号): 5. [\[返回\]](#)
11. 例如，1982年10月，纽约的西藏办公室发表了一份14页的档案，“中国在西藏的人权侵害：1959-1982。” [\[返回\]](#)
12. 一位学者(Dawa Norbu 1991)写道，流亡藏人在1982年的会议上提出了这些要点，但这看起来是不正确的。 [\[返回\]](#)

13. 这一战略的最终定型，似乎发生于 1986/87 年间，主要藏人领袖和西方支持者在纽约、华盛顿和伦敦举行了一系列高级会议之后。这些发展的历史还没有被很好地记录下来，细节也很少见到。 [\[返回\]](#)
14. 事实上，他仅于 1979 年第一次访问美国，此前曾被拒签 10 年之久（Grunfeld, 未出版的手稿） [\[返回\]](#)
15. News Tibet 22 (3) 1988 年 5/8 月号, p. 8. 1985 年 7 月流亡藏人第一次得到美国国会的公开支持。国会的 91 名议员签署了一封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先念主席的信，表达支持继续进行直接谈判，敦促中国“慎重考虑达赖喇嘛和其人民的合理的公正的渴望。”（1988 和 1989 财年，外交关系授权法案第 1243 款第 14 条，引自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返回\]](#)
16. 讲话中用“Greater Tibet（大西藏）”来指“西藏”。 [\[返回\]](#)
17.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p. 96. [\[返回\]](#)
18. 同上。 [\[返回\]](#)
19. 本节和下一节的很多内容，来自 Goldstein 1990. [\[返回\]](#)
20. 这一集中的祈祷法会由宗喀巴于 1408 年创立。文革开始后被禁，1986 年刚刚恢复。 [\[返回\]](#)
21. 除一名以外，其他僧人在祈祷大法会开始前均被释放。 [\[返回\]](#)
22. 这些事件的其他记录可见 Sharlho 1992 和 Schwartz 1994. [\[返回\]](#)
23. Tibet Briefing, 纽约西藏办公室，1994, p. 24. [\[返回\]](#)
24. 例如，藏族青年国会、欧洲藏族青年联合会，以及达赖喇嘛的哥哥，图登诺布(Thupten Norbu)，强烈批评这一建议。图登诺布给全世界的藏人一封信，攻击他弟弟的决定是放弃了西藏独立的目标。但是，达兰萨拉的消息来源指出，在某个集会中，藏族青年国会领袖因为批评达赖喇嘛受到攻击，他公开承认，是达赖喇嘛指示他采取强硬立场的，大概是如此他能够不失体面的收回他刚刚宣布的条款。 [\[返回\]](#)
25. “西藏——其主权和人权状况”，Beijing Review (1992 年，9 月 28 日—10 月 4 日): 22. [\[返回\]](#)

26. 达赖喇嘛的信息和国际关系部在一份背景介绍的报告中说，达赖喇嘛提出，派遣一个十人的宗教代表团参加。(World Tibet News 1995 年 11 月 30 日). [[返回](#)]
27. Beijing Review, 1994 年, 8 月 8-14 日号, 西藏的国际运动, 2/11/1994. [[返回](#)]
28. 因此, 并非北京命令他们来, 而是因为这儿有可以赚钱的工作。 [[返回](#)]
29. 需要提醒的是,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本土人口试图和华人居民竞争时碰到的困难。 [[返回](#)]
30. 邓小平对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讲话, 西藏日报(中文版), 1993 年 11 月 22 日(讲话发生在 1987 年 6 月 29 日) [[返回](#)]
31. 因为中国不担心其西藏政策被否决, 这并不是通常西方意义上的支持选民。它更类似以色列在(约旦河——译注)西岸的“既成事实”的那种选民, 尽管这些“事实支持者”在西藏没有“户口”。 [[返回](#)]
32. 西藏官员的行为事实, 显示了北京碰到的问题的程度。 [[返回](#)]
33.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Update (1355-3313), 1997 年 5 月 6 日. [[返回](#)]

未来 [\[回目录\]](#)

1. 尽管 1792 年之后, 金瓶掣签被用过几次, 但是过去两任达赖喇嘛和上一任班禅喇嘛都不是用金瓶选出来的。 [[返回](#)]
2. 已故的班禅喇嘛 1988 年写到, 他为什么 1949 年不能返回西藏, “噶厦(拉萨的西藏地方政府)不承认我是班禅, 所以我不能回到西藏。(根据西藏传统, 达赖或者班禅必须相互确认。)” (班禅喇嘛 1988, p. 11) [[返回](#)]
3. Tibet Press Watch, 1995 年 5 月, p. 13, 以及嘉乐顿珠, 1995 年 11 月在香港对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时的讲话。 [[返回](#)]
4. 嘉乐顿珠当时作为达赖喇嘛的代表团的一员来到北京。他们带来了给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信。(参见达赖喇嘛 1993)。 [[返回](#)]

5. 嘉乐顿珠, 1995年11月在香港对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时的讲话。[返回]
6. 同上。[返回]
7. FBIS—CHI-95-229, 1995年11月29日, 新华社。[返回]
8. 关于此点, R. Barnett(个人信件, 1997年4月)指出, 达赖喇嘛已和BBC的摄影师合作, 录下了选择班禅喇嘛的片断, 留下了无可辩驳的影像证据, 他在中国政府宣布之前已经进行了确认占卜, 以此证明他在中国之前确认了灵童。这可以在他的流亡支持者中作为一个保全脸面的措施。[返回]
9. 这一税种主要是为了扩充军队。[返回]
10. 根据1792年的章程, 中国从此开始主持金瓶掣签仪式。[返回]
11. 法令宣布, 不需要“确认仪式”(即金瓶掣签)。[返回]
12. 牙含章 1994, pp. 309-312. [返回]
13. 牙含章 1994, pp. 337-338. [返回]
14. 尽管如此, 如果早先提到的那样, 毛泽东并不想把班禅喇嘛抬到达赖喇嘛平齐的政治地位, 因此他否决了这样的建议: 把班禅喇嘛作为以扎什伦布为中心的“后藏”的头, 而与达赖喇嘛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平等。[返回]
15. FBIS—CHI-95-229, 1995年11月29日, 新华社; FBIS—CHI-95-223, 1995年11月4日, 拉萨电台。[返回]
16. FBIS—CHI-95-223, 拉萨广播电台, 1995年11月3日。[返回]
17. Tibet Press Watch, 1995年5月, p.13. [返回]
18. 新华社, 1997年5月7日, 引自World Tibet News. [返回]
19. 消息来源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返回]
20. 日期为1997年2月21日的信件复印件, 由西藏国际运动提供。[返回]
21. Reuters, 1997年1月20日。[返回]
22. Reuters, 台北, 1997年3月27日。[返回]

23. 流亡藏人的内部团结近年来出现了裂痕，这既是达赖喇嘛愿意放弃完全独立的结果，也是他禁止崇拜黄教雄登(Shungden)护法神的结果。威胁已经危害到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1997年2月，一名为达赖喇嘛工作的重要僧官在达兰萨拉被藏人异见者暗杀。[\[返回\]](#)
24. 实际上，在最近一次电视采访中，达赖喇嘛被问道关于佛教和暴力，他有兴趣地回答，“目的”比行为更重要，行为，即使是暴力的行为，如果是怀着纯正的目的，他们也不是恶魔。[\[返回\]](#)
25.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News Update, 1996年12月28日，SSN 1355-3313.
[\[返回\]](#)
26. 第一次藏美“官方”接触似乎发生在1908年，当时，T. 罗斯福(T. Roosevelt)总统的中国特使洛克希尔(W.W.Rockhill)会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参见Rowland 1967, pp. 36-37.）[\[返回\]](#)
27. 美国中情局60年代后期通知藏人游击队，他们将中止美国财政援助。[\[返回\]](#)
28. 作为1987/88拉萨第一次骚乱的结果，大多数支持者团体都是此后发展起来的（参见McLaren, 即将出版）。西方想象中的西藏，可见Bishop 1989。[\[返回\]](#)
29. Tibet Press Watch. 1994年5月号，p.5. [\[返回\]](#)
30. Tibet Press Watch. 1996年10月号，p.5. [\[返回\]](#)
31. 布什总统（译注：老布什）坦诚地告诉达赖喇嘛，美国对西藏的帮助是有限的。[\[返回\]](#)
32. Tibet Press Watch. 1991. vol. 3(1): 17. 总统可以选择在这些语句上做出注解，阐明美国的官方立场，但是却没有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避免激怒国会内的亲西藏游说团体。[\[返回\]](#)
33. Herald Tribune, 1993年11月22日，p.1. [\[返回\]](#)
34. Shimuzu(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肯地研究了克林顿政府的中国政策。[\[返回\]](#)
35. 国务院 1995, p.4. [\[返回\]](#)

36. 同上, p.1. [\[返回\]](#)
37. World Tibet News, 1997年4月11日(丹麦西藏支持团体的新闻稿) [\[返回\]](#)
38. The New York Times, 1997年4月16日, p.6. [\[返回\]](#)
39. 需要提醒的是另外三个“藏区”的命运——锡金、拉达克和不丹——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不得不适应他们的强邻印度的利益。 [\[返回\]](#)
40. 他还必须接受中国选择的班禅喇嘛的合法性。一个象已故班禅喇嘛这样的大喇嘛可以选择转世到多个新的化身, 因此, 可能会有一个喇嘛的两个转世, 这也不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返回\]](#)

参考书目 [\[回目录\]](#)

- Bell, Charles. 1946. *Portrait of the Dalai Lama* . London: Collins.
- Bishop, Peter. 1989. *The Myth of Shangri-La*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awa Norbu. 1991. "China's Dialogue with the Dalai Lama, 1987–90: Pre-negotiation State or Dead End?" *Pacific Affairs* 64 (3).
- De Filippi, Filippo (ed.). 1937. *An Account of Tibet: The Travels of Ippolito Desideri of Pistoia, S.J., 1712–1727* . London: Routledge and Sons.
- Dung dkar, Blo bzang 'phrin las. 1983. *Bod kyi chos srid zung 'brel skor bshad pa* [Concerning Tibet's joint religious-secular (system)]. Beijing: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 Gehyelpa Tenzin Dorje. 1989.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Original Tibetan Local Government." *Tibet Studies* (2): 223–230.
- Goldstein, Melvyn C. 1989.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1990. "The Dragon and the Snow Lion: The Tibet Question." In Anthony J. Kane (ed.), *China Briefing* .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Goldstein, Melvyn C., and Cynthia M. Beall. 1990. *Nomads of Western Tibet: The Survival of a Way of Life*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ldstein, Melvyn, William Siebenschuh, and Tashi Tsering. 1997. *The Search for Modern Tibet: The Autobiography of Tashi Tsering* . Armonk, N.Y.: M. E. Sharpe.
- Grasso, June, Jay Corin, and Michael Kort. 1991. *Modern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 Armonk, N.Y.: M. E. Sharpe.
- Grunfeld, Tom A.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ibe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Harding, Henry. 1992.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59. *The Question of Tibet and the Rule of Law* .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Kolmas, Josef. 1967. *Tibet and Imperial China: A Survey of Sino-Tibetan Relations up to the End of the Manchu Dynasty in 1912* . Occasional Paper 7.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entre of Oriental Studies.

Lamb, Alastair. 1960. *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 The Road to Lhasa, 1767–1905* .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66. *The McMahon Line, 1904–1914* .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89. *Tibet, China and India, 1915–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 N.p.: Roxford Books.

Li, Tieh-Tseng. 1960. *Tibet: Today and Yesterday* .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Mao Zedung. 毛泽东 1977. *Ma'o tse tung gi gsung rtsom gces bsdus* (Mao's collected works), vol. 5.

McLaren, Meg. Forthcoming. "Computing for Tibet. Virtual Politic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G. Marcus (ed.), *Late Editions* , vol. 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ynihan, Daniel P. 1994. *Pandaemonium: Ethnic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ffice of Tibet. 1990. *Tibet Briefing* . New York: Office of Tibet.

Panchen Lama. 班禅喇嘛 1988. "On Tibetan Independence." *China Reconstructs* (January): 10–11.

Phuntso Tashi. 1995. *Mi tsh'e'i byung ba brjod pa* . [My life story]. Dharamsal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Richardson, Hugh E. 1984. *Tibet and Its History* . Boulder: Shambhala.

———. 1985. *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Rong, Ma, and Pan Naigu. 1994. "The Tibetan Population and Their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in China." In P. Kvaerne (ed.),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Fagernes, 1992* , vol. 1, Oslo: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 Rossabi, Morris. 1988. *Kublai Khan: His Life and Times*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owland, W. 1967.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God King." *Foreign Service Journal* .
- Rupen, Robert. 1979.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 Schwartz, Ronald D. 1994. *Circle of Protest: Political Ritual in the Tibetan Uprising*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hakabpa, Tsepon W. D. 1967.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hakya, Tsering. 1995. "The Greater Significance of the Panchen Lama Dispute." *Tibetan Review* 30 (8): 14–18.
- Sharlho, T. W. 1992. "China's Reforms in Tibet: Issues and Dilemma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 (1): 34–60.
- Shimuzu, Yoshikazu. 1996.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Failed China Policy: Implications of U.S.-China Negotiations over MFN and Human Rights." *East Asian Institute Reports* . New York: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 Snellgrove, David, and Hugh Richardson. 1980. *A Cultural History of Tibet* . Boulder: Prajna Press.
- State Department. 1995.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ibet* . Washington, D.C.: State Depar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 Teichman, Eric. 1922. *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Eastern Tibet*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 Washington, D.C.:
- Van Pragg, Michael. 1987. *The Status of Tibet* . Boulder: Westview Press.

Ya, Hanzhang. 牙含章 1991 *The Biographies of the Dalai Lamas*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 1994. *Biographies of the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s Panchen Erdenis*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索引（略） [\[回目录\]](#)

版权说明

我翻译这本书纯属个人兴趣，和任何组织、个人没有关系，没有受到任何组织、个人的资助或者压迫，也无意寻求资助。我也并不打算以此牟利。

我与原作者 Dr. Melvyn C. Goldstein 联系，他告诉我，这本书的外语语言版本版权属于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我和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联系过，但是对方没有回应。

如果您能够熟练阅读英文，请您购买或者在网上阅读英文版本；或者您能够较为方便地购买明镜出版社出版的杨晋和教授的中文译本，建议您购买阅读。我想提醒您注意：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说，您阅读我的中文译本可能构成对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的版权侵犯。我不对该行为负任何法律责任。

您如果想在您的网站转载本文中的内容（除译者序之外），请和我联系；您需要同意：如果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要求，您应当无条件地停止传播我的中文译本。

David Peng (snowlionanddragon@gmail.com)